

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林永芳博士

團結工聯與波蘭民主化之研究

**A Study of Solidarit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Poland**

研究生：林倩宇

中華民國一〇四年一月

謝誌

時光荏苒，轉眼間已在指南山下度過無數寒暑，回首六年多來，人文薈萃的政大是孕育我一切學識的搖籃，豐富的語言資源，更賦予我學習俄文甚至是波蘭文的寶貴機會。從外交系、斯語系至俄研所，五年紮實的知識累積與十個月的波蘭異國生活，開闊我的視野並與世界連結，進而確立了碩士論文的研究主題。

求學之路上，家人是我最重要的靠山，親愛的父母用愛細心培育，開明地讓我走自己的路；親愛的弟弟用笑真情相伴，大方地讓我抒發自己的情緒。感謝我的家人，總是在我最需要的時刻，給予溫暖的鼓勵，也因為家人的支持，我的求學之路才能如此順遂，一路順利完成碩士學業。

這篇論文能夠順利完成，必須感謝指導老師林永芳教授的諄諄教誨，不但協助我確立研究方向，教導我如何蒐集整理文獻資料，不時為我指點迷津，並分享其學術研究與處世之道。感謝連弘宜教授與楊三億教授，在繁忙公務中，願意撥冗閱讀我的論文，悉心指教，讓我的論文更臻完整。

論文寫作的過程中，朋友對我的重要性，不亞於老師與家人所提供的協助。感謝俄研所的鈺茹學姐及全體同學們、行管碩的麗娥與竹攸助教、勇闖歐洲好旅伴維庭及藝芳、外交系熱銷會姐妹們、政大大學會能量夥伴們、高中姐妹淘及惠我良多的陳佑及瑜安，你們的相伴在我的研究期間彌足珍貴，讓乏味的生活多了不少色彩。另外，特別感謝翊甯，謝謝你在我怠惰偷懶時督促我、在我心灰意冷時鼓勵我、在我焦慮徬徨時陪伴我，沒有你，我無法如期完成碩士論文。

帶著不捨告別政大，我即將邁入人生新的階段。期許未來，儘管遭遇困難與挑戰，自己也能莫忘初衷，繼續勇敢追夢。

林倩宇 謹誌

2015 年 1 月

摘要

團結工聯是波蘭第一個獨立工會，也是數十年一連串反對運動的結晶，並成為撼動波蘭社會，推動波蘭民主轉型主要的變革力量。本研究將波蘭視為東歐民主轉型之代表案例，以民主轉型動態模型為基礎，綜合結構途徑與行為者取向途徑解釋波蘭的民主轉型，分析團結工聯如何藉由公民抗爭影響政府決策，將團結工聯自崛起至執政之間的歷史脈絡，對應波蘭民主化各階段之發展，並以 1989 年圓桌會議和 1989 年後多次自由選舉作為其約定轉型和民主奠基選舉時期之重要事件加以論述。

波蘭反對運動之所以興起，主要是受到波蘭歷史、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之影響，反對力量不斷從錯誤中學習，進而化整為零匯合形成團結工聯。團結工聯成立後受到戒嚴之影響，試圖透過結構重建，對抗波共之壓迫，以集體抵抗政權之模式存活下來。圓桌會議是波蘭民主化的轉捩點，波共政權與團結工聯雙方終達成共識，共同尋求和平之解決方案，透過協商而非對抗達成約定轉型。透過圓桌會議協議之一系列民主選舉，團結工聯以壓倒性勝利擊敗波共和其傀儡政黨，組成東歐第一個非共政府，之後更贏得總統選舉順利執政，迫使非民主政權垮台，促成波蘭之約定轉型。綜上所述，團結工聯透過各種行動形塑波蘭政治，與波蘭民主化發展各階段息息相關，在波蘭民主化過程中確實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

關鍵詞：波蘭民主化、團結工聯、民主轉型

Abstract

Solidarity, the result nurtured by series of opposition movements in decades, is the first independent trade union in Poland. It not only shook Polish society, but also promote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Poland. This study regards Poland as an iconic case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The main approach is based on dynamic model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combing structure approach and actor-oriented approach to explain Polish democratic transition pathways and analyze how citizen protests influenced government decisions. To support the theory, I will follow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Solidarity through its rise to power, corresponding to each stage of democratization development in Poland, and further discuss the significant events, as roundtable talk and free elections.

The rise of the opposition movements in Poland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The oppositional trends, who learnt from past mistakes, later converged to form Solidarity. Shortly after establishment, Solidarity attempted to survive under the imposition of martial law by reconstructing into the form of exercising collective resistance against the authority. In Poland's democratization, Roundtable talk is a turning point, where Communist Government and Solidarity reached a consensus, agreeing on achieving pacted transition through negotiation rather than confrontation. Solidarity beat communist government and pro-communist parties with overwhelming votes of a series of democratic elections. Solidarity formed the first non-communist government in Eastern Europe, wo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induced the collapse of the non-democratic regime. To sum up, Solidarity indeed shapes Polish politics through various actions and has a pivotal po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in Poland.

Keywords: Democratization, Solidarity, Democratic Transition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3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4
第四節 文獻回顧	8
第五節 章節安排	14
第二章 共黨政權之動搖期(1970-1980)	15
第一節 團結工聯之崛起背景	16
第二節 波蘭內部結構	24
第三節 團結工聯之成立過程	32
第四節 小結	40
第三章 約定轉型期(1980-1989)	41
第一節 戒嚴與地下發展	42
第二節 朝野和解與圓桌會議	50
第三節 圓桌會議與約定轉型	59
第四節 小結	66
第四章 民主奠基選舉期(1989-1990)	68
第一節 國會選舉與非共政府	69
第二節 波共式微與工聯分裂	78
第三節 總統選舉與轉型遺緒	87
第四節 小結	95
第五章 結論	96
參考文獻	100
附錄一	107
附錄二	110

表次

表 2-1	歷任波蘭總書記	18
表 2-2	1950 年後波蘭人口發展趨勢	21
表 4-1	1989 年 4 月至 5 月之選民投票意向(百分比%)	70
表 4-2	1989 年 6 月 4 日及 18 日波蘭國會選舉結果	71
表 4-3	1989 年 7 月 19 日波蘭總統選舉結果	74
表 4-4	1989 年 9 月波蘭非共政府內閣名單	76
表 4-5	團結工聯內部政治勢力比較	86
表 4-6	1990 年 11 月 25 日及 12 月 9 日波蘭總統選舉結果	88



圖次

圖 1-1	波蘭民主轉型動態模型.....	6
圖 2-1	1980 年團結工聯組織結構.....	37
圖 3-1	圓桌會議.....	54
圖 4-1	1988-1989 年波蘭危機之議題距離及資源分配.....	82
圖 4-2	約定轉型下公民社會之發展.....	9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989 年是動盪的年代，中東歐各國以民主國家之姿奮起，這場變革的星星之火正是由知識份子、工人、教會人士組成的民間組織所燃起。1989 年的勝利並非輕而易舉的必然產物，而是波蘭積累了數十年的鬥爭歷史，波蘭統一工人黨 (Polish United Workers' Party) 統治三十五年間，發生 1956 年波茲南工人暴動、1968 年華沙大學學生示威、1970 年和 1976 年工人抗暴運動，顯示出波蘭共產黨喪失統治權威，尤以 1980 年的勞工運動影響最大，波蘭團結工聯 (The Solidarity Free Trade Union) 正是在此情況下誕生。1980 年 9 月波蘭團結工聯在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 (Lenin Shipyard，今格但斯克造船廠) 成立，由華勒沙 (Lech Walesa) 領導，是華沙條約簽約國中第一個非共產黨控制的工會組織。團結工聯主張非暴力的反抗模式，1980 年代，將波蘭國內的天主教徒及反共左翼人士組織結合成為了一股強大的反共社會運動。波蘭的共產黨政府曾於 1981 年實施戒嚴，及隨後為期數年的政治迫害，試圖摧毀團結工聯，但最終被迫與團結工聯展開談判，由團結工聯領導的反對派，與政府合辦圓桌會議協定，協議於 1989 年舉行半自由選舉，成功促使共產黨垮台。同年 8 月底波蘭形成了團結工聯所領導的聯合政府，取代社會主義性質的波蘭人民共和國政權，取而代之的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波蘭共和國，華勒沙在 1990 年 12 月的總統選舉當選，成為波蘭首位民選總統。

筆者曾於 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7 月於波蘭華沙大學進行為期十個月的短期學習，修習了「1989 年後波蘭之轉型」、「蘇聯解體後的中東歐」、「波蘭及俄羅斯之比較政治」、「初級波蘭文」等課程。除華沙外，也曾前往克拉克夫 (Krakow)、羅茲 (Lodz)、波茲南 (Poznan)、托倫 (Torun)、格但斯克 (Gdansk) 等波蘭城市，並造訪團結工聯之搖籃「格但斯克造船廠」。從十個月的波蘭生活中，實際深入體驗波蘭的文化和生活，藉由與波蘭當地人的接觸互動中更加了解波蘭人的民族性情，以及對國內政治與社會發展的想法，此為筆者選擇以波蘭為研究主體之動機之一。再者，2014 年適逢波蘭脫離鐵幕迎向自由的二十五周年，1989 年 6 月 4 日波蘭舉行第一次的半自由選舉，因此 2014 年 6 月的華沙街頭熱鬧非凡，展開一系列

盛大的慶祝活動，美國總統歐巴馬更親臨華沙舊城發表紀念演說，¹讚揚波蘭「即使面對鞭刑和子彈，對非暴力道義力量的信念從未動搖」。²波蘭人世世代代奮起反抗，最後終於贏得了獨立，如此之精神令人動容，進而使筆者更加確信以波蘭民主化歷程作為研究主題之想法。

團結工聯對波蘭民主化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本論文希冀藉由團結工聯自崛起至執政之間的歷史脈絡，試圖解釋為何團結工聯能夠生存並形塑波蘭的政治發展，並探討團結工聯在波蘭民主化、民主轉型和民主鞏固過程中之角色和貢獻。

綜上所述，本論文之目的主要欲研究及探討以下問題：

(一)、波蘭反對運動為何興起？反對運動形成之後如何發展、有何組織、有何策略？最後如何集結成團結工聯？

(二)、戒嚴實施後，團結工聯如何與波蘭共產黨抗爭？其策略與目標為何？朝野何以決議進行圓桌會議？圓桌會議對波蘭民主化有何貢獻？

(三)、1989 年後一系列民主奠基選舉對波蘭民主化有何意義？團結工聯如何贏得總統選舉，開始執政？民主轉型過程有何遺緒？

筆者認為波蘭反對運動之所以興起，主要是受到波蘭歷史、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之影響，反對力量不斷從錯誤中學習，進而化整為零形成團結工聯。團結工聯成立後受到戒嚴之影響，試圖透過結構重建，對抗波共之壓迫。圓桌會議是波蘭民主化的轉捩點，波共政權與團結工聯雙方開始合作，共同尋求和平之解決方案。透過圓桌會議協議之一系列民主選舉，團結工聯順利執政，迫使非民主政權垮台，促成波蘭之約定轉型。

由於國內波蘭研究多著眼於波蘭經濟制度之運作與弊端、波蘭共產黨與其體制改革、團結工聯組織結構與運作、外部因素對波蘭之影響等部分，以團結工聯之角度來探討波蘭民主化的文獻付之闕如，本研究將利用民主化理論來探討，且以團結工聯為主角作系統性的規納，探討團結工聯對波蘭民主化之貢獻，以補足此部分之研究空缺，為波蘭的民主化過程描繪出更完整的圖像。再者，後共轉型 20 餘年以來，現今仍存在不少威權政體，若欲促成新一波民主化，波蘭團結工聯之民主化經驗與民主轉型理論仍可供借鑑。

¹ 美國總統歐巴馬 2014 年 6 月 4 日於華沙舊城紀念演說之完整講稿，可參考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IIP)刊物《美國參考》之網站。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4/06/20140604300771.html#axzz39xBcTmKy>

² 原文：In the face of beatings and bullets, you never wavered from the moral force of nonviolence.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的时间範圍界定為團結工聯自崛起至執政之時期，也就是開始於 1970 年代波共政權的危機，一直延續到 1990 年 12 月華勒沙當選總統之選舉。時間點之所以如此界定，原因在於雖然波蘭的罷工運動最早可追溯自 1956 年，但 1970 年代不同的反對勢力才開始聚合，直至 1980 年簽署「格但斯克協議」(Gdansk Agreement)，正式確保成立獨立工會和罷工的權利，團結工聯才就此誕生。過程中團結工聯受到波共政權打壓，經歷地下化發展，重新合法化組織內卻開始分裂。1990 年則由華勒沙當選總統，開啟團結工聯執政時期，筆者因此以這 20 年間作為研究的时间背景。

本研究之資料來源除學術文獻、論文、期刊、專書外，舉凡官方統計數據、國際機構研究報告、網路報刊新聞，均為本文不可或缺之研究素材。一般討論公民社會或團體的學術專文中，時常採用運動者、組織領導人之面訪資料作為分析素材，筆者雖曾赴波蘭短期學習，然而由於缺乏適當之人脈與管道，本研究未能取得第一手訪問資料進行分析實屬遺憾。再者，筆者學習波蘭語時間未滿一年，波蘭語能力有限，儘管簡易圖表數據及短篇文字尚能理解，然而無法大量閱讀波蘭語文獻。為此，作者將參閱波蘭學者著作以及波蘭文文獻之中英譯本以補足波蘭文文獻之不足。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民主化是公民自由權利的持續擴張，是民主制度和程序建立並且不斷完善的過程，包含非民主政權的垮台、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民主轉型主要以自由公平的選舉為標誌，政府的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都由民主程序產生；民主鞏固是一個綜合性可衡量的概念，代表精英與民眾在制度、行為與文化上都將民主視為唯一的準則。³

欲理解民主轉型和民主鞏固的概念，須追溯到 1969 年學者 Dankwart A. Rustow 於美國政治學會發表一篇名為〈轉向民主〉(Transitions to Democracy)之論文，針對不同國家以個案研究方式作全面性考察的歷史研究途徑，比尋求功能取向的民主化研究更能提供實際的分析基礎，有別於早期維持民主穩定的結構性假設，⁴奠定了民主轉型理論的基礎。Rustow 建立了民主轉型的動態模型(Dynamic Model)，以敘述與解釋民主轉型的路線、過程與可能結果，該模型進而成為轉型理論研究途徑的源頭。⁵

爾後，學者 Georg Sorensen 據此稍做修正，模型從國家統一的背景條件(background condition)開始，隨著時間推移，從非民主政權轉型至民主階段的過程，在實際生活中各階段經常重疊。民主轉型的第一階段為準備階段(preparatory phase)：背景條件為國家處於基本的統一狀態，缺乏此等統一條件將使得國家內部各黨派對發展目標缺乏共識，出現政治自由化是特徵之一，自由化的結果帶來一段長期之政治鬥爭，並導致非民主政權瓦解；第二階段為決定階段(decision phase)：是建立民主秩序的明確要素，可能是高層政治場域出現合適行為者，採取合適的行動推動民主，或是更有組織的反對領袖精英成形，挑戰既有勢力，精英爭取權力之轉型過程中，上層中央層級或下層街頭群眾運動的權力競逐將影響

³ 王菁、李想，「民主化、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概念的澄清與辨析」，青島大學師範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3 期 (2011)，頁 107。

⁴ 欲了解民主化的模式，可歸納出三種理論取向：(1)現代化理論途徑(modernization approach)，強調許多有關現行自由民主或成功民主化所必要的社會與經濟要素，代表學者為 Seymour Martin Lipset；(2)轉型理論途徑(transition approach)，強調政治過程及精英的主動與選擇，以解釋從威權統治邁向自由民主的緣由，代表學者為 Dankwart A. Rustow；(3)結構理論途徑(structural approach)，強調有利於民主的權利結構變遷，代表學者為 Brington Moore。請參見 David Potter 等著，王謙等譯，民主化的歷程(台北：韋伯文化，2003)，頁 13。

⁵ Dankwart A.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2, no.3, (1970), pp. 337-363.

該國民主轉型是否能朝向正面發展；最後階段為鞏固階段(consolidated phase)：民主習慣已確立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政治領導者、政治行動者與人民皆視民主為政治社會秩序的指導圭臬。⁶承上所述，該模型利於說明從威權統治朝向民主政治的運行方向，是一段牽涉不同階段的複雜又漫長過程，並涵蓋從非民主轉型到民主統治之下不同階段的清晰圖像。

相關民主轉型過程的研究，主要在於企圖回答舊有威權政體為何無法持續而須面臨轉變？必須具備哪些歷史條件？必須經歷哪些政治過程？並且配合相關區域進行研究。民主轉型途徑乃是將邁向民主化過程之解釋途徑區分為二：結構途徑(structure approach)與行為者取向途徑(actor-oriented approach)。⁷結構途徑強調特定的社經背景與客觀環境因素有利於民主的發展，例如經濟發展程度、社會現代化程度，或是特定的社會結構組成、政治文化、共同的歷史因素影響之下，導致具有類似特質的國家傾向於民主體制。行為者途徑強調政治精英間的協商與互動，聚焦於政治精英選擇策略的結果，例如政府中保守派和改革派與反對聯盟溫和派和激進派之間的互動，或是轉型過程中的速度、方式，將會決定整個轉型的成敗與結果。而使用歷史研究法進行研究時，係指該問題發生及演變具有長時性研究的性質，藉由分析相關資料，歸納出可供解釋與預測的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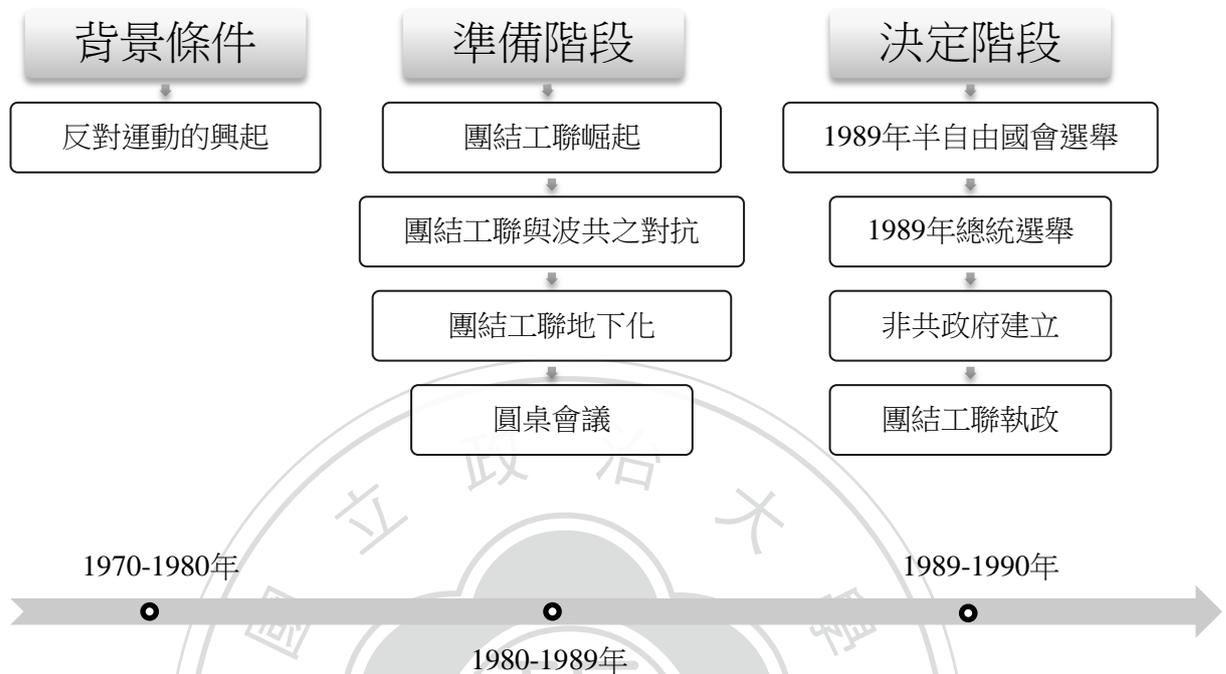
本研究將波蘭視為東歐民主轉型之代表案例，因此將從民主轉型途徑著手，以行為者取向途徑來解釋波蘭的民主轉型，團結工聯如何藉由公民抗爭影響政府決策，並以 1989 年圓桌會議和 1989 年後多次自由選舉作為其約定轉型和民主奠基選舉時期之重要事件，配合歷史研究法加以論述。

綜合上述的分析架構，筆者將 Rustow 之民主轉型動態模型，應用到波蘭團結工聯自崛起至執政之案例，並將民主化各階段整理繪製成圖 1-1。

⁶ Georg Sorense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 World*(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8), pp.40-45.

⁷ Renske Doorenspleet, *Democratic Transitions: Exploring the Structural Sources of the Fourth Wave*(Boulder, Colo. :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5), pp.2-8.

圖 1-1 波蘭民主轉型動態模型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

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主要採用「歷史研究法」及「文獻分析法」，透過這兩種研究方法，以求達到客觀的研究成果。

壹、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是指有系統性的蒐集及客觀評鑑與過去發生之事件相關之資料，以檢視事件之因果與趨勢，並以此提出準確之解釋，進而解釋現況，並對未來的發展作出預測的一種分析方法。歷史研究法可瞭解當時問題之來源、問題之發展以及其特徵為何，對過去所採用之解決方案及未採用之解決方案進行確認。

⁸本研究欲利用歷史研究法，探究為何團結工聯會崛起與形成，為何團結工聯能夠生存並形塑波蘭的政治發展，為何團結工聯走向分裂等議題。

⁸ 張紹勳，**研究方法**(台中：滄海書局，2000年)，頁 309-312。

貳、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社會科學研究廣泛應用的研究方法之一，藉由蒐集歷史資料，經過客觀的分析、評鑑，利用可靠及可信的資料研究社會變遷及其規律性，解釋社會現象的現況，甚至預測將來之發展。文獻可分為兩類：原始文獻(primary source)，即第一手的目擊描述或實況紀錄，包含官方與非官方的各種原始及間接文件資料；二手文獻(secondary source)則包含專書論著、期刊論文、報章時事及網路資料等相關資料。本研究以團結工聯在波蘭民主化所扮演的角色為研究主題，理當廣泛蒐集波蘭團結工聯發展之相關資訊與材料，例如國內外書籍、期刊、學術論文、報章雜誌及官方出版品，藉由資料原始及二手文獻，進行檢視、歸納、整理及分析。



第四節 文獻回顧

Samuel P. Huntington 所撰之《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⁹一書，首先提出「第三波民主化」¹⁰的論述，試圖說明並分析一群國家在一段特定時間內由威權體制轉型至民主國家的情形，分析民主轉型的原因、方式、進行與影響，對於民主化有全面完整之闡述。民主轉型的過程中，從威權體制轉變到民主體制的轉型方式，依據帶領者的不同可分為變革(transformation)、置換(replacement)和移轉(transplacement)，所謂變革即由執政精英帶頭實現的民主；置換為由反對團體帶頭實現民主，且威權政體垮台或被推翻；移轉則是由政府和反對派團體聯合行動而實現民主化。波蘭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代表國家之一，民主化是由政府和反對派團結工聯採取聯合行動而產生的，是移轉最典型的例子。轉型的過程中，常常伴隨著罷工、抗議、示威與鎮壓、監禁、圍剿、戒嚴法兩方面的拉鋸戰，最終導致政府與反對派之間夠透過談判達成協議。本書是研究民主化不可不參閱的一本經典著作。

David Potter 等合著之《民主化的歷程》(Democratization)¹¹一書，對於民主化做了完整且基礎的說明，針對不同國家提出不同的民主問題，在第十六章中，作者探討共產主義為何在東歐地區崩解，接著解釋相關國家雖進行民主化改革，卻為何採取不同的改革途徑。比起其他東歐國家，波蘭較早進入民主轉型的主要原因為黨內精英競爭、自由化、領導階層決策權下放、與異議團體精英進行協商合作，同時波蘭的公民社會發展健全、社會群眾集結參與度高，除了在政治上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更促使共產黨領導階層權力運用有所顧忌而受限，強化反對黨精英改革訴求的正當性，可謂是研究民主化的一本重要專書。

⁹ Samuel Huntington, 劉軍寧譯, **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台北:五南, 1994年)。

¹⁰ Samuel P. Huntington 認為:民主政治在世界範圍內的進程呈現出三次浪潮。19世紀到1920年代歷經第一次民主化的長波。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主曾大規模散播,1922年全球有33個民主國家,但是二十年後僅有11個保存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了第二波民主化浪潮,在1950年代達到高峰,至1970年代逐漸平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始於1974年葡萄牙結束獨裁政權後的十五年間,民主化波濤席捲南歐,擴散至拉丁美洲和亞洲,吞沒共產主義世界。關於歷史上的民主化浪潮,參見 Samuel P. Huntington, 劉軍寧譯, **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頁10-23。

¹¹ David Potter, David Goldbalt, Margaret Kiloh, Paul Lewis, 王謙等譯, **民主化的歷程**(台北:韋伯文化, 2003)。

Juan J.Linz 與 Alfred Stepan 合著之《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南歐、南美和後共產主義歐洲》(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¹²一書中，依據南歐、南美和後共國家三個區域，針對民主轉型和民主鞏固之間的問題做了綜合性的討論和分析，並進行跨區域和區域內的比較研究。在第十六章中，作者闡述波蘭如何從道德的公民社會，歷經約定轉型(pacted transition)，進入半總統系統並創造出政治社會矛盾的遺緒。波蘭是東歐地區第一個接受約定轉型的國家，然而第一的代價是延遲了完整的轉型，且轉型的遺緒更對民主鞏固造成傷害。1981年國內實施戒嚴之後，形成安全體系、軍隊、波蘭共產黨、天主教會和團結工聯之間特殊的五方權力關係，彼此互相影響並形塑波蘭之民主轉型。然而，一方面由於團結工聯黨內分裂成代表公民社會的中央聯盟(Center Alliance)和代表政治社會的民主聯盟(Democratic Union)，另一方面，波蘭政治上也未發展出能代表利益並累積利益的政黨，造成國會政黨林立，因而阻礙其民主轉型的步調。本書對於圓桌會議後團結工聯未能善用其影響力，以及波蘭民主鞏固的問題有精闢的分析，對於筆者之研究，提供很大的助益。

Raymond Taras 所著之《波蘭民主鞏固》(Consolidating Democracy in Poland)¹³一書，是本論文研究過程中重要之參考書目，全書針對波蘭簡史、波共政權運作、波共政權制度危機、結盟與危機解決、民主結構等部分進行全面探討，剖析波蘭轉型路線是否朝向穩定且鞏固之民主發展，試圖為仍不斷變動之波蘭民主發展定位。作者採用 CCC(Crisis, Choice and Change)模型，分析波蘭如何自威權政權轉變成民主政權，危機階段時波共面臨社經情況改變及社會動員，危及其領導地位；選擇階段時雙方對峙，反對勢力選擇罷工之反抗形式，波共政權則以戒嚴回應；改變階段時雙方透過修正憲法、政治體制、競爭模式及領導組成，完成約定轉型，清楚說明波蘭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之改變。此外，作者也詳細描述波蘭民主制度，包含政治制度、政黨、選舉及自波共統治至轉型過程之政治領袖，為民主鞏固之比較研究作出重要貢獻，是研究波蘭民主鞏固不可忽略之重要文獻。

Grzegorz Ekiert 所著之《國家反抗社會：政治危機和之後的中東歐》(The State

¹²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¹³ Raymond Taras, *Consolidating Democracy in Poland*(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5)

against Society : Political Crises and Their Aftermath in East Central Europe)¹⁴一書中，深入剖析中東歐的三場轉捩危機，分別是 1956 年的匈牙利革命、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改革運動、以及 1980 年波蘭團結工聯運動的興起。首先，該書針對政治動員(mobilization)、復員(demobilization)和再平衡(reequilibration)做了深入淺出的整理，助於讀者對政治機會結構變動的認識。接著，作者比較中東歐三場危機的獨特性、制度崩潰的程度、全民動員的模式、內部精英的分裂、領導者在有限選擇中之抉擇，並論述三場危機的限制如何塑造危機後的政策輪廓、產生不同的政治結果、以及形塑黨國體制和國家社會之間的關係。其中波蘭篇章部分，作者針對波蘭實施戒嚴後，為何無法恢復黨國制度的連貫性、復員反對勢力和穩定政經局勢提出犀利的個人見解。本書提供非常詳盡且寶貴的資訊，是研究中東歐政治危機不可不參閱的一本著作。

Timothy Garton Ash 之著作《波蘭革命：團結工聯》(The Polish Revolution: Solidarity)¹⁵一書，是眾多學者公認描述分析團結工聯最有系統和公信力的專書，全書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詳盡的敘述肇始於列寧造船廠之革命的始末，含括 1980 年 8 月罷工運動至 1981 年 12 月實施戒嚴之間之歷史脈絡，內容聚焦於團結工聯行動的成長和其領袖與共產政權之間的互動；第二部分則是團結工聯如何改變波蘭、革命帶給波蘭什麼意義，最後以西方對團結工聯的反應、對波蘭的政策以及波蘭經驗對西方的教訓作為結論。作者也提供有心繼續鑽研的研究者許多值得切入的議題方向，例如團結工聯對人們的影響、團結工聯催生的各式獨立組織、團結工聯各領域的內部發展、團結工聯與天主教會和波共之間的關係等，並指出為了研究團結工聯之集團關係、贊助支持者的晦澀網絡需要投入更多的技巧和心力。本書為團結工聯研究立下難以超越的里程碑，可謂是研究該領域之重要專書。

Adam Roberts, Timothy Garton Ash 合編之《公民反抗和權力政治：從甘地至今日的非暴力行動經驗》(Civil Resistance and Power Politics: The Experience of Non-violent Action from Gandhi to the Present)¹⁶一書中，Aleksander Smolar 在第八章「邁向自我限制的革命：波蘭 1970-1989」(Towards 'Self-limiting Revolution':

¹⁴ Grzegorz Ekiert, *The State against Society : Political Crises and Their Aftermath in East Central Europ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¹⁵ Timothy Garton Ash, *The Polish Revolution: Solidarity*(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5)

¹⁶ Adam Roberts, Timothy Garton Ash, *Civil Resistance and Power Politics: The Experience of Non-violent Action from Gandhi to the Pres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oland 1970-1989)對於波蘭團結工聯 1970 年至 1989 年的革命經過和成果做了簡要的敘述，其中作者更將其描述為一場自我限制的革命。波蘭的過去是一段不斷被割據的血淚史，抗爭總是伴隨著武力和犧牲，卻換來英雄式的悲劇，華沙起義的慘痛經驗是波蘭開始尋求和平抗爭的轉捩點。作者認為，波蘭之所以尋求以非暴力的方式影響政權，原因主要有三，一為團結工聯的行動是華沙起義的產物，自然努力避免再次造成大量人員傷亡，二為內部承受波共高壓統治，政府與人民權利不對等，三為天主教會作為道德的宣揚者，持續提倡非暴力所致，提供筆者研究的不同方向。

Jon Elster 所編之《圓桌會議與共產主義之崩潰》(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¹⁷一書中，Wiktor Osiatynski 在第一章「波蘭圓桌會議」(The Roundtable Talks in Poland)是分析波蘭圓桌會議最有系統的專文。圓桌會議是獨特的政治現象，體現一種政府及社會間議價的型式，1989 年波蘭首先進行圓桌會議，隨後圓桌會議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東德及保加利亞先後展開，成為東歐和平擺脫共產主義統治的主要方式。作者以憲法的視角，聚焦於分別討論經濟社會政策、政黨多元化和政治改革三項議題的三個主要圓桌會議，探討波共政權與反對團體之間議價的機制及讓步的過程，比較雙方最初協商目標及最終協商結果的差異。作者主要彙整眾多波蘭文相關書目，參與協商者之回憶錄及各式次級圓桌會議、工作會議協議，輔以自身印象及透過記者身分參與之各式會議筆記。作者更在 1990 年與圓桌會議五位主要參與者進行面談，成為本書最具價值的資料來源，是解析圓桌會議不可不參閱的經典。

張秀珍所撰之「波蘭獨立團結工會之研究」¹⁸是國內第一個以團結工聯為主題的學位論文，研究範圍主要是波蘭工人運動之歷史背景、團結工聯的形成因素與發展過程、團結工聯之組織結構與權力運作、團結工聯面臨之困境與展望，有助於筆者了解團結工聯早期發展之歷史脈絡。

蘇宏達所撰之「一九八九年波蘭民主運動之研究」¹⁹一文屬決策研究，作者採用「有限理性決策模式」(bounded rationality model)，以假定波共是理性決策者之前提下，設定當時圓桌會議及其協議雖非波共認為最理想之結果，但為其最

¹⁷ Jon Elster,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¹⁸ 張秀珍，「波蘭獨立團結工會之研究」，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

¹⁹ 蘇宏達，「一九八九年波蘭民主運動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能接受及容忍之方案。同時引用「外交決策環境模式」(environmental model for foreign policy analysis)，以決策機構、公眾意見、國內環境、國外環境等四個分析層次，探討1989年波蘭民主運動發生之原因，逐步推敲波共決策之來龍去脈，剖析波共變革對東歐、蘇聯乃至於中國未來之意義和影響。結合外交理論分析波共決策行為，有助於筆者了解波共面對團結工聯之應對模式。

戴育毅所撰之「波蘭團結工會自由化運動之研究(1980-1983)」²⁰一文，作者從社會運動角度分析團結工聯之興衰、影響及東西歐集團之反應，研究發現：欲深入研究波蘭民主運動必須探討波蘭政經制度問題、歷次波蘭政經制度之背景、朝野間之衝突與妥協。因此幾年後，作者針對該主題，撰寫了「波蘭政經體制改革之研究：團結工聯與波共政權互動之背景與演變」²¹一文，從團結工聯與波蘭共產黨政權互動之背景與演變探討波蘭政經制度改革，解釋波蘭政經制度之特色與弊端、為何政經改革方案無法解決政經危機、團結工聯反對運動如何興起如何抗爭、圓桌談判如何對波蘭政經體制改革發生突破性進展，提供後續研究非常詳盡且寶貴的資訊。

周慧君所撰「民主化過程中反對黨分裂或團結之比較分析：以波蘭團結工會與台灣民進黨為例。」²²一文中，說明了團結工聯組織雖然發展完備卻仍然發生嚴重分裂，形成中央聯盟和民主聯盟之情形，並以行為動機和行為報償兩個途徑分析。一個次級政治勢力考量黨內資源分布情形以及評估未來資源具備離開的動機後，接著必須考慮行為報償問題，如離開後是否能帶走既有支持或獲得新的支持。作者認為民主聯盟雖然在全國民意佔有優勢，但在黨內卻無代表性可言，黨內資源集中於華勒沙主導的中央聯盟，自然決定離開團結工聯。報償方面，儘管離開團結工聯，民主聯盟仍保有波蘭選民的支持；再者，當時波蘭利益匯集與表達制度管道尚未完整建立，民主聯盟尚有發展的政治空間，使得民主聯盟出走，最終導致團結工聯分裂。此外，論文最後收錄1990年面臨團結工聯分裂之際，華勒沙接受訪問當時的處境與心境，以及團結工聯內部次級政治勢力重要成員米赫尼克(Adam Michnik)在總統選舉前提出其認為華勒沙不適任總統的各項理由，對筆

²⁰ 戴育毅，「波蘭團結工會自由化運動之研究(1980-1983)」，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

²¹ 戴育毅，「波蘭政經體制改革之研究：團結工聯與波共政權互動之背景與演變」，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

²² 周慧君，「民主化過程中反對黨分裂或團結之比較分析：以波蘭團結工會與台灣民進黨為例。」，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者了解當時兩大領袖互相較勁抗衡時的情境大有幫助。

洪茂雄所撰之「後共產主義波蘭的政治發展：變革與穩定」²³一文，以修憲經過及特徵敘述「非共化」的憲政架構，以三次國會大選分析政黨政治的運作，最後以總統大選評估政治發展，作者認為 1995 年華勒沙尋求總統連任卻敗給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原因是團結工聯內部分崩離析、眾叛親離，僅憑華勒沙個人之英雄主義為號召難以與瓦希涅夫斯基清新形象和民主左派聯盟匹敵，總統選舉失利可說是華勒沙時代的落幕。

吳玉山所撰之「政權合法性與憲改模式：比較臺灣與歐洲後共新興民主國家」²⁴一文，首先定義憲改模式，依照憲政改造經由不同的起點、速度、渠道與程度區分為四種不同的憲改模式，不同於多數歐洲後共新民主國家，波蘭的憲政模式採行漸進的內生制憲模式，詳細說明比較波蘭與其他後共新民主國家之制憲類型之差異，是研究波蘭憲改模式值得參閱之文獻。



²³ 洪茂雄，「後共產主義波蘭的政治發展：變革與穩定」，**問題與研究**，第 35 卷第 6 期(1996)，頁 53-66。

²⁴ 吳玉山，「政權合法性與憲改模式：比較臺灣與歐洲後共新興民主國家」，**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1 期(2006)，頁 1-28。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研究之章節架構分成五個章節，除了第一章緒論及第五章結論外，論文骨幹由三章構成，按照時間軸依序說明，將波蘭民主化的進展與團結工聯的發展相互配合說明。

第一章為緒論，首先說明本次研究的動機與目的、本研究的範圍與限制，並說明研究的途徑與方法，從研究背景中選取重要學者專家之著作，進行文獻分析，將相關研究成果作系統性的統整。

第二章為共產政權之動搖期 (1970-1980)：本章主要探討團結工聯之崛起背景、波蘭內部之社會結構及團結工聯之成立過程。首先分析反對運動形成之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接著探討波共政權、天主教會及反對勢力三大波蘭內部社會結構，檢視三者如何發展並相互影響。最後敘述 1980 年罷工運動如何化整合，格但斯克協議如何提出和簽訂，進而催生團結工聯成立，並分析其組織及運作。

第三章為約定轉型期(1980-1989)：本章主要探討戒嚴時期團結工聯之地下發展、圓桌會議及波蘭之約定轉型，首先探討戒嚴之實施背景及工聯如何透過地下發展生存，持續與波共抗爭。接著分析圓桌會議之召開背景、會議形式與成員，檢視會議採取何種議價機制，歷經何種讓步過程，最後達成哪些協議。圓桌會議促成非民主政權的垮台，是波蘭約定轉型的代表事件，也是本章的論述重點。

第四章為民主奠基選舉期 (1989-1990)：本章主要以圓桌會議協議之民主自由選舉為切入點，首先探討 1989 年 6 月國會選舉與一個月後之總統選舉，以及團結工聯如何建立東歐第一個非共政府。接著解釋波共政權與團結工聯內部為何分裂，1990 年之總統選舉，華勒沙如何脫穎而出當選總統，開啟團結工聯執政時期。另外，也試圖分析約定轉型過程中資源之分配與改變、波蘭公民社會之發展，以及轉型所造成之遺緒。

第五章為結論，總結上述之研究發現，歸納整理團結工聯對波蘭民主化之貢獻，並進一步思考，對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第二章 共黨政權之動搖期(1970-1980)

「執政黨已被迫面對階級公審，解釋其源自何種法源血統，以何種名義治理。」

—波蘭獨立聯盟(Polish League for Independence)，1980年8月21日²⁵

二次大戰結束至蘇聯解體之間，中東歐國家幾乎都經歷過威脅國家政治秩序和地緣關係的政治危機。一方面，所有的政治不穩定都反映著對共產統治的抗拒和反對；另一方面，也反映著統治精英無法有效回應國內和國外的挑戰和壓力、解決社會和政治的緊張和衝突，並防止怨氣的累積和集體抗議的出現。

波蘭 1980 年的危機是 1956 年後一系列週期性政治危機的累積，即使波共政權試圖改革平息民怨，但成效有限，導致人民不停歇的抗議、執政領袖不斷改變並進一步侵蝕波共的統治基礎。不同的社會團體和組織接連挑戰波共的政策，雖然行動失敗，但總能獲得國家的部分讓步並成為潛在的威脅。改變的原動力不再是對黨國體系的不滿，而是想要成為社會新的政治力量。

團結工聯的興起並非偶然，而是情勢使然，其成立在波蘭政治發展史上更有重要意義。團結工聯主張非暴力的反抗模式，前所未有的匯合波蘭國內的勞動人員、知識份子、天主教徒及反共人士等反對勢力，組織結合成為了一股強大的反共社會運動，動搖整個國家並試圖攫取政治控制。

本章主要探討團結工聯之崛起背景、波蘭內部之社會結構及團結工聯之成立過程，首先分析反對運動形成之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接著探討波共政權、天主教會及反對勢力三大波蘭內部社會結構，檢視三者如何發展並相互影響。最後敘述 1980 年罷工運動如何化整為零集結成一股勢力，格但斯克協議如何提出和簽訂，進而催生團結工聯之成立，並分析團結工聯之組織及運作。

²⁵ Timothy Garton Ash., *The Polish Revolution: Solidarity*(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5), p.37.

第一節 團結工聯之崛起背景

由於位處戰略要地，波蘭一直被其他國家視為併吞的對象，歷史上俄國和蘇聯曾四次參與瓜分波蘭(1772、1793、1795、1939年)，雙方積累難以化解之宿怨，為之後的反對運動埋下伏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無異於其他東歐國家，波共政權在蘇聯支持之下建立，由波蘭統一工人黨實行極權統治和蘇聯式的中央計劃經濟。然而，在波共的統治之下，波蘭經歷國家及政黨制度的腐敗、社會主義之改造及經濟政策之失敗，對於波共政權產生極大不滿。因此除了反對波共之政策，反對運動也層出不窮。針對波蘭反對運動崛起之背景，主要可歸因於政治、經濟及社會三項因素：

一、政治因素：共產制度之腐敗

以政治體制而言，波共一黨專政，國家權力掌握在少數共產黨人手中，剝奪人民行使權力之自由。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高度集權易衍生官僚主義、貪污腐化、個人崇拜及獨裁，進而破壞波共統治之合法性基礎，成為政權政治危機之根源。

戰後波蘭的第一部憲法為「1952年憲法」，波蘭憲法表面上擁有人民代表草擬之所有部分，用以為人民服務；實際上卻是由共黨領導人所擬定，仿造蘇聯1936年之「史達林憲法」，完整體現史達林主義。該部憲法前言特別強調波蘭共產黨是政治最高領導核心，蘇聯是波蘭的保護者，議會(Sejm)為最高權力機關。1975年波共修改憲法，明訂波共是國家之領導，將波蘭國號由「波蘭人民共和國」改為「波蘭社會主義共和國」，同時加強和蘇聯之合作關係和友誼，並賦予「救國軍事委員會」必要時宣佈「緊急狀態」之權力，試圖加強對波蘭之控制。波共以最適合及最能符合其需求之方式，加以操縱並解釋憲法，達成加強控制社會之目的。

波共一黨專政，黨內官僚不但掌握生產工具，並且透過控制生產資料，支配人民之生活。由於一黨專政，官僚權力不受民意監督，因而利用其職權謀私貪汙。再者，龐大行政機構官僚主義更加盛行，效率低落。官僚階級擁有並行使許多特

權，特權階級生活優渥，絕大多數人民卻過著窮苦生活，人民承受巨大壓力與負擔，同時產生憎恨和相對剝奪感。

1956 年後波蘭較其他中東歐國家擁有更多元的制度結構，也是東歐國家中唯一一個始終較接近威權政權而非極權政權的國家。國家政治系統由共產黨控制，但仍允許其他受高度控制的政黨存在如統一農民黨(United Peasant Party)、民主黨(Democracy Party)和三個天主教團體，並由這些政黨組成活躍的議會。自 1957 年起，波蘭選舉法允許候選人競爭國會席次。1976 年及 1980 年選舉，議會 460 個席次中，共產黨獲得 261 席，農民黨獲得 113 席，民主黨獲得 37 席，無黨籍候選人獲得 36 席，天主教候選人獲得 13 席。²⁶

1970 年代波蘭的政黨和國家制度以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並未動搖，未有變化和危機之徵兆。1972 至 1978 年吉瑞克政權進行地方行政改革，將國家 22 省份改為 49 省份，共產黨的組織改變，省委組織(provincial party organization)取代市委組織(municipal party organizations)，透過改革，削弱省委書記之地位，強化中央控制，新世代進入國家行政職位及政黨高階職位，統治精英經歷重大的世代交替。國家和政黨領袖的轉變，部分為自然的幹部老化，使國家政策去意識型態化並更加務實。改革弱化政黨關鍵層級控制政治經濟之能力，政黨體制能力和權威性逐漸衰退。²⁷

與此同時，波蘭共黨之內部體制結構也嚴重衰退，吉瑞克之改革破壞二戰後建立之連貫制度系統，領導者務實的態度及意外的制度改變弱化黨國的組織能力，且造成意識型態的僵化和道德萎靡。1970 年代政黨制度的衰敗影響了內部組織結構、意識型態基礎、國家和政黨體制秩序和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學者甚至認為 1970 年代波蘭政治系統從極權主義轉變為專制官僚體制比起經濟衰退更需為 1980 年 8 月危機負責，²⁸突顯制度和意識型態層面改變帶來之危機。

吉瑞克的政權產生新社團(neo-corporatist)，發展出表達及調解利益和吸收抗議之新模式，橫向且直向分割國家活動，發展出利益代表之非正式合作結構。²⁹

²⁶ Grzegorz Ekiert, *The State against Society: Political Crises and Their Aftermath in East Central Europ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26.

²⁷ Paul G. Lewis,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Party Secretaries in Poland, 1975-1986*(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61-64.

²⁸ Jadwiga Staniszkis, *Poland's Self-limiting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50.

²⁹ George Kolankiewicz and Paul G. Lewis, *Poland: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London: Pinter, 1988), p.68.

波共政權和社會中專業團體之間半制度化社團網絡之形成，不僅弱化統治正式結構、稀釋共產黨角色且加強非政治化，逐漸企業化之社會制度和欲保持壟斷之共產黨產生內在矛盾，造成政治之不穩定。

吉瑞克將政治運勢寄託在物質上的成功，背離 1960 年代戈慕卡政權提倡之平等精神及苦行方式。波蘭黨國意識型態之去除及新社團模式之發展，國內市場失衡、西方貿易誘惑及國內不斷升級之經濟危機加深黨國制度內之貪汙。1978 年至 1980 年間，小型私營企業逐漸增加，擴大工資和生活水準之差異，新企業家階層和波共領導精英利用特權累積資產、營私舞弊，漠視民間疾苦。然而大部分之人民缺乏進入舊分配制度或新市場收入之管道，引發民眾的不滿。

值得一提的是，吉瑞克採行鎮壓寬容(repressive tolerance)的政策，認為政治和社會的耗費將削弱反對勢力，然而開放的政治空間允許創立獨立的政治和社會組織，這些活動家後來也成為團結工聯運動的幹部。

承上所述，波蘭出現波共親蘇政策、制度及意識型態之衰敗、劇烈之經濟衰退、廣泛之社會不平等、明顯的收入差距、社會特權利用職權營利、貪汙腐化、用人為親、人民無權表達政治思想和言論自由等情況，引起社會各階層的不滿與抵抗，以上是造成政治危機之重要因素。

表 2-1 歷任波蘭總書記

名稱	執政期間
別魯特(Boleslw Bierut)	1948-1956 年
歐哈伯(Edward Ochab)	1956-1956 年
戈慕卡(Wladyslaw Gomulka)	1956-1970 年
吉瑞克(Edward Gierek)	1970-1980 年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經濟因素：經濟政策之失敗

波蘭、蘇聯及其他東歐國家皆施行蘇聯式之中央計劃經濟，儘管實施之程度深淺有所不同，但其目標及制度之基本精神近乎一致，共同特徵為否定私人企業、採行經濟統制專賣、剷除所得利因、廢除市場機能以及否定私有財產制度。1950 年代以前，波蘭實施嚴格之中央計劃經濟制度，並以蘇聯之利益為中心。經濟發展及計劃目標為爭取成長而忽略效能、鎖國而忽略世界經濟發展、注重貨物產量

而忽視勞務、重視工業而忽視農業、重視生產財而忽視消費財，³⁰長期以來造成重大之經濟困難，導致 1956 年之波茲南工人暴動。

戈慕卡上台後，對農業制度稍作調整。第一，減少集體農場，使波蘭人民離開集體農場，以家庭為單位之小農制重新出現。第二，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並降低生產配額限制。第三，開放農產品及農地買賣市場，使波蘭成為蘇維埃集團國家中唯一擁有私有土地的國家。然而，除解除農業集體化之外，其他進展有限。

1960 年代，波蘭對農業投資下降，機器設備及農藥供應不足，農產品價格收購價格過低，農地支離破碎同時又缺乏機械化耕作，農村勞動力被城市工業部門吸收，糧食危機逐漸成形。³¹為了增加糧食產量，只能開放糧價、進行技術革新或是增加農產品價格補貼，故財政負擔成為戈慕卡政權最棘手的問題。1970 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波共終於不堪政府財政負擔，決定順應物價，減少對城市居民民生必需品之補貼，調高食物及燃料價格。此舉引發人民劇烈不滿，波羅的海沿岸爆發大規模罷工潮，當局鎮壓未果，反而導致戈慕卡下台，由吉瑞克接任。

吉瑞克接任後，藉由凍結物價和進行經濟改革平息工人的抗議，為求改善經濟，實施「新經濟策略」(A New Economic Strategy)，策略要點主要如下：第一為強調國際貿易：加速投資，大規模引入外國技術，增加生產設備，進口原料與消費品；第二為社會政策：大幅提高退休金和最低工資，醫療設備擴及鄉村；第三為經濟改革：改進過去錯誤之政策，強化中央計劃同時增加獨立與負責之企業與企業團體。³²

吉瑞克採行進口主導的激進政策，投資政策完全依賴西方信用貸款，在 1971 至 1975 年間，波蘭進口大批機器設備，集中投資重點計劃，並藉由投資帶動快速經濟成長，人民生活水準隨之提升。然而，以進口帶動成長之政策並非長久之計，持續鼓勵投資使得外債不斷積累，其經濟政策包含以下致命錯誤：第一，終結孤立，在西方市場開展業務，不彈性之計劃經濟瞬間暴露在世界經濟的市場價格中；第二，並未採行必要的經濟制度改革，工業部門沒有能力和國際市場競爭；第三，進口快速成長並未刺激預期的出口擴張；第四，中央控制的鬆綁導致經濟

³⁰ 陳元，「波蘭問題學術座談會紀要」，*問題與研究*，第 21 卷第 4 期(1982)，頁 19。

³¹ 吳玉山 *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台北：正中書局，1996)，頁 152。

³² Maurice D. Simon and Roger E. Kanet, *Background to Crisis: Policy and Politics in Gierek's Poland*(Boulder: Westview Press Inc., 1981), pp.304-307.

整體短缺的中央計劃無政府狀態；第五，經濟策略側重能源密集型工業。³³

1970年代後期波蘭外債高漲，波蘭歷經工業、農業、投資各方面的經濟收縮，吉瑞克試圖藉由提高工資來刺激消費，然而工廠卻無法生產足夠的商品，導致消費市場短缺和通膨攀升。吉瑞克進而提出「改善規畫和管理系統」的經濟改革，合併企業使波蘭工業更加集中和壟斷。波蘭因而面臨嚴重貿易失衡及債務危機，從1976年後，進口和投資無法再維持大幅增長，生產和消費之成長率也迅速下降。

國內面臨農業欠收、供應不足、糧食危機，工業輸出減少、農業輸出垂直下降、貿易赤字和外債增加，波共不得不謀求解決之道，終止物價凍結政策，被迫調高城市糧價。1976年6月之物價改革，再次引起全國之抗議，尤其是拉多姆(Radom)、烏蘇斯(Ursus)、普沃茨克(Plock)的工人暴動，物價調漲只能作罷，繼續由政府提供津貼彌補實際虧損。1980年7月，政府宣佈調整肉價，目的是逐步廢除津貼辦法，維持較為適當與正常之市場供應，人民積怨已久，反對勢力立即罷工抗議，結果導致團結工聯趁勢而出。

綜上所述，計劃經濟的實行易導致生產意願不振、生產力低落、產品品質差、資源浪費及濫用、生活水準低、缺乏國際競爭力等，對波蘭經濟造成先天不良影響。再者，共產主義主張對生活必需品、住宅、社會福利措施等大量津貼，更使波共面臨財政困境。儘管波共歷任執政者努力透過經濟改革試圖振興波蘭經濟，然而無法改變經濟結構性問題，成效有限。中央計劃經濟之結構性問題、中央計劃系統調解和控制功能的侵蝕、官僚協調經濟活動的失敗以及錯誤之經濟政策即為造成波蘭經濟危機之主因。

三、公民社會之形成

戰後波蘭之現代化帶來社會結構顯著之改變，傳統貴族政治式微，加上社會主義國家之工業化使得新中產階級出現，都市化使得大量人民離開鄉村移居都市，更降低農民之影響範圍。波蘭之世代流動首先發生在農村，由於農村收入低，農業問題嚴重，大量農民轉業為工人。1950年代，雖然大量農民轉業為工人，因新工人尚無工人意識，故較安份平靜。隨著時間推移，教育水準提高，如表 2-2

³³ Bartłomiej Kaminski, *The Collapse of State Soci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02-106.

所示，1980 年代接受中學教育人數為 1960 年代之三倍，1980 年代接受較高教育人數也為 1960 年代之兩倍。勞動階級之工人開始有所改變，勞動階級接受中學教育，已有社會基礎之意識，對報酬及生活方式標準提高。因此，組織抗議之工人開始出現，年齡主要介於 20 至 30 歲之間，相當年輕。吉瑞克的經濟政策對官僚和知識份子較有利，工人和農民受惠較少，成為不滿的新來源。

表 2-2 1950 年後波蘭人口發展趨勢

	1950 年代	1970 年代	1980 年代
人口百分比	(1956)	(1970)	(1990)
鄉村	57.2	47.7	38.3
都市	42.8	52.3	61.7
年齡分佈(%)	(1956)	(1977)	(1988)
15-24	16.6	19.2	13.7
25-49	33.6	33.7	35.7
50-59	9.8	9.8	10.6
60 以上	8.6	13.5	14.6
教育程度*(%)	(1960)	(1970)	(1988)
小學	80.3	73.9	44.3
中學	16.6	20.7	47.8
中學以上	3.2	5.4	7.9

註：*25 歲以上之民眾，表明達到完全或部份之該層級教育

資料來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tatistic Abstr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Paul S. Shoup, *The East European and Soviet Data Handbook*; UNESCO *Statistical Yearbooks*; United Nations, *Demographic Yearbooks*; 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in East-Central Europ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73.

波蘭領導精英及知識份子之關係於起始於 1956 年，隨後兩者差距及矛盾逐漸擴大。原先，知識份子之不滿運動主要在共產制度範圍內進行，其會員部份為左派份子，部份更是共產黨員。由於 1968 年 3 月之政治危機，隨之而來的反知識份子運動以及蘇聯侵襲捷克斯洛伐克，使得波蘭知識份子和波共思想上終於分

道揚鑣，1970 年代波蘭統治階級和知識份子之間的關係進入新的階段。³⁴

1975 年波共宣佈修改憲法，修改內容為合法化並鞏固共產黨之領導地位，將波蘭與蘇聯之聯盟關係由憲法的前言轉移至憲法本文，表現對蘇聯之忠誠。波蘭知識份子發表反對修憲之公開信，雖無法阻止修憲，但共產黨之領導地位開始受到質疑，同時彰顯波蘭知識份子已從 1968 年之壓迫復原並重新活躍於波蘭政治。再者，同年赫爾辛基協定(Helsinki Agreement)及其往後之會議，同意給予社會主義集團自由行使公民權和自由表達參與政策之權利，此舉造成波蘭國內一連串反對運動之興起，知識份子開始走上反對政府，成為不滿運動之策略者。

1976 年 6 月政府無預警宣佈物價上漲導致全國的抗議，不少工業城市出現罷工和示威遊行，武裝警察立即鎮壓工人的抗議，雖然成功阻止物價上漲，但處置野蠻與拘留工人引起全國之怒火。同年 9 月，知識份子成立「勞工保護委員會」(Committee for Workers Defense)，保護並提供工人法律及經濟的支持，透過出版地下刊物籌措資金。³⁵參與的主要人物有知識份子庫隆(Jacek Kuron)、米赫尼克(Adam Michnik)、經濟學家李賓斯基(Edward Lipinski)和小說家安德耶夫斯基(Jerzy Andrejewski)。勞工保護委員會全心為自由奮鬥，出版「資訊專欄」(Biuletyn Informacyjny)雙月刊，挑戰切斷國家資訊之壟斷，報導被捕工人遭受迫害情形及有關政府政策措施之資料，波共當局因而加強取締勞工保護委員會之不法活動或逮捕其成員，引發世界輿論。

勞工保護委員會是共黨歐洲第一個工人階級和知識份子間制度化合作較為成功的例子，勞工保護委員會之形成和其所採行之策略成為反對活動的典範，波蘭社會中之獨立組織漸增，獨立之政治社會形成，逐漸改變波蘭國內政治情勢。³⁶不同類型、不同訴求的獨立反對團體在波蘭各個城市出現，如「保護人權與民權運動」(Movement for the Defense of Human and Civil Rights)、「大學生團結委員會」(Students Defense Committee)，採行類似的運動模式替人權和政治權力發聲，地下出版社快速擴張並成為塑造公眾輿論的強力工具。1977 年勞工保護委員會和華沙知識份子合作，建立「巡迴大學」(Flying University)，學生團體舉辦一系

³⁴ Jakub Karpinski, "Polish Intellectuals in Opposition,"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36, No.4, pp.44-57.

³⁵ 欲了解該組織的詳細歷史，請參看 Jan J. Lipski, *KOR: A History of the Workers' Defense Committee in Poland*(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³⁶ Grzegorz Ekiert, *The State against Society: Political Crises and Their Aftermath in East Central Europe*, op. cit., p.232.

列講座，討論不能公開辯論的自由想法，教授則傳授波蘭真正的歷史文化。農民亦與知識份子聯合抗議當局，重開農民大學並於 1977 年 7 月成立知識中心，要求農地自營。

同年秋天，勞工保護委員會擴大會員數目及活動範圍，並改名為「社會自衛委員會」(Committee for Social Self-Defense-KOR)，主旨是給予因政治、哲學、宗教元因被迫害者財政支援與道德鼓勵，支持保護波蘭人權與民權之行使。創辦「工人報」(Robotnik)，報導波蘭境內勞工衝突狀況之新聞，普及於全國各工廠。該組織之重要成員，日後也成為團結工聯之領導人。1979 年反對運動更加蓬勃，「波蘭獨立聯盟」(Polish League for Independence)結合已存在之組織，發表精心製作之綱領，以恢復國家獨立為首要目標。「波蘭獨立聯盟」(Confederation for Independent Poland)是第一個明確之政黨，主張激進之民族主義方案。³⁷1970 年代末期，民主反對勢力成為能夠召集知識份子、調動各式秘密及公開活動資源、募集新成員且滲透社會各團體之重要政治力量。

1970 年代後期，由於其他反對派團體之大量出現，教宗選舉及其訪問波蘭，經濟情況日益惡化和黨內不滿日增，勞工保護委員會影響力迅速減弱。1980 年團結工聯成立前夕，勞工保護委員會幾乎停止運作不復存在，工人階級取代了知識份子，成為反對運動之領袖。1981 年 10 月，勞工保護委員會自願解散。

社會結構之改變、新中產階級之出現及知識份子之崛起，為波蘭民主反對運動開啟新的扉頁。1970 年代民主反對運動最主要的成就之一即為創造新的政治話語，重新喚起波蘭民族及歷史遺緒，復興政治及文化傳統及意識，並結合天主教會及民主左派人士，建立新的意識，並贏得大眾支持，最終促成團結工聯之出現。

³⁷ Ibid., p.233

第二節 波蘭內部結構

波蘭一直具備高度社會多元化，使其發展出有能力抵制部分政權意識型態和極權主義實行之公民社會。此外，儘管歷經各式政權，天主教會一直維持相對自主的狀態，並在波蘭政治、生活扮演不可或缺之角色。如此特殊之歷史背景，使波蘭內部發展出三大社會結構，分別是波共政權、天主教會及反對勢力。

一、波共政權

波蘭共產政權實際上屬於蘇聯之附庸國，由波蘭統一工人黨控制實行極權統治，因此多數的波蘭人將共產主義與失去獨立視為同義詞，然而波共政權對波蘭社會之控制卻不如東歐其他國家。波蘭具備社會多元化，不但天主教會保有自主權，農民保有私有財產，限制極權思想之滲透，並影響政權領導者的類型。

波蘭統一工人黨並非國家唯一政黨，1948年波蘭社會黨(Polish Socialist Party)融入波蘭工人黨(Polish Workers Party)，因而改稱為波蘭統一工人黨。此外，波蘭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亦融入農民黨之中，改稱為統一農民黨(United Peasant Party)。各政黨成為政府御用政黨，實際上則由波共一黨控制。

從史達林主義崇尚者別魯特(Boleslw Bierut)、相對寬容的波蘭民族主義者戈慕卡(Wladyslaw Gomulka)、累積大量外債者吉瑞克(Edward Gierek)、短期過渡者卡尼亞(Stanislaw Kania)至軍人政權者雅魯澤爾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波共執政者不斷的更換，同時伴隨著政策和意識型態的轉換。

別魯特執政時期，波蘭經歷一系列社會主義改革，人民承受無比痛苦，對波共政權產生極大不滿。蘇共二十大貶史，震撼波共政權及波蘭知識份子，知識份子開始抨擊波共政權要求改革。同時，波共也分裂成改革派及保守派，前者為本土派；後者為史達林派。改革派與保守派鬥爭之際，1956年6月28日爆發波茲南工人罷工，波共動用軍警鎮壓，長久以來被壓抑之民族感情迅速膨脹爆發。學生、工人、知識份子和農民紛紛批判共產黨體制，並一致要求限制共產黨之權力壟斷，增加人民之政治權力，更換波共領導階層。因此，過去反史達林體制之戈慕卡脫穎而出，在人民擁護之下，於1956年10月成為波共新的領導者。

戈慕卡時代是一段「民族共產主義」時期，戈慕卡是個獨裁、威權型領導人，執政時期進行共黨內部之改革運動，主張「波蘭之社會主義道路」(Polish road to Socialism)，主要方針為：成立工人委員會、擴大人民代表會議之權力及發展不同形式之農業經濟形式。³⁸改革基本上是政治上較為放鬆，經濟上較不堅持公有制和中央計劃之修正主義路線。戈慕卡不畏蘇聯壓力，堅持改革立場，並在蘇聯默許下成功推動改革，鞏固自身權力地位。

然而，改革熱潮過後，戈慕卡便日趨保守。戈慕卡利用黨內改革派(又稱修正主義)根除親俄派殘餘勢力，另一方面新保守派壓制改革派，維持權力平衡，利用派系鬥爭鞏固其權位。由於改革派主張黨和國家之民主化、經濟上採取更多分權、要求自由詮釋官方意識型態，令戈慕卡感到威脅，因此利用新保守派鬥爭改革派。³⁹戈慕卡之波蘭的社會主義道路並未脫離馬列主義意識型態，也未拋棄極權政治及中央計劃經濟，政治態度愈趨保守。

戈慕卡進行之體制改革並未矯正現存社經體制之問題，僅限於抨擊蘇聯模式之社經體制，因而限制改革之層面與成效。戈慕卡之體制改革非但未能解除體制弊端，反使其惡化，加深波蘭政治經濟危機。1970年12月爆發格但斯克工人罷工事件，迫使戈慕卡下台，吉瑞克取而代之成為波共新的領導人。

由於時代的進步，科技專才漸置身於政界之中，有別於昔日以出身背景決定其政治地位者，故1970年代後，處理經濟危機及政治異端的意識型態出現穩健派和保守派之分歧。穩健派反對經濟集中制，追求文化與宗教自由，加強工人諮商，提倡社會民主。保守派(即強硬派)強調中央計劃與管理經濟，對反對者採取強硬措施，遵循蘇聯模式，以減少莫斯科干涉。

吉瑞克被視為實用主義者及現代化提倡者，經濟政策方面提出「三高發展計劃」，即高速生產、高工資、高消費，實施「新經濟策略」，計劃再建設波蘭並完成第二次工業化。此外，將其信任之幹部安插於政府部門，進一步促成黨政一元化。政制改革方面，為了強化民主集中制，使黨深入基層，進行大規模之地方行政結構改革，將國家22省份改為49省份，各省之權限被削弱，更加鞏固中央對整體社會之控制。吉瑞克之改革著眼於改造黨，盲目追求現代化經濟發展，強調

³⁸ M. K. Dziewanowski, *The Communist Party of Poland*(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p.199, 262.

³⁹ *Ibid.*, pp.287-288, 290

三高政策，發展大規模經濟組織，既未認清政經體制之弊端，也未察覺國內經濟發展之問題及波蘭尚未準備好面對國際市場，此為其改革政策失敗之原因。吉瑞克未能觸及結構性體制改革，改革終告失敗，波蘭政經危機惡化。因此，1980年再度爆發格但斯克工人罷工事件，導致其下台，由卡尼亞上台執政。

波共政權對社會的統治力量不如其他東歐共產政權，1956年波蘭的共黨政權第一次向社會力量妥協，撤換領導幹部，從此喪失對社會全面控制的能力。⁴⁰吉瑞克上台代表波共政權第二次向社會力量妥協，雖然波共仍舊保有一黨專政的統治地位，但更換領導階層應對民怨之手法與1956年如出一轍。1980年7月，承續1956年和1970年之模式，波共試圖提高農產品價格，導致團結工聯興起，吉瑞克政權瓦解，波共領導階層第三次向社會巨大壓力屈服。共黨政權與波蘭社會互動之模式顯現出波共之脆弱和波蘭社會力量之強大。

綜觀戈慕卡、吉瑞克及卡尼亞之體制改革，皆是工人罷工之外來挑戰導致波共領導人更換，迫使波共進行體制改革。然而，局部性之政經改革，未能根除及改善結構性問題，結果政經改革均告失敗，從而引發更嚴重之政經危機，形成惡性循環。自別魯特政權以來，波蘭政經危機不斷，波蘭人早已對波共政權失去信心，並且質疑其統治之合法性、正當性，進而向波共當局施壓，要求改革。

二、天主教會

天主教於西元966年建教於波蘭，具有一千多年之悠久歷史，在波蘭政治、社會生活扮演不可或缺之角色。波蘭的過去是一段不斷被割據的血淚史，1795年至1918年，波蘭在歐洲地圖上消失123年，此段亡國時期，不論是普魯士、奧地利或是俄羅斯三國控制的地區，皆遏制組織自由並控制教育及出版，部分地區甚至限制在公開場合使用波蘭語，因為使用母語被視為是反抗的象徵，因此宗教活動成為波蘭人唯一能夠公開緩解並重顯民族社會關係的場合。⁴¹波蘭語和民族主義得以透過禱告、聖歌及禮拜的方式延續，⁴²天主教會不只成為波蘭民族主義在文化上及制度上的體現，領導人民頑強地反抗同化政策，保存固有的語言文

⁴⁰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台北：正中書局，1996），頁151。

⁴¹ Ewa Morawska, "Civil Religion versus State Power in Poland," *Society*, Vol.21, No.4, p.30.

⁴² Hank Johnston, "Toward an Explanation of Church Opposition to Authoritarian Regimes: Religio-Oppositional Subcultures in Poland and Catalonia,"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Vol.28, No.4(1989), p.498.

化，栽培無數知識份子，更成為波蘭民族主義的寄託。換言之，天主教文化是維繫波蘭民族感情之重要支柱。

二次大戰，波蘭遭受納粹德國侵略，天主教神父挺身而出，與波蘭人民共同浴血奮戰。戰後，波蘭被納入鐵幕之下，教會再度成為反極權統治之堅強堡壘。⁴³由於天主教會是波蘭社會之道德指標及精神力量，比起其他組織更能觸及主要社交網絡及社會基礎過程，成為波共政權無法忽視之威脅。因此，1953 至 1956 年間，波共曾試圖控制教會，軟禁教會首席主教維辛斯基(Stefan Wyszyński)並關閉教會學校及期刊，此舉引發波蘭社會更激烈的反抗。1956 年戈慕卡上台，對教會採行自由化政策，釋放首席主教並允許宗教回歸學校。由於波共求助於天主教會，以求安定大眾情緒，恢復社會秩序，強化其合法性，因此 1956 年至 1989 年間天主教會成為安定社會的力量。

上述政策在短期之內雖使波共得以鞏固自身權力，但長遠來看，卻使波共逐漸喪失政權之自主性，提高教會在民間之社會地位。天主教會保有相當之自主權，擁有組織上和思想上之能力對抗極權結構，天主教會和波共政權甚至形成權力相互認可之複雜模式，對波共政權產生莫大之威脅。

1970 年代之前，工人階級、知識份子和天主教會由於個別抗爭議題不同，故彼此並無聯繫。爾後，教會許多卓越哲學家、作家組成「天主教協會」(Znak)，其主要成員係以克拉克夫之「普世周刊」(Tygodnik Powszechny)、華沙聯誼月刊(Wieź)及「天主教知識份子俱樂部」(Club of the Catholic Intelligentsia)⁴⁴為主，強調順應 20 世紀之需求，提出新要求。⁴⁵再者，1962 年至 1965 年世界天主教界召開梵諦岡第二次大會(Vatican II Council)，會中教廷鼓勵天主教界面對世界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和文明危機，應尋求基本共識並謀求解決之道。⁴⁶

在教會精英提倡新時代新要求及梵諦岡之淑世精神激勵下，天主教會之立場有所轉變。1968 及 1970 年工人及知識份子反對運動遭受鎮壓後，天主教會成為

⁴³ 戴育毅，「波蘭政經體制改革之研究：團結工聯與波共政權互動之背景與演變」，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頁 125。

⁴⁴ 1956 年解凍之後，天主教知識份子俱樂部成立，希望能擴大公民自由並突破無處不在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型態，該組織在華沙、波茲南、弗羅茨瓦夫、克拉科夫等四城市設有據點，目標是拓展獨立思想、維護民族傳統、教育並深化宗教知識。欲了解詳細組織介紹請參見官網 <http://krakow.kik.opoka.org.pl/>。

⁴⁵ 戴育毅，「波蘭政經體制改革之研究：團結工聯與波共政權互動之背景與演變」，前引文，頁 126。

⁴⁶ George Weigel, "Catholicism and Democracy: The Other Twentieth-Century Revolu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12, No.4(1989), pp.13-15.

唯一能與波共政權抗衡之團體，因此 1970 年代起，維辛斯基主教領導天主教會，開始透過精神和物質上之方式支持許多異議份子及反對人士，各反對運動團體逐漸匯集，促成反對勢力更加壯大。

此外，波裔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 Karol Cardinal Wojtyla)對天主教會和反對運動亦發生重大影響。1978 年 10 月 16 日，梵諦岡教廷宣佈波蘭克拉克夫主教弗耶提瓦(Karol Wojtyla)當選天主教教宗，成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天主教會的聲望更勝以往，民族自信心一夕高漲。教宗於 1979 年 6 月 2 日抵達波蘭訪問 9 天，共訪問 6 大城市，舉行 32 場佈道演說。佈道演說中，重申教會之一貫主張：基本人權、信仰自由以及教會之歷史地位，使教會成為波蘭社會獨立和持續抵抗共產黨的象徵。雖然過去天主教會在波蘭勢力之龐大眾所皆知，但此次卻真實呈現教會之力量，同時也顯示出波共無法整合社會、控制教會。

該次出訪展現了波蘭人的團結並再次應證波蘭政黨國家道德的貧困，教會組織之龐大足以與波共抗衡，教宗出訪是波蘭政治之轉捩點，教會當局顯然提供組織團結工聯道德上的法理依據，間接促成團結工聯之誕生。

事實上，教宗來訪前，波蘭社會已發生重大轉變。教宗選舉及出訪波蘭正值天主教知識份子俱樂部積極進行反對運動之時期，除了教會層級的反對勢力，許多神父也參與甚至組織反對團體，因此教會時常成為未經授權之聚會、演講及辯論之舉辦場所。更由甚者，未經授權之天主教青年運動(Catholic Youth Movement)吸引超過 20 萬名學生。

天主教會之道德權威通過組織力量相互配合，1970 年代晚期，波蘭教會擁有可觀之人力及物質資源。當時，波蘭教會共有 27 個總教區，並再劃分成 7118 個教區。擁有 27 個主教及 15444 位神父，男性修道院擁有 7716 位成員，包含 3977 位修道院神父及 26586 位修女。教會擁有 12213 間教堂及禮拜堂、2449 間修道院、46 間神學院、4 間教宗學院、非國有之天主教大學、以及天主教神學學院。天主教媒體出版 15 種宗教刊物，其中最受歡迎之刊物甚至擁有 200000 名讀者。⁴⁷天主教會成為波蘭社會上及政治上不可忽視之力量。

整體而言，天主教會一直採取溫和路線，避免成為反對運動之領導中心，在波蘭社會扮演促進團結一致的角色。教會並未鼓勵人民直接與政權對抗，而是藉

⁴⁷ Grzegorz Ekiert, *The State against Society : Political Crises and Their Aftermath in East Central Europe*, op. cit., pp.235-236.

由公開譴責政權，守護大眾良心，安撫現有體制犧牲受害者、伸張正義，並提供免費傳道和宗教學說填補虛偽政治宣傳，持續提倡非暴力。

三、反對勢力

根據英國學者 John Keane 之研究，現代「公民社會」的概念興起於 1980 年代末期至 1990 年代初期，係指與國家對立之自主社會。⁴⁸隨後，公民社會研究論點有所轉變，認為公民社會在國家民主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無論該國最後是否走向真正的民主化，公民社會之發展在其過程中皆為重要之推手。不論是學生、知識份子、勞工階級或是非政府組織發起之社會運動，皆是公民社會之表現。

雖然波蘭之公民社會發展不如西歐國家，但政府仍舊給予波蘭公民社會有限之自主權。直至蘇聯控制波蘭之後，波蘭公民社會受到史達林體制之壓迫。⁴⁹波共政權前期，由國家及政黨主導社會各個層面，社會鮮少有自主力量存在。1970 年代，異議份子首先提出公民社會之概念，主要目的是藉以對抗國家；1980 年代末，公民力量推倒共黨政權並取代共黨政權負責國家機器之運作；1990 年代初期，剛取得政權之公民團體轉型為政黨以維持執政利益。⁵⁰

波共政權時期，公民社會是反抗共產政體及國家之形式，其中反對運動是反抗波共政權最普遍之方式。反對運動係指人民對既存社會秩序或官方政策不滿，成立組織(不論是永久或暫時，不論是合法或非法)，動員民間社會力量，明確地對官方政策表達不同意見，或是批評官方政策。其目的是建立獨立自主之社會組織，以期改變既存社會秩序或官方政策。⁵¹

波蘭反對運動之崛起，絕非一夕之間形成，而是經年累月醞釀發展之結果。學者 Ash 更將波蘭歷史利用累積算術以月份表示，將團結工聯之成因與反對運動之歷史發展列成以下等式，⁵²波蘭反對運動之發展脈絡一目了然。

⁴⁸ John Keane, "Despotism and Democracy,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1750-1850,"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New European Perspectives*(London: Verso, 1988), pp.35-36.

⁴⁹ Michael Bernhard,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08, No.2(1993), pp. 310-311.

⁵⁰ 鄭得興，「中東歐的公民社會與民主發展之比較研究」，*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4 卷第 1 期(2008)，頁 67。

⁵¹ Jacques Rupnik, *Dissent in Poland 1968-1978: The End of Revisionism and the Rebirth of the Civil Society*(London: Macmillan, 1979), p.61.

⁵² Timothy Garton Ash., *The Polish Revolution: Solidarity*, op. cit., p.31.

1980年8月=1956年6月+1968年3月+1970年12月+1976年6月

1956年6月28日，由於去史達林化之不一致以及經濟發展之停滯，爆發波茲南工人運動，戈慕卡進行政經改革。波茲南罷工事件後，1956年至1957年間波蘭各企業工人自組5600個工人會議，要求自治，迫使波共承認其合法性並頒布工人會議法令。規定其職權為：負責監督企業行政，批准企業年度計劃及執行計劃，決定企業之發展方向及組織結構，決定勞動定額、工資及獎金條例、企業基金及利潤分配。⁵³但因為官僚階級極力反對，故1958年底成立「工人自治會議」(KSR)，由工人會議、工人委員會、黨委員會及青年團代表組成，工人會議淪為諮詢機構，仍由波共控制。工人會議之失敗，原因在於工人會議間各自獨立，毫無組織聯繫，然而其失敗之經驗成為之後團結工聯之借鏡，組織結構及目標也繼續沿用。

1968年3月8日，波蘭學生和知識份子聚集在華沙大學，發起反對戈慕卡文化政策和縮減1956年讓步的大規模遊行，警方強力驅散並逮捕若干學生領袖，引發全國學生不滿，其他大城市學生紛紛進行示威請願等抗議活動響應。鎮壓事件對知識份子造成極大衝擊，使其徹底放棄體制內改革，直接動員民間力量，發展反對運動。

1970年12月14日，政府為穩定經濟決定提高物價，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之工人首先舉行罷工，罷工迅速蔓延至沿海城市格丁尼亞(Gdynia)、索波特(Sopot)，罷工工人要求撤銷漲價，以民主方式選舉工會及工人議會機構，參與群眾亦由工人擴及學生、市民及知識份子。波共當局派出大批警力，對群眾進行武裝血腥鎮壓，造成流血衝突。罷工結果導致戈慕卡政權終結，由吉瑞克接任，且向工人保證提高工資以抵銷糧食上漲之影響，使工人獲得向政府經濟政策挑戰的權力。此罷工運動之成功，不僅是工人階級團結之重要轉捩點，更是工人和其他社會團體和國家權力關係之重要轉捩點，為1976年後工人及知識份子之結合鋪路。⁵⁴

⁵³ 王逸舟、孫紹智，**波蘭危機**(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14-115。

⁵⁴ 戴育毅，「波蘭政經體制改革之研究：團結工聯與波共政權互動之背景與演變」，前引文，頁122。

1976年6月，農業欠收及外債增加之情況下，吉瑞克不得不調整物價，引發拉多姆和烏蘇斯發生罷工，政治反對勢力在勞工保護委員會和天主教的支持下紛紛響應。吉瑞克雖暫緩物價上漲，但武裝警察過份處置引起全國怒火，勞工保護委員會努力保護並提供工人法律及經濟支持。最後波共在各方壓力下讓步，決定對此事件之被告者減刑及釋放。勞工保護委員會之成立，標示著純經濟利益驅動的工潮開始與大規模之社會變革運動發生連繫。

自1950年代開始，波蘭反對運動層出不窮，波共雖再三鎮壓，仍無法遏阻。1950至1960年代，反對運動以黨內知識份子為主，傾向體制內改革，針對共黨政策提出異議。1950至1970年代工人亦發起多次罷工，要求自治與改革。然而由於歷次改革均失敗，政經危機不斷，1970年代黨內知識份子也開始轉向公民社會，表達反對並尋求體制外之改革。早期的反對運動受到社會分裂的阻礙、缺乏獨立組織、無法闡明整合不同的政治主張、缺乏替代的政經制度意見，因此均以失敗收場。1976之工人暴動克服集體抗議之分裂，發展出替代之政治意見及跨階級之聯盟，知識份子及工人開始結合。

綜上所述，波蘭的反對勢力從戰後就一直存在，1950至1960年代並無組織性的集結，較多是知識份子所引發的論述和批評，直到1970年代反對勢力才開始匯聚，尤其是1976年前後各種組織紛紛成立。波蘭知識份子與工人反對運動之目的均為向官方意識型態挑戰，反抗波共極權統治，企圖建立獨立自主之社會組織，以期改變既存社會秩序或官方政策，最終建立公民社會之理想。1980年代，團結工聯誕生，波蘭終於成立第一個獨立工會，並成為波蘭主要之變革力量。

第三節 團結工聯之成立過程

1980 年代波蘭反對勢力進入新的高峰，爆發空前的罷工潮，1979 年教宗之出訪是波蘭政治的轉捩點，教會當局顯然為團結工聯組織提供了道德上的法理依據，團結工聯之成立在波蘭政治發展史上更有重要意義，因為其代表波蘭民族主義、為勞工爭取權利之工會團體及全國性之民主運動三股勢力之結合。⁵⁵這三股力量過去未曾結合在一起，團結工聯之成立象徵社會勢力之大團結。此外，華勒沙對於團結工聯之成立更是功不可沒。

一、罷工運動再起

華勒沙之崛起可謂偶然，然而時勢造英雄，其不但是團結工聯之推手與領導者，日後更成為波蘭共和國之總統。華勒沙為木匠之子，只受過小學和職業教育，1967 年畢業後即進入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擔任電工，1970 年參與造船廠流血罷工，此次罷工中，80 名工人死於防暴警察鎮壓。之後其被當局指控犯有「反社會主義罪」，受到嚴密監控並入獄一年。1976 年，華勒沙在造船廠徵集簽名，要求為 1970 年罷工死難工人建立紀念碑，因此被造船廠開除，隨後多次受到逮捕。

1979 年 12 月自由工會委員會(Committee of Free Trade Union)在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大門前為 1970 年傷亡者舉行非官方之儀式，儘管大批警力嚴陣以待，仍有 5000 人聚集。華勒沙發表演說：「只有一個有組織且獨立之社會才能為自己發聲，因此我呼籲大家加入獨立團體來自我防衛，彼此協助...每個人明年都應該在相同時間、相同地點會合，每個人都應該帶著一顆石頭，如果當局拒絕建造紀念碑，我們將用自己的雙手建造！」⁵⁶演說前半部份重申勞工保護委員會之核心策略，後半部份則是華勒沙之個人諫言，此次成功之演說，奠定其後對罷工勢力之影響力。

1980 年 7 月 1 日，波共宣佈提高肉類之供應價格，立刻引起波蘭民眾的激烈反對，華沙及其他城市工廠工人紛紛罷工抗議。波共當局仍採取一貫作法，試圖以武力壓制罷工。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之一位起重機操作員、同時也是勞工運

⁵⁵ Alain Turaine, Francois Dubet, Michel Wieviorka and Jan Strzalecki, trans. David Denby, *Solidarity: The Analysis of a Social Movement—Poland 1980-8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1.

⁵⁶ Timothy Garton Ash., *The Polish Revolution: Solidarity*, op. cit., p.31.

動領袖瓦倫第諾維茨(Anna Walentynowicz)遭到解雇，點燃罷工運動之引信。7月6日，位於波蘭東南部靠蘇聯邊境的盧布林(Lublin)工人舉行罷工，使得通往蘇聯的鐵路運輸中斷。罷工工潮迅速蔓延，8月14日起，罷工由自發分散轉向集中聯合，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率先成立罷工委員會，工人擁護華勒沙擔任主席，領導罷工行動。罷工五大訴求為：恢復瓦倫第諾維茨及華勒沙職位、薪水增加2000波幣、家庭津貼、保障罷工者人身安全及建立1970年死難工人紀念碑。廠長被迫同意建立紀念碑，華勒沙及罷工工人得到初步勝利，然而其他訴求尚未滿足，罷工並未停歇。

雖然政府有意壓制格但斯克罷工的消息，但消息藉由自由歐洲電台(Radio Free Europe)的傳播散佈至鐵幕國家，並藉著地下出版刊物和小道傳聞將罷工運動的消息迅速的傳遍整個波蘭。8月16日在社會自衛委員會的策動下，格但斯克、格丁尼亞與索波特共計二十一個工廠成立由華勒沙領導的「罷工委員會」(Interfactory Strike Committee)，宗旨為協調罷工工廠企業的要求和行動，同時推選十一人組成「聯合罷工委員會主席團」向波共提出十六項要求，但談判未有結果。8月22日聯合罷工委員會又向波共政權提出二十一項要求，除前提之十六項要求外，新增加五項要求。8月23日，聯合罷工委員會派出代表團，與波共政權副總理雅吉爾斯基(Mieczyslaw Jagielski)進行第一回合會談，雅吉爾斯基於次日返回華沙匯報。

8月24日，「專家委員會」(Committee of Experts)成立以協助罷工委員會，其成員除了參與格但斯克罷工之蓋萊梅克(Bronislaw Geremek)和馬佐維茨基(Tadeusz Mazowiecki)之外，還包含天主教協會、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天主教知識份子俱樂部等知識份子。以該委員會為核心，其他知識份子紛紛開始參與，擔任智囊並協助整理檔案文件，這是罷工工會工人和知識份子合作的開始。⁵⁷當會談僵持之時，同日波共政權宣佈改組政府，以息眾怒，解除總理巴比赫(Edward Babiuch)職務，平可斯基(Jozef Pinkowski)為繼任總理，並進行內閣改組。⁵⁸

8月26日改組後之波共政權副總理雅吉爾斯基率領政府委員會，與罷工領袖華勒沙進行第二回合會談，罷工委員會堅持釋放若干被捕之罷工領袖，以及允

⁵⁷ Alain Touraine, Francois Dubet, Michel Wieviorka, Jan Strzelecki, *Solidarity: The Analysis of a Social Movement: Poland, 1980-1981*, op. cit., p38.

⁵⁸ J.B. de Weydenthal, "Workers and Party in Poland," *Problems of Communism*, Nov.-Dec. 1980, p.7.

許工人組織自由工會，擺脫共黨控制。波共自然不願接受，只允許其他方面讓步，會談無疾而終。8月28日雙方進行第三回合會談，雅吉爾斯基以外國媒體在場為由離場，中斷會談。8月30日，波共政權與罷工委員會舉行最終會談，談判中同意工人在承認波蘭統一工人黨之領導及波蘇聯盟條件後方可成立獨立工會，並同意為1970年罷工中喪生之工人建立紀念碑，恢復1970年罷工被開除工人之工作及保證參與此次罷工者之人身安全等二十一項要求。雙方達成二十一點協議，次日經由波蘭國會批准後簽屬「格但斯克協議」。協議如下：⁵⁹

- (一)承認自由工會獨立於黨和企業，遵守政府批准之國際勞工組織協定第87條中有關人民有權組織自由工會之規定。
- (二)保障罷工權利，保障罷工者、協助罷工者之安全。
- (三)遵照憲法保障言論自由、新聞和出版自由，包括保障獨立出版之自由，保障各階層代表有機會使用大眾傳媒。
- (四)
 - 1.恢復1970及1976年罷工被解雇者之職位，因政治因素被開除之大學生予以復學。
 - 2.釋放所有政治犯。
 - 3.禁止因個人信仰而受迫害。
- (五)大眾媒體公布廠際委員會之成立與要求。
- (六)充分報導社會經濟實況並給予社會團體和各社會階層參與改革計劃機會。
- (七)補償所有參加罷工者罷工期間之工資。
- (八)每月底新增2000波幣以補償物價上漲。
- (九)隨通貨膨脹自動調整工資。
- (十)充分供應國內市場產品，剩餘才出口。
- (十一)廢除商業價格及特約商店之外幣買賣。
- (十二)市場情勢穩定前，肉和肉類產品採配給制。
- (十三)管理專業人員之任用根據其資格而非黨員為條件，廢除特別商店，廢除祕密警察、一般警察及黨工特權，國家補助一視同仁。
- (十四)女性退休年齡降為50歲，男性降為55歲。或女性就業滿30年，男性就業滿35年，不論其年齡均可退休。
- (十五)退休金及養老金與實際收入一致。

⁵⁹ Timothy Garton Ash., *The Polish Revolution: Solidarity*, op. cit., pp.42-44.

- (十六)改善工人之健康服務，提供完善之工人醫療保險。
- (十七)保證提供職業婦女之兒女足額幼稚園及托兒所。
- (十八)准許三年產假並支薪。
- (十九)縮短等候房屋配給之時間。
- (二十)增加遣散費(從 40 增至 100 波幣)及增加獎金。
- (二十一)週六休息，軍營或輪班員應予補假或加薪補償。

協議之前六項為基本要求，其餘才是特定、局部之物質利益，這份協議不僅是三城市工人之需求，更是全波蘭人民之需求。華勒沙簽訂協議後表示：「我們得到現狀下我們可獲得的一切，我們也將得到剩下的，因為我們擁有最重要的一獨立自治的工會。」⁶⁰格但斯克協議簽定後，總理平可斯基為平息其他地區之工人罷工行動，宣佈該協議適用於所有工人，各地區皆簽定內容相似之協議。格但斯克協議對工人而言是一個巨大的勝利，也是對人權自由的突破。格但斯克協議的簽定，被視為打破東歐共黨國家一黨專政的開端，也代表波蘭公民社會的復興，儘管只維持很短的時間。此次罷工事件成功之因素主要在於反對勢力前所未有的匯合，包含勞動工人、中間階層雇員、工程師、管理者、知識份子及大學生緊密的團結在一起，為共同之目標努力。

二、團結工聯之成立

波共政權雖一再讓步，但允諾之協議尚未完全實行，因此各地罷工行動不時興起。9月6日，波共中央委員會(Party's Central Committee)決議罷黜吉瑞克，卡尼亞成為波共新的領導者。1980年9月17日，全國各地共計35個獨立工會數百名代表齊聚格但斯克開會，討論建立全國性自治工會組織，統一組織章程並選舉領導機構。共計3500家工廠加入，會員數超過三百萬人，數量之龐大，可謂前所未有。團結工聯(Solidarity)就此誕生，並推選華勒沙擔任主席。⁶¹

華勒沙的第一個任務為確保團結工聯能正式及合法註冊，9月24日華勒沙代表團結工聯向華沙法院申請合法登記，卻遭其拒絕，理由主要是：(一)組織章程未明定波共在國家之領導權；(二)依據協議，團結工聯為地方工會組織，章程

⁶⁰ Adam Roberts, Timothy Garton Ash, *Civil Resistance and Power Politics: The Experience of Non-violent Action from Gandhi to the Pres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36.

⁶¹ Timothy Garton Ash., *The Polish Revolution: Solidarity*, op. cit., pp.74-75.

將其範圍擴及全國；(三)章程禁止黨員、經理於工會任職。對此，華勒沙提出抗議，聲明絕不接受有損章程之修正，但願以附屬文件對黨及政府有限度妥協。團結工聯遂向最高法院上訴，並宣佈 10 月 3 日發動警告性罷工，並向波共提出四項要求：接受協議、有權使用媒體、提高工資、有權組織工會。⁶²

10 月 24 日華沙地方法庭宣佈團結工聯有權申請登記，但法院未經同意，擅自在團結工聯組織章程中加入工會承認黨之領導作用等修正條款，限制工會之獨立地位與運作。華勒沙與全國協調委員會憤與天主教知識份子俱樂部商討對策，全國協調委員會要求副總理雅吉爾斯基於 10 月 27 日親自前往格但斯克造船廠談判，若當局仍不讓步則於 11 月 12 日起發動輪流罷工。10 月 31 日團結工聯代表至部長會議與政府官員談判，除要求私有農民有權成立獨立工會之外，另增加四點新要求：有權使用媒體、增加工資、增加商店供應、停止鎮壓工會及工會成員，並同意等待最高法院判決。⁶³ 11 月 10 日波蘭最高法院批准章程，工會也接受本身活動之範圍及和黨之關係，團結工聯終於順利註冊登記，成為合法的工人組織，同時獲得波蘭民眾全體的諒解與支持。

團結工聯也由單純的工會轉變為一個社會運動，接下來 500 天內，九百萬至一千萬勞工、知識份子和學生加入了團結工聯或其附屬團體，例如 1980 年 9 月成立的獨立學生聯盟(Independent Student Union)、1981 年 5 月成立的農民工會農業團結工聯(Independent Self-governing Trade Union of Individual Farmers Solidarity)、獨立工匠自治團結工會(Independent Self-governing Trade Union of Individual Artisans Solidarity) 等。

三、團結工聯之組織與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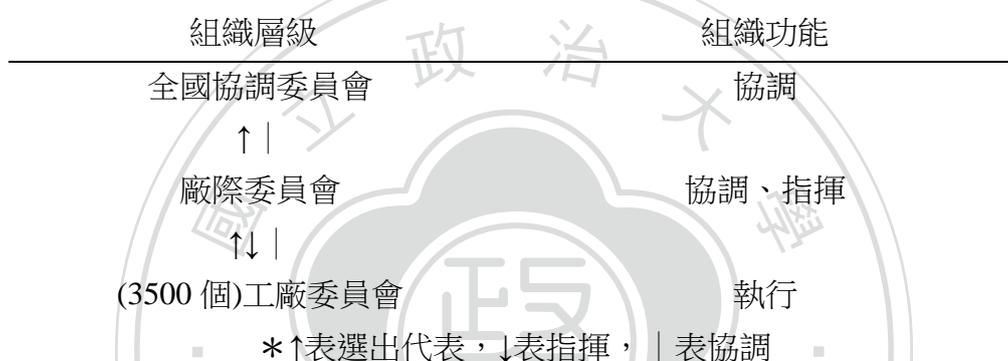
團結工聯是 1980 年代工人罷工運動之延續，成功原因在於記取過去工會運動失敗之教訓。團結工聯之組織結構及目標基本上承襲 1956 年之工人會議運動，然其與更補足過去反對運動之不足。團結工聯具備嚴密之組織結構、抗議與談判之策略、明確之目標及多元包容之團結等特性，使其成為波蘭社會一股撼動波共政權的強勁力量。

⁶² Ibid., pp.75-80.

⁶³ Ibid., pp.81-82.

組織結構方面，團結工聯成立之初，是完全以各地工會為基礎之組織，基層單位為工廠委員會(Factory Committees)，由工人和其他工廠、公司之員工組成。各工廠委員會選出代表，組成廠際委員會(Interfactory Founding Committee)，負責協調工廠委員會相關事務，並計劃指揮工廠委員會之行動。中央則有廠際委員會選出之代表組成全國協調委員會(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ssion)作為協調中心，負責協調廠際委員會之行動，對外代表團結工聯，管理組織財政及選用行政人員。其組織架構如圖 2-1 所示：

圖 2-1 1980 年團結工聯組織結構



資料來源：J.B. de Weydenthal, *The Polish Drama: 1980-1982*(Mass: Lexington Books, 1983), p.11，戴育毅，「波蘭政經體制改革之研究：團結工聯與波共政權互動之背景與演變」，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頁 157

團結工聯企圖改變國家與社會之關係，因此 1980 年至 1981 年間，團結工聯與波共領導階層皆為以何種方式將獨立自治工人運動整合於國家社會主義之社會政治中而爭執。波共以為其代表工人階級，致力於體現其利益，具備控制社會及統治之合法性。但團結工聯強調現行制度無法反映工人利益，宣稱其才是真正代表工人利益之機構，並透過「抗議與談判」向官方工會及國家權威挑戰。

1981 年團結工聯全國代表大會(National Congress)之前，團結工聯之「抗議與談判」策略成效非凡，波共政權束手無策，政黨領袖更迭不斷，作出許多讓步。其行動策略條列如下：⁶⁴

⁶⁴ 陳元、畢英賢等，「波蘭問題學術座談會紀要」，*問題與研究*，第 21 卷第 4 期(1982)，頁 9。

(一)聯合抗議：在波蘭多數城市同時舉行抗議，將全國視為一體，使抗議成為社會運動。各抗議團體規模小但獨立活動，並掌握主動權。抗議主要手段包含張貼標語、發放傳單及示威、怠工與罷工等。

(二)依賴教會：絕大部分波蘭人民信仰天主教，與教會取得聯絡可透過教會影響廣大群眾。此外，維辛斯基主教曾多次與波共領導者會晤，也多次與團結工聯領袖接觸，教會支持團結工聯，也支持人民自由結社及自由表達之權利，教會可成為團結工聯與波共政權之協調者。再者，可利用教會爭取西方國家之道義支持。

(三)組織各式職業工會：團結工聯致力於促使其他社會組織產生，例如農民工會、農業團結工聯、獨立工匠自治團結工會、藝術協會等，並與波共官方工會組織保持聯繫，邀請官方工會組織代表參與活動、會議，企圖使上述組織成為壓力團體。

(四)施壓談判：團結工聯先宣佈罷工日期，同時要求波共政權就某些議題舉行談判，在正式罷工前，往往先進行數小時之警告性罷工，以使波共被迫在談判中讓步。團結工聯申請登記、批准章程、爭取獨立地位之過程即為最佳例證。

(五)進行罷工：罷工分企業單位罷工、地區性罷工與全國性罷工。此為最後手段，非不得已不輕易使用。罷工方式是各工人佔據工作崗位，不離開、不工作。罷工策略主要是以罷工作為自我防禦之手段，如談判遭拒絕則採取罷工；如果要求被接受則敦促政府實現諾言；若政府鎮壓或不遵守諾言，則再次發起罷工。

(六)抗拒政府收購糧食：團結工聯領袖認為糧食是籌碼，可迫使政府談判或讓步。因此，團結工聯會勸阻甚至迫使農民抗拒政府收購糧食。

(七)成立新聞機構：向國內外傳播工人運動之活動與措施，以便求行動一致，外求國際支援。

除了抗議與談判策略之外，華勒沙主動向波蘭知識份子抗議組織求助，例如「天主教知識份子俱樂部」、「經驗和未來俱樂部」、「社會自衛委員會」等組織。這些組織之部份成員後來成為團結工聯之智囊團，為團結工聯籌謀策劃，提供工人運動之行動方針，使運動有計劃、有秩序的進行。團結工聯委員會設有二十五位謀士組成之計劃協調組，負責設計工人運動之策略並提供情報，統籌並分配協調工聯行動。⁶⁵

⁶⁵ Joanna M. Preibisz ed., *Polish Dissident Publication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2), pp.236-237.

團結工聯係指一股結合波蘭多元化社會之勢力，共同對政府之政治及經濟改革施以壓力，有計劃運用其力量對抗波共政權。團結工聯特別聲明自身之立場：「我們是一個意識型態寬容的組織，我們的成員包含所有各行各業善意的人們，不論其思想、黨派及信仰。嚴格來說，我們是一個多元化的工業組織。」⁶⁶秉持多元化之立場，團結工聯結合各式受壓迫之團體對抗波共政權，其龐大之會員數(將近一千萬人)更反映其團結性和包容性。

團結工聯的黨綱提到：「歷史告訴我們，沒有自由便沒有麵包。而我們心裡有的不只是麵包、奶油和臘腸，還有正義、民主、真理、合法性、人性尊嚴、信念的自由以及對共和國的改革。」⁶⁷二戰之後，中東歐國家第一次面對力量如此強大、組織完善的反對勢力，其動搖整個國家並試圖攫取政治控制。



⁶⁶ David W. Paul and Maurice D. Simon, "Poland Today and Czechoslovakia 1968,"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30, No.5, p.36.

⁶⁷ 原文: History has taught us that there is no bread without freedom. What we had in mind were not only bread, butter and sausage but also justice, democracy, truth, legality, human dignity, freedom of convictions, and the repair of the republic.

第四節 小結

以政治體制而言，波共長期一黨專政、官僚主義盛行、政策制度傾向蘇聯、意識型態衰敗，導致經濟劇烈衰退、社會廣泛不平等、收入差距擴大、社會特權利用職權營利、貪汙腐化，人民無權表達政治思想和言論自由，引起社會各階層的不滿與抵抗，漸漸累積成不可忽視之政治危機。以整體經濟體制而言，實行計劃經濟易導致生產意願及生產力低落、產品品質差、生活水準低、缺乏國際競爭力等問題。共產主義提供社會大量津貼，更使波共面臨財政困境。中央計劃經濟之結構性問題、中央計劃系統調解和控制功能的侵蝕、官僚協調經濟活動的失敗、經濟政策之錯誤即為造成波蘭經濟危機之主要原因。此外，社會結構改變、新中產階級出現及知識份子崛起，使得波蘭各城市出現不同類型、不同訴求的獨立反對團體，為波蘭民主反對運動開啟新的扉頁。

波共政權雖屬於蘇聯附庸國，卻較偏向威權政權。執政者更迭頻繁，社會力量迫使波共進行體制改革。然而，局部政經改革未能根除結構性問題，不但改革均告失敗，並引發更嚴重之政經危機。天主教會是波蘭社會的精神支助，團結工聯成立前，教會是波蘭唯一有組織之力量，一直採取溫和路線，避免成為反對運動之領導中心，扮演促進團結一致的角色。教會雖未鼓勵人民直接與政權對抗，但藉由公開譴責政權，安撫民眾、伸張正義，並扮演反對運動和波共政權之間的協調者。早期的反對運動受到社會分裂的阻礙、缺乏獨立組織、無法闡明整合不同的政治主張、缺乏替代的政經制度意見，因此均以失敗收場。

1980年代波蘭反對勢力進入新的高峰，爆發空前的罷工潮，反對勢力前所未有的匯合，波共被迫簽定格但斯克協議，該協議被視為打破東歐共黨國家一黨專政的開端。團結工聯隨後誕生，波蘭終於成立第一個獨立工會，並成為波蘭主要的變革力量。團結工聯具備嚴密之組織結構、抗議與談判之策略、明確之目標及多元包容之團結等特性，使其成為波蘭社會一股撼動波共政權的強勁力量。此外，團結工聯在波蘭政治發展史上更有重要意義，因為其代表波蘭民族主義、為勞工爭取權利之工會團體及全國性之民主運動三股勢力之結合。

面對團結工聯如此強勁又有組織的反對勢力，波共政權自然不會坐以待斃，新的對立與衝突隨之展開。

第三章 約定轉型期(1980-1989)

「對我來說，『圓桌會議』如同『團結工聯』，都是我們自己政治創造力的表現。『團結』具有基督教的精神，『圓桌會議』也有『團結』精神。『團結』和『圓桌會議』這兩個概念，強烈體現一條從革命世界邁向和平世界的波蘭和平之道。」
—Józef Tischner，波蘭神父及神學家，1995年⁶⁸

團結工聯是一個工會，1980年成立最初之目的僅限於生活條件的改善等有關經濟之問題，並在格但斯克協議提及承認其自由工會之要求，並非直接反對波共政權抑或外國勢力支配。波蘭反對運動與1956年匈牙利及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兩個東歐國家不同之處在於團結工聯主要是在工廠裡運作，原先的宗旨是保護工人對抗雇主之利益並獲得更好的報酬及工作環境。

波蘭自1980年7月爆發全國性大規模工人運動，至1981年12月波共政權實施戒嚴，血腥鎮壓團結工聯為止，期間約有一年半之時間，波共政權曾經歷三次重大改組，直到身兼黨政軍三職之雅魯澤爾斯基執政，決定派遣軍隊鎮壓，反對勢力從而轉向地下發展。波蘭之政治經濟危機越來越嚴重，波共政府對於社會之控制也越來越弱。1980年代對波蘭而言是制度劇烈變動的年代，但同時亦是迎接改變的年代。

團結工聯不再只是工會，而是一個具有政治色彩的社會運動，不但擁有千萬會員，力量更散佈波蘭全境，其代表波蘭政治社會一股龐大的勢力，也是波蘭民主化的象徵。波共政權也不再故步自封，願意放低身段與反對勢力對談，朝野兩種勢力開始共同尋求解決波蘭問題的方法及途徑，進而促成圓桌會議之召開。

本章主要探討戒嚴時期團結工聯之地下發展、圓桌會議及波蘭之約定轉型，首先探討戒嚴之實施原因及工聯如何透過地下發展生存，持續與波共抗爭。接著分析圓桌會議之召開背景、參與成員、會議形式，檢視團結工聯與波共政府雙方採取何種議價機制，歷經何種讓步過程，最後達成哪些協議。圓桌會議促成非民主政權的垮台，是波蘭約定轉型的代表事件，也是本章的論述重點。

⁶⁸ Michael D. Kennedy, *Negotiating Revolution in Poland: Conversion and Opportunity in 1989*(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Eurasian and East European Research, 2002), p.1.

第一節 戒嚴與地下發展

1980 年代以來，團結工聯透過抗議與談判之策略，迫使政府作出許多讓步，削弱波共政權之權威。主要原因在於團結工聯內部團結一致，以華勒沙為首之溫和派主導一切。同時，波共領導階層內部呈現分裂狀態，一派主張向團結工聯妥協，另一派則主張與團結工聯對抗到底。然而，團結工聯內部卻逐漸分裂為激進派與溫和派，針對波共政權之應對模式產生分歧。

一、團結工聯之內部問題

什切青(Szczecin)工會領袖朱爾契克(Manian Jurczyk)、比得哥什(Bydgoszcz)工會領袖魯列夫斯基(Jan Rulewski)及格但斯克工會領袖格維亞茲達(Andrzej Gwiazda)是團結工聯激進派之代表，不但批評華勒沙溫和派與波共政權過份妥協讓步，更抨擊蘇聯干涉，認為團結工聯已有能力對抗政府。溫和派則認為激進派立場過於激烈，容易造成團結工聯與波共政權間之衝突，因此華勒沙一再主張採取溫和路線，避免暴力對抗。雙方立場相左，開始走向極端。

隨著抗爭運動不斷擴展，波共政權之力量日益萎縮，抗爭運動則日益激進。團結工聯與波共政權早期關係最緊張之時刻之一即為比得哥什危機(Bydgoszcz Crisis)。⁶⁹隨著團結工聯合法化，波蘭農民欲成立農民工會農業團結聯盟，卻受到波共反對，因而決定於 1981 年 3 月 19 日舉行罷工。波共政權決議舉行地區會議共同協商，激進派之魯列夫斯基與若干成員遂決定參與會議聲援農民。然而會議協商未有結果，武裝警察卻進入會場，攻擊毆打與會代表，導致魯列夫斯基等人嚴重瘀傷，引發民眾不滿。街上充斥傷者照片及海報標語，團結工聯領袖嚴厲譴責波共強硬派歐修夫斯基(Stefan Olszowski)等人企圖藉此事件升高朝野對抗。因此，全國協調委員會宣佈 3 月 27 日發動 4 小時全國性罷工，此為蘇聯集團東歐國家歷史上規模最大、組織最完善之罷工行動，癱瘓波蘭全境並迫使波共政權允諾展開調查。⁷⁰

⁶⁹ Alain Touraine, Francois Dubet, Michel Wieviorka, Jan Strzelecki, *Solidarity: The Analysis of a Social Movement: Poland, 1980-1981*, op. cit., pp.68-69.

⁷⁰ Timothy Garton Ash., *The Polish Revolution: Solidarity*, op. cit., p.157.

團結工聯宣佈於 3 月 31 日再次進行罷工，此罷工被視為對波共政權之全面反對。然而，3 月 30 日華勒沙與天主教會代表會晤過後，未與全國委員會協商便決定取消罷工，挑起團結工聯內部衝突。激進派批評教會過於溫和及過份影響華勒沙與其顧問，導致教會日後逐漸減少涉入團結工聯事務。同日，華勒沙與副總理拉科夫斯基(Mieczyslaw Rakowski)達成華沙協議(Warsaw Agreement)，政府承認警方行動違反協議原則，應透過政治手段解決衝突，同意道歉、調查真相、處分施暴警察。比得哥什危機影響朝野態度，顯示當局無法控制大眾行動，政府之強硬手段無法壓制社會之強烈抵抗，促使團結工聯及波蘭人民確信政府軟弱無能，更加積極參與介入政治事務。⁷¹

第一次團結工聯全國代表大會更加彰顯團結工聯之內部分歧。團結工聯全國代表大會於 1981 年 9 月 5 日至 10 日及 9 月 26 日至 10 月 7 日分兩階段於隔但斯克舉行，第一階段之目標為回顧過去一年來之行動成果並討論組織內部結構、活動目標及政治綱領；第二階段則通過綱領、選舉新領袖並訂定年度目標。⁷²不論是第一階段或是第二階段之代表大會會期均較原定長，主要原因是討論議題眾多，與會代表意見分歧，討論熱烈。

團結工聯第一階段全國代表大會始於 9 月 5 日，會中通過團結工聯政治綱領及「告東歐勞動人民書」(Message to All The Workers of Eastern Europe)。政治綱領中界定團結工聯之角色為：「波蘭歷史上最偉大之群眾運動，此運動因 30 多年來公民、人權被侵犯，社會集體反抗而產生。此一運動結合不同觀點和信念之波蘭人，反對不公正、權力濫用及獨裁專制。其目標為：正義、民主真理、守法、意見表達自由、國家之革新及改善經濟情勢。團結工聯不只是工人運動亦是社會運動，此為團結工聯在國家生活之角色。」⁷³其政治綱領已近乎政黨政綱。

9 月 8 日並通過「告東歐勞動人民書」，聲明支持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東德和蘇聯工人走團結工聯之道路，學習團結工聯，爭取自治工會運動。⁷⁴此舉引發蘇聯及其他東歐各國不滿，紛紛指責其干涉內政。9 月 25 日，波蘭國會根據 9 月 23 日華勒沙與政府之協議，通過「國

⁷¹ J.B. de Weydenthal, *The Polish Drama: 1980-1982*, op. cit., pp.71-72.

⁷² Timothy Garton Ash., *The Polish Revolution: Solidarity*, op. cit., p.210.

⁷³ J.B. de Weydenthal, *The Polish Drama: 1980-1982*, op. cit., p.85.

⁷⁴ Alain Touraine, Francois Dubet, Michel Wieviorka, Jan Strzelecki, *Solidarity: The Analysis of a Social Movement: Poland, 1980-1981*, op. cit., p.140.

家企業工人自治管理法」(Law on Worker's Self Management in State Enterprise)，顯示波共對團結工聯要求之實現。

第二階段全國大表大會於 9 月 26 日開始召開，激進派指責華勒沙與波共之協議獨斷專行。10 月 1 日大會進行團結工聯全國委員會主席選舉，華勒沙、朱爾契克、格維亞茲達及魯列夫斯基分別被提名為主席候選人，各自獲得 55%、25%、9%、6% 之票數。⁷⁵華勒沙雖蟬連工會主席，但選舉結果顯示近乎一半之人不贊成華勒沙之政策路線，部份反對者不滿華勒沙獨斷，部份反對者為激進派人士，主張以強硬手段將團結工聯進一步政治化。激進派認為溫和派與波共政權過份妥協讓步；溫和派則認為激進派立場過於激烈易走向極端。雙方針對如何處理工會與政府關係、如何採取有效措施對抗波共爭論不休，對立使得團結工聯運動受到致命傷害。

此外，大會宣佈革命性行動綱領，要求波共逐步實施。蘇聯及華沙公約集團強力指責波共，要求予以鎮壓。卡尼亞無法接受黨內及蘇聯壓力被迫辭職，由國防部長兼內閣總理雅魯澤爾斯基接任，波共溫和派影響力下降，強硬派勢力顯著提升，雅魯澤爾斯基執政象徵將以軍事手段來解決團結工聯問題之傾向。

二、戒嚴令實施

10 月 28 日，團結工聯發動罷工抗議食物短缺、工會遭騷擾。30 日雅魯澤爾斯基建議國會，准許政府採取非常緊急措施保護國家及人民。國會雖未同意，但於 31 日通過決議，要求立即停止罷工，若工人對此要求無積極反應，將威脅國家生存，國會將考慮授予政府採取必要緊急措施。⁷⁶

團結工聯全國協調委員會雖於 10 月 30 日要求各地方工會停止罷工，但各地罷工仍不斷發生。11 月 4 日，維辛斯基繼任主教格蘭普(Jozef Glemp)、華勒沙及雅魯澤爾斯基三人舉行首次會談，希望建立政治、教會及工會間經常協商解決國家問題之途徑，但未能達成共識。12 月 11 日，團結工聯集會於格但斯克，激進派要求舉行全民投票，決定波共政權之去留，主張成立非共之臨時政府，並通過 12 月 17 日為全國對抗鎮壓之總罷工日，企圖奪取全國政權。12 月 13 日波共當局與團結工聯之間僅存之象徵對話關係破滅，為維護執政地位，避免蘇聯以代理

⁷⁵ Ibid., p.147.

⁷⁶ J.B. de Weydenthal, *The Polish Drama: 1980-1982*, op. cit., p.89.

人名義直接干預，波共決定先發制人，對團結工聯進行全面的武裝鎮壓，實施戒嚴與軍事統治。

雅魯澤爾斯基首先控制總理和國防部長職位，指派高級軍事官員擔任各部、國家企業和地方政府的要職。同時成立救國軍事委員會(Military Council of National Salvation)，由雅魯澤爾斯基擔任主席，作為領導國家機構，取代正常政府機能。其強調救國軍事委員會無意取代國家最高權威，其任務為維護國家法律秩序、重建紀律，待國家恢復法治、行政及立法機關正常運作，軍事委員會將解散。實施戒嚴期間，波蘭黨國制度經歷重要之制度及政治演變，稀釋黨調合各機構各階層利益及引導國家機關決策之權力、放棄以馬列主義為政策基礎、重新詮釋社會主義意識型態，波共影響力大幅縮減，政治重心從黨漸漸轉移至國家機構。⁷⁷對雅魯澤爾斯基而言，戒嚴與軍事統治是其重新定義政權體制，從政黨國家轉變為威權官僚、非意識型態軍隊國家的手段。⁷⁸

戒嚴實施後，波共限制所有憲法及國際條約定義之公民權利及自由，終止工會及所有合法組織協會活動，封鎖邊界，中斷國內外通訊設備，控制重要工業企業、中央行政機構及媒體，停止所有重要報社及期刊出刊(黨報例外)，電台及電視節目一律集中控制，並實施交通管制、宵禁，抗命者由軍事法庭審判。波共試圖藉由鎮壓及恐嚇，營造心理壓力以壓制反抗。武裝鎮暴警察(Motorized Reserves of the Citizens' Militia)佔領團結工聯全國各地辦公室，沒收文件，逮捕華勒沙等數名主要領導幹部及行政人員，過程中爆發了數百起罷工和佔領工廠的行動，數千名團結工聯的支持者被逮捕，但大多數的罷工行動在四天內就被武裝鎮暴警察平息。其中，最致命的罷工活動 12 月 16 日於弗耶克(Wujek)採礦場展開，造成 9 人死亡 22 人受傷。直到 12 月 28 日皮亞斯特(Piast)礦場發生最後一場罷工，罷工風潮暫告平息。⁷⁹

軍事政府逮捕團結工聯激進份子，禁止團結工聯活動，但並未要求解散，而是企圖拉攏工聯溫和派，爭取其支持與合作。然而 1982 年春再次爆發示威，政府無法取得團結工聯領袖之妥協，只能另尋他法。與團結工聯關係密切之獨立學

⁷⁷ Grzegorz Ekiert, *The State against Society : Political Crises and Their Aftermath in East Central Europe*, op. cit., p.265.

⁷⁸ Jadwiga Staniszkis, *Poland: Self-limiting Revolutio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20.

⁷⁹ Grzegorz Ekiert, *The State against Society : Political Crises and Their Aftermath in East Central Europe*, op. cit., p.262.

生組織被迫解散，其餘學生組織經整肅後方准予運作；農民團結工聯與支持團結工聯之波蘭記者協會(Polish Journalists Union)亦遭波共解散。

1982年10月8日波蘭議會通過新工會法，所有工會組織必須解散，禁止農民、公務員、管理階層組織工會，其餘職業工會每一企業只能設立一個，經一年試辦後方可成立，但不得設立分會，未經核准不得罷工。⁸⁰新工會法的目的，一方面是使團結工聯非法化，一方面是防止類似工會運動再次發生。因此，團結工聯列為非法組織，被迫解散並禁止一切活動，波蘭社會核心獨立組織徹底被摧毀。1983年1月波共成立「波蘭全國工會聯盟」(All-Poland Alliance of Trade Unions)，以此取代團結工聯地位，其規定必須宣示效忠於共產主義，承認黨之領導地位，不涉及政治，工會會員有罷工權但須先獲得許可，禁止黨員參與工會，淡化工會之政治色彩，人數約有500萬人。⁸¹擁有近千萬會員之團結工聯，組織運動卻一夕之間挫敗，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項：第一，通過告東歐勞動人民書，甚至準備全民投票，給予波共鎮壓理由。第二，雖獲知雅魯澤爾斯基已成立救國軍事委員會準備鎮壓，卻過於自信，認為內部威脅嚴重於外部威脅，缺乏警覺。⁸²第三，團結工聯雖廣為社會大眾支持，但無政治權力，亦無強制力量。

有效控制罷工及解散工會組織後，12月31日戒嚴有條件暫停，釋放所有被拘禁之團結工聯成員，並撤銷通訊和活動審查之限制。1983年7月22日，戒嚴法正式解除，但國會仍頒佈特別法保留軍力以備渡過過社會及經濟危機之需。然而戒嚴法不但無法根除反對運動，使政權獲得支持；更重要的是，政府無法實現穩定經濟的承諾。

三、地下化發展

儘管軍事統治打擊團結工聯，絕大多數精英被捕監禁，波蘭新工會法取消團結工聯之合法地位，但武力及客觀環境之限制卻無法阻止其餘未被拘捕之工會精英，紛紛轉入地下發展，開始另一次蛻變。

1982年7月，團結工聯精英布雅克(Zbigniew Bujak)等人設立「團結工聯臨時協調委員會」(Temporary Coordinating Commission of Solidarity)，由五人組成，作為地下團結工聯暫時的領導組織，各地區臨時協調委員會也在前團結工聯地區

⁸⁰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1983), p.308.

⁸¹ *Ibid.*,1986, p317.

⁸² Timothy Garton Ash., *The Polish Revolution: Solidarity*, op. cit., p.247.

建立，維持團結工聯的運作。團結工聯臨時協調委員會基本上是一個相當分權的組織，一方面由於工聯中心領導人物先後入獄，地方領導人可直接發動活動；另一方面，分權組織較不易成為波共搜捕的重點。⁸³臨時協調委員會提出下列要求：一、解除戒嚴，二、釋放政治犯，三、恢復團結工聯合法地位，四、詳述全國協議狀況，五、實施經濟改革。⁸⁴並發布組織綱領，及名為「地下社會」(Underground Society)之計劃，概述其四個目標為：抵制官方機構及組織、維護雇員經濟利益、為教育文化之獨立奮鬥、籌備決定性罷工。⁸⁵

在重要城市和地區之團結工聯協調委員會，附屬於團結工聯全國協調委員會，由後者透過傳單、收音機電台廣播及非法刊物，提供地方行動者必要聯繫。儘管在雅魯澤爾斯基政權壓力之下，團結工聯的活動轉為地下化，但是團結工聯仍加強活動與合作，對於波共政權依然構成威脅。地下工聯一如過去排除暴力行動，即使受到武力鎮壓，其策略基本上仍是非暴力路線。

1982年和1983年是街頭抗爭最頻繁和劇烈的時期，1982年5月1日勞工節和5月3日五三憲法紀念日，地下工聯號召公開示威運動，二十個城市共計二十萬人參與公開示威活動，是自從雅魯澤爾斯基掌權以來，對其政權最大之全國反抗表現，更多的示威及罷工在格但斯克條約簽定一周年後發生。這些示威行動不只顯示人民持續支持團結工聯、波共軍事統治無法消滅人民嚮往自由民主之精神，更建立反抗運動獨特之集體認同。

1982年至1985年期間，地下工聯一直號召工人採取非暴力罷工方式反對軍事統治，此外，臨時協調委員會也呼籲採取以下非暴力方式運作：⁸⁶

- (一)經濟自助與互助
- (二)工聯繼續於商店、工廠活動，維護工人權益
- (三)提倡杯葛政府政策，抵制官方工會、選舉
- (四)提倡各種獨立教育、科學及文化活動
- (五)設立秘密電台，干擾插播官方電台
- (六)出版地下刊物及報紙批判當局

⁸³ 周慧君，「民主化過程中反對黨分裂或團結之比較分析：以波蘭團結工會與台民進黨為例」，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⁸⁴ Jan Zielonka, *Political Ideas in Contemporary Poland*(London: Aldershot, 1989), p.74.

⁸⁵ Timothy Garton Ash., *The Polish Revolution: Solidarity*, op. cit., p.269.

⁸⁶ Jan Zielonka, *Political Ideas in Contemporary Poland*(London: Aldershot, 1989), pp.106-107.

團結工聯地下活動最具成效及最重要的部份即為獨立教育系統及出版分配網絡，舉凡討論俱樂部、自學團體、地下大學、獨立研究、檔案中心在全國蓬勃發展。學術團體利用教堂、私人公寓甚至是官方組織機構建物聚會，地下組織資助各種學科之獨立研究，並成立蒐集地下刊物及文件之檔案中心。團結工聯地下活動最令人驚艷的部份是「堅不可摧的出版分配網絡」，當局致力於銷毀地下刊物、沒收影印機及打字機，破壞團結工聯秘密電台。儘管遭受損失及嚴格控制，1980年代地下獨立出版勢力仍興盛不衰，在任何時期至少有四百種地下期刊在波蘭出版，期刊及書目銷售更擴及整個波蘭。

由於反對運動時常是零散、分散及短暫的，故難以估計人民之參與範圍及數量，但至少在主要城市及主要工業園區，每個人都曾接觸部份地下活動或遇見相關人士。再者，民意調查指出，每五位波蘭人就有一位曾參與如罷工、示威、抵制等集體抗議運動，⁸⁷顯示反對運動仍方興未艾。

1983年7月鑒於局勢穩定，為了調整與國內反對派關係及緩解西方經濟制裁，波蘭當局決定解除戒嚴，政府針對許多遭監禁之工會成員頒布特赦，華勒沙於11月14日被釋放，雖於10月5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間接提高團結工聯之國際能見度，但波蘭政府拒絕其出境，故由其妻子代為領獎。1984年7月22日更多團結工聯份子被釋放，波蘭當局分別於1983、1984、1985、1986年實行四次大赦，團結工會趁機反攻，積極活動。

團結工聯利用東西方關係緩和及西方政府和民間對其道德支持，向波共挑戰。西方之所以支持其活動，除既定和平政策外，與國外之波裔僑民勢力龐大、積極活動相關。二戰前大量波蘭人定居國外，未再返國，美國之波裔人口約有八百萬人，政治力量不容小覷。整體而言，西方對波蘭反對運動之支持可分為精神及物質兩種方式。

精神方面而言，團結工聯興起後，西方國家元首、總理、外交部長、國會議員、政要、知名人士至波蘭訪問，均會見華勒沙或其他工聯領袖，波共雖履表不滿但亦無可奈何，顯示西方支持波蘭反對運動之立場。波共實施戒嚴、鎮壓工聯後，儘管受到蘇聯和鄰近國家的支持，但鐵幕外之國際社會強力譴責並聲援團結

⁸⁷ David Mason,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Polan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201-218.

工聯，西方遂實施經濟制裁，企圖迫使波蘭政府停止鎮壓工聯。⁸⁸尤其美國總統雷根針對波蘭實行經濟制裁，使波蘭累積大量外債，經濟狀況慘淡，西方政治經濟的壓力促成波蘭抵制動員政策之失敗。

物質方面而言，西方不僅提供工聯印刷設備及通訊器材，更邀請工聯精英訪問、演講，刊登文章及出版書目，甚至提供其經費至西方長期研究，躲避波蘭政府之迫害。各地波蘭僑民常以個人名義，委託至國外之波蘭人或工聯成員捐款給工聯；工聯於布魯塞爾、巴黎、羅馬、倫敦、紐約及芝加哥等地均有代表機構，波裔及西方亦透過上述機構提供物質支援。在西方國家精神及物質支持下，團結工聯力圖恢復合法地位，加緊重建組織、策動罷工，並多次向政府發難。

團結工聯地下活動發展同時，波共政權亦面臨改革迫切壓力，從1982年至1988年間，雅魯澤爾斯基體認到社會力量之限制，不得不向團結工聯屈服，開始政經改革。首先，整肅黨內低階幹部，共產黨經歷大規模的人事變動和黨員出走。此外，頒布新工會法，重建國家控制之工會，然而新工會面臨財政困難，難以吸引新成員加入。再者，實施「經濟改革方針」⁸⁹，然而有限之經濟改革不但波蘭經濟未有起色，更帶給波蘭經濟更大負擔，並給予反對運動反擊之目標。

⁸⁸ Longin Pastusiak, "Poland and the West in the New Era," *Korea and World Affairs*, Vol.14, No. 3, pp.481-483.

⁸⁹ 雅魯澤爾斯基之「經濟改革方針」，是在不變動工業企業所有制之情形下引進市場機制，取消計劃經濟，政府透過價格、稅收、貸款、補貼等政策來引導企業的行為。同時頒布了「價格法」，採取多重價格機制，依不同的產品訂定官定價格、調節價格和合同價格，企業不僅有較大的定價權，還可自主決定工資。參見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前引書，頁 157。

第二節 朝野和解與圓桌會議

一、朝野和解

1984年基斯查克與丹博夫斯基(Bronisław Dembowski)主教及歐舒里克(Alojzy Orszulik)神父等教會領袖進行會談，成為波共政府願意放低身段與反對勢力對談之最初跡象。當時，波共政權仍舊相信成功的經濟改革能強化國家體制並弱化反對團體的士氣。有1970年、1976年及1980年三次前車之鑑，雅魯澤爾斯基決定實施經改前採用公民投票之方式徵詢民意，求取支持。然而1987年11月，波蘭人民在共產世界前所未有的自由公民投票中拒絕波共的經改方案。雖然波共仍然決定推行既定的經改計劃，但公投結果已進一步侵蝕波共政權。⁹⁰

波蘭之政治經濟危機越來越嚴重，波共政府也數度向社會壓力屈服，但是政治經濟制度上並未做出令民眾滿意之改變，對於社會之控制也越來越弱。1985年3月11日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上台，對波蘭而言是重要的外部轉折點，其提倡改革開放，鼓勵各國政府與反對人士對談，造成蘇聯衛星國之政治轉變。雅魯澤爾斯基體認到缺乏團結工聯和民間社會的配合，無法實現體制改革，雙方開始尋求不危害自身政治原則，同時又能協商及妥協的空間。在朝野互動過程中，1983年7月、1987年3月，教宗再度返回波蘭，調節朝野雙方之緊張關係，重申和平及對話，對波共及工聯日後走上談判桌，產生積極作用。⁹¹

1986年後，團結工聯領導人已能夠公開見面，公開化成為組織首要目標，因此1986年9月30日華勒沙創建了自戒嚴後第一個公開合法的團結工聯組織——「團結工聯臨時會議」(Provisional Council of Solidarity)，組織成員包含地方協調委員會成員，遍佈波蘭的許多團結工聯分會也陸續公開，其主要目標是協助工聯再度合法化。由於一個包含各地區協調委員會的多頭馬車，使得團結工聯內部不同團體的反對勢力愈發多元，組織運行困難，必須進行組織重組。因此，1987年11月25日團結工聯領袖決定解散臨時協調委員會和團結工聯臨時會議，共同組成正式工會組織，建立「團結工聯全國執行委員會」(National Executive Commission)，初期由10個區域代表組成，並由華勒沙擔任領導，也是日後團結

⁹⁰ 同前註，頁159。

⁹¹ 洪茂雄，*東歐變貌*(台北：時報出版社，1991)，頁66。

工聯中央的基本組織。然而，並非所有人都認為這是理想的解決方案，甚至認為組織結構已成為妨礙團結工聯運動的主要因素。

1988年，團結工聯顧問蓋萊梅克首先提出團結工聯與波共政權間之「反危機協定」(Anti-Crisis Pact)的構想，陳述地下工聯領袖接受並支持此協定，此協定不但構想新穎，且顛覆團結工聯持續抗爭及不想與波共政權簽定協議的一貫主張。除此之外，協定假定波共承認團結工聯之存在，並暗示經濟改革之實施。雖然團結工聯之主要運用武器為道德正義，協議及談判可能會破壞並瓦解工聯傳統，然而，團結工聯領袖意識到波蘭經濟危機及社會急需重新組織公共生活，反對勢力逐漸接受與波共簽訂協議之協商方式。

1988年決定性的突破展開，由於物價高漲，4月21日斯塔洛瓦沃拉(Stalowa Wola)開啟一系列新的罷工，5月2日格但斯克造船廠的勞工也陸續加入罷工，雖受到武裝警察鎮壓，但並未被完全控制。此次罷工之參與者主要是未參與過1980年罷工風潮之年輕工人，屬於團結工聯之新世代，尚未感受過戒嚴的挫敗且不畏懼為權力抗爭，上述元素超越波共政權的控制。1988年6月，雅魯澤爾斯基第一次提出圓桌會議協商之構想，戈巴契夫亦承諾不干涉波蘭內政，積極支持雅魯澤爾斯基及其政策。⁹² 8月15日亞斯琴別-茲德魯伊(Jastrzebie-Zdrój)採礦場再度展開新的罷工，對當局施加壓力，欲恢復團結工會的合法地位，20日罷工已迅速蔓延至其他礦場。22日罷工浪潮進一步擴大，波蘭政府決定與勞工展開談判。

8月26日，內務部長基斯查克(Czeslaw Kiszczak)表示願意進行談判，罷工在幾天後結束。9月16日，基斯查克等共黨官員、華勒沙及其顧問於華沙郊外馬格達倫卡(Magdalenka)的別墅會面，此地也是之後部分圓桌會議進行之所在地，雙方商討圓桌會議之可行性及波共與反對勢力之妥協範圍。接下來的數個月，圓桌會議是否召開充滿變數。為了鞏固黨內支持，雅魯澤爾斯基將支持溫和派改革路線之拉科夫斯基、巴卡(Wladyslaw Baka)、雷伊科夫斯基(Janusz Reykowski)及齊奧塞克(Stanislaw Ciosek)選入波共政治局，進行大幅人事改組，並向黨內強硬派表明軍方支持對話的強烈立場，以無可動搖的領導地位壓制黨內少數反對聲浪。因此，波共及團結工聯雙方開討論始圓桌會議之召開方式，此後雙方進行多次會

⁹² Adam Roberts, Timothy Garton Ash, *Civil Resistance and Power Politics: The Experience of Non-violent Action from Gandhi to the Present*, op. cit., p.139.

晤，會晤內容主要針對華勒沙以何種身分參加會議、參與會議之成員組成以及是否將團結工聯合法化列入議程等議題進行討論。⁹³

11月30日波共讓團結工聯領袖華勒沙與共黨扶植之波蘭全國工會聯盟領袖米歐多維茲(Alfred Miodowicz)在電視上展開公開辯論，此舉被視為波共軟弱的證據而非自由的象徵。雖然華勒沙持續領導團結工聯及反對運動，多數波蘭民眾卻對其工聯地下活動時期資訊及作為感到陌生。然而，華勒沙藉由辯論贏得波蘭史上工人運動難得之勝利，瞬間風靡全波蘭，成為眾望所歸之領袖及未來希望之象徵，同時也代表團結工聯復出政治舞台。

12月18日團結工聯建立「公民委員會」(Citizens' Committee)，主席是蓋萊梅克，目的是給予團結工聯領袖建議，是工聯重要資產，但同時也成為團結工聯內部的分歧之一。由於每個派系對政府的反對程度不同，反對政府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以華勒沙和大多數團結工聯領導人為首的派系支持進行談判，不過仍有少數派主張進行反共產主義的革命。最終，團結工聯在華勒沙的領導下，決定以和平的方式進行談判，主張革命之派系從未獲得過多權力，也未採取任何行動。

圓桌會議是否舉行的最後關鍵取決於波共黨內之衝突，波共第十次黨代表大會於1988年12月和1989年1月分兩階段舉行，雅魯澤爾斯基連橫所有溫和改革派之親信，運用其領導地位並以集體辭職脅迫，壓制黨內少數強硬派人士之反對聲浪，波共政權終於正式決議圓桌會議之召開。1989年1月27日，基斯查克與華勒沙等人第二次於馬格達倫卡別墅進行會談，確認圓桌會議之召開時程與基本議事規則。

二、會議召開背景

圓桌會議是波共政權、團結工聯及蘇聯三者勢力弱化之產物。⁹⁴在波蘭國內，天主教會持續呼籲政府開啟協商。波共當局已深切體認鎮壓工聯、排除異己，無益於解決內部危機；工聯亦了解一味罷工、癱瘓社會將危害國家利益，態度轉為務實，雙方同意互相妥協。對波共而言，圓桌會議的意義是用政治讓步求取團結工聯對波共經濟改革政策的背書，並期望團結工聯不會全面抵制1989年之國會

⁹³ 劉邦義，「波蘭政局的劇變與團結工會」，*世界歷史*，第5期(1995)，頁71。

⁹⁴ Michael D. Kennedy, *Negotiating Revolution in Poland: Conversion and Opportunity in 1989*, op. cit., p.11.

選舉。這種作法只有在兩種條件同時滿足的情形下才可能發生。⁹⁵第一是社會有相當大的自主力量，波共無法以威權方式推動經濟改革，否則波共不會同意實施政治改革削弱自身專政地位。第二是社會具備相當組織之反對力量，構成當局談判之對象，並保證履行談判所達成之協議。兩項條件滿足的情形下，波共始願意與團結工聯進行圓桌會議談判，共同解決經濟危機。

對團結工聯而言，其日漸厭倦罷工，體認到訴求難以透過罷工實現，且無法如預期大幅動員社會。此外，其政治力量終於獲得當局承認，自然樂於參與政治改革及尋求未來參與政治之可能。再者，經歷戒嚴之壓制及地下發展之艱辛，其渴望獲得合法化地位，重回政治舞台。

蘇聯態度之轉變對波共影響甚深，雖然波共黨內保守份子拒絕改革協商及分享權力，但 1987 年保守份子失去莫斯科的支持，無法再以蘇聯干預的威脅阻止黨內改革份子。隨著蘇聯表示不干涉波蘭內政，並進行「公開化」及「民主化」之政治改革，允許適度政治改變，圓桌會議之舉行亦得到蘇共之首肯。戈巴契夫之政治改革抬高波共黨內改革派之聲勢，波蘭改革份子歷史上第一次獲得蘇聯的支持。相較過去，黨內改革派與波蘭社會也更願意承擔蘇聯干預之風險。

除了戈巴契夫之政治改革此外部因素之外，西方國家領導人也持續給予波共政權壓力，美國前後任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布希(George Bush)及英國首相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皆表示支持團結工聯及反對勢力。西方政府明確表態若是波共政權不實施改革將抽離援助，波共深知確保外國援助及信用是拯救波蘭經濟之關鍵，不得不協助團結工聯，以贏得西方政府之信任。西方針對改革提出以下最低要求：第一，政府及反對勢力進行正式協商；第二，採用「政治多元化」；第三，團結工聯重新合法化；第四，允許反對勢力參與政治；第五，自由選舉。西方要求提供波蘭基本改革方向，其餘部分團結工聯可視情況予以補充。雖然前三項西方政府要求波共無法拒絕，但後兩項卻讓波共政權有「調整」的空間。⁹⁶

綜上所述，波蘭圓桌談判之條件已發展成熟，圓桌會議隨後正式召開。

⁹⁵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前引書，頁 159。

⁹⁶ Jon Elster,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 25-26.

三、會議形式

1989年2月6日開始，以華勒沙為首的反對團體代表團與以內務部長基斯查克為首的政府代表團在華沙進行圓桌會議，朝野兩種勢力開始尋求和討論解決波蘭問題的方案和途徑。圓桌會議共有兩次正式會議，一次是2月6日之開幕會議，另一次是4月5日之閉幕會議，只有這兩次會議之58位與會代表是以圓型會議桌進行會議，會議參與成員主要主要可分為黨政代表、反對團體代表及天主教會代表，會議中各黨領袖各自發表綱領性聲明。⁹⁷

圖 3-1 圓桌會議



資料來源：<http://okragly-stol.pl/galeria/>(查閱時間：2014年10月25日)

會議開幕儀式由基斯查克主持，並根據先前協議分為三種主要圓桌會議，分別討論經濟社會政策、政黨多元化和政治改革三項議題，另設有十個次級圓桌會議(subtables)及眾多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s)，黨政代表、反對團體及各領域專業人士針對具體問題討論。所有次級圓桌會議、工作小組、及團隊共約有97次會議，會議參與人數多達700人。經過兩個多月的反覆協商和激烈爭論，圓桌會

⁹⁷ 參加1989年2月6日及4月5日圓桌會議之黨政代表為29人，反對團體代表為26人，另有教會代表3人，詳細代表姓名及職稱請見附錄一。

議在 4 月 5 日宣告結束，經 8 週艱辛談判，始克服歧見達成協議，這場會議徹底改變了波蘭政府及社會之型態。

三個主要圓桌會議分別是：⁹⁸

(一)經濟社會政策圓桌會議(13 次)：目的是討論團結工聯提出之「反危機協定」細節，薛齊亞科夫斯基(Witold Trzeciakowski)代表團結工聯；因為黨內衝突，榭庫拉(Ireneusz Sekula)及巴卡共同代表波共政府擔任會議聯合主席，參與討論者包含 24 位團結工聯代表及 22 位黨政代表。

(二)政治改革圓桌會議(9 次)：目的是探討團結工聯如何參與選舉，蓋萊梅克及雷伊科夫斯基分別代表團結工聯及波共政府擔任會議聯合主席，參與討論者包含 18 位團結工聯代表及 22 位黨政代表。

(三)政黨多元化圓桌會議(10 次)：討論團結工聯之重新合法化，馬佐維耶茨基及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śniewski)分別代表團結工聯及波共政府擔任會議聯合主席，參與討論者包含 14 位團結工聯代表及 22 位黨政代表。

以下十個次級圓桌會議及工作小組是建立在經濟社會政策及政治改革圓桌會議底下：⁹⁹

(一)生態次級圓桌會議(8 次)：

參與討論者包含 25 位團結工聯代表及 17 位黨政代表。

(二)礦業次級圓桌會議(9 次)：

參與討論者包含 28 位團結工聯代表及 25 位黨政代表。

(三)住宅政策次級圓桌會議(4 次)：

參與討論者包含 10 位團結工聯代表及 20 位黨政代表。

(四)青年問題次級圓桌會議(5 次)：

參與討論者包含 20 位團結工聯代表及 17 位黨政代表。

(五)科學、教育及技術次級圓桌會議(4 次)：

參與討論者包含 22 位團結工聯代表及 31 位黨政代表。

(六)法律及法院改革次級圓桌會議(9 次)：

參與討論者包含 16 位團結工聯代表及 20 位黨政代表。

(七)農業及農村社會政策次級圓桌會議(5 次)：

⁹⁸ Jon Elster,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 op. cit., pp. 30-31.

⁹⁹ Ibid., p.31.

參與討論者包含 16 位團結工聯代表及 18 位黨政代表。

(八)大眾媒體次級圓桌會議(6 次)：

參與討論者包含 24 位團結工聯代表及 23 位黨政代表。

(九)當地政府及組織次級圓桌會議(1 次)：

參與討論者包含 14 位團結工聯代表及 17 位黨政代表。

(十)衛生保健次級圓桌會議(5 次)：

參與討論者包含 14 位團結工聯代表及 20 位黨政代表。

許多無法立即識別專業關聯之專家則參與其他工作小組會議。同時，團結工聯要求建立許多問題小組，一方面希望擴大圓桌會議之議題討論範圍；另一方面，圓桌會議提供團結工聯第一次有限接觸媒體之機會。過去，媒體是波共政權壟斷及片面宣傳並控制社會的重要工具，媒體每日轉播及記錄會議提供團結工聯呈現社會大眾其要求及觀點的機會，工作小組會議增加也意謂增加團結工聯在電視上呈現其立場的機會。此外，頻繁的會議使參與者學習如何協商及協商主題的相關細節，是重要教育經驗，使未來政權能夠重新創造類似協商機制。再者，頻繁的會議減少雙方的敵意及恐懼，化解仇恨。

圓桌會議的談判過程相當公開，但許多重要的問題卻是在「秘密、對等和遠離大眾傳播媒體的」馬格達倫卡別墅討論。隨著時間推移，雙方的差異和障礙開始威脅整個談判流程，1989 年 3 月 3 日，基斯查克邀請華勒沙及少數團結工聯領袖前往馬格達倫卡別墅與部分黨內改革者及兩位教會代表進行非正式討論。經過會談，許多矛盾消除並建立了先例。圓桌會議期間，馬格達倫卡別墅一共進行了 11 次會談，每次的參與代表不盡相同，雙方的主要談判代表先在公開場合短暫露面，便迅速前往馬格達倫卡繼續進行私下會談，之後對外發佈簡略公報，並交付圓桌會議再次審議討論，予以協議合法性。事前秘密協商與事後公開結果有助於雙方免受公開壓力影響，事後又有公眾輿論加以監督。¹⁰⁰雙方利用此段時間消弭內部不同意見，使得會議負擔與矛盾漸漸轉移至馬格達倫卡別墅處理。¹⁰¹

¹⁰⁰ 楊三億，「波蘭後冷戰時期的認同轉變與安全政策」，*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3 期(2004)，頁 56。

¹⁰¹ Jon Elster,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 op. cit., p. 32.

四、會議成員

會議參與成員主要可分為黨政代表、反對團體代表及天主教會代表。反對團體代表方面包含團結工聯及公民委員會，除工會成員外，另有獨立專業人士及顧問。會議初期，工會成員與知識份子分歧並不明顯，隨著時間推移，團結工聯內之知識份子顧問在國會、政府及新政府表現比起在工會裡活躍，為未來衝突埋下伏筆。此外，獨立學生會(Independent Students' Association)在團結工聯內獨樹一格，其較年長一輩領袖激進，也較不願意妥協。儘管面臨上述分歧及未來衝突陰影，團結工聯反對團體在圓桌會議期間仍然非常凝聚及團結。

黨政代表方面，至少在形式上統一工人黨與統一農民黨(United People's Party)、民主黨等衛星黨及其他親波共之天主教組織組成聯合政府代表(The Government- Coalition Side)參與圓桌會議，然而聯合政府代表中卻存在幾個矛盾傾向。¹⁰²首先，黨政領袖明白其權力由波共授予，並與波共共享特權，因此擔心改革會剝奪其原有特權地位。尤其是統一農民黨與民主黨擔心聯合政府將侵蝕其地位，兩黨明白其政黨不具自身合法性，因而時常利用會議加強其公眾形象，並在許多議題背離波共轉而支持反對團體。

此外，波共自身存在更大的分歧。黨內最大的分歧即為改革者及強硬派職官，前者領導協商、尋求妥協，後者則表現黨國保守元素、維護利益，在經濟、礦業、農業、保健服務議題對立尤其明顯。強硬派職官試圖阻止改變，認為體制需要改變但不需摧毀，只有在地方自治政府改革議題雙方採取罕見一貫反對立場。

波蘭全國工會聯盟亦為聯合政府之一員，卻致力於區隔自身與共黨政府和團結工聯。波共在戒嚴時期設置波蘭全國工會聯盟，聚焦於經濟效益，聯盟穩定成長，1989年止已累積5百萬工人會員。波蘭全國工會聯盟全心反對圓桌會議，擔心若是團結工聯合法化，將破壞其壟斷情勢及權力，因此在整個會議過程中極力反對團結工聯立即合法化，不認同修補一黨專政之希望已終結，並聲援黨內強硬派職官。雅魯澤爾斯基必須尋求統一農民黨、民主黨及波蘭全國工會聯盟等外部同盟的讓步，同時智取黨內強硬派職官。

雖然天主教會並未真正參與協商，但其在整個圓桌會議過程扮演重要角色。宗教的出世象徵具有道德上的優越，同時波蘭的宗教團體又具備政治、經濟與社

¹⁰² Ibid., pp.34-37.

會之入世力量。¹⁰³天主教會向來在波蘭社會扮演促進團結一致之角色，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為波蘭主教，教宗本人非常重視波蘭的人權及民主化，教宗返回祖國時從中斡旋朝野雙方之對峙關係，促使雙方走向和平談判。天主教對波蘭之影響可見一斑，因此教會代表順理成章成為雙方談判之見證人。圓桌會議至始至終皆由教會代表擔任共黨政府與反對團體之公正代表，即使是馬格達倫卡別墅會談也有兩位教會代表調節及見證。此外，天主教會亦協助擬定圓桌會議初步條件及最終結果，並監督政府確實實行協議。



¹⁰³ 楊三億，「波蘭後冷戰時期的認同轉變與安全政策」，前引文，頁 56。

第三節 圓桌會議與約定轉型

一、談判過程

雙方最初協商的目的不盡相同，波共政權試圖容忍有限合法之反對勢力，換取共黨統治波蘭之新合法性；團結工聯之目標則是工聯合法化、經濟領域之反危機協定及啟動波蘭民主轉型。參與圓桌會議之政治精英與反對領袖不僅從談判過程中得知對方之談判底線，同時也藉由談判過程消除雙方敵意。¹⁰⁴

1989年2月6日，圓桌會議以全會揭開序幕，基斯查克、華勒沙、米歐多維茲及聯合政府等領袖代表各自發表綱領性聲明。幾天後，實際分組協議正式開始。鑒於無法預測莫斯科對波蘭民主改革之容忍程度，因此雙方僅就國會議員席次開放普選、未來總統任期、團結工聯合法化地位、停止新聞審查及經濟改革等事項進行談判，雙方未就波蘭共產黨之存續地位進行討論。所有會議中，以政治改革會議最為困難亦最為重要，關鍵問題與次要問題相互交織。一部份反對團體認為該會議是提出及解決所有波蘭政治經濟重要問題唯一的機會，另一部份則認為協商的目的是建立解決問題及團結工聯未來參與政治的民主機制。因此前者注重次級圓桌會議，後者則聚焦三個主要圓桌會議。

整個談判過程中，爭議根源來自於雙方利益的衝突。無論是共黨政府或是反對團體，均體會到彼此不具備絕對性優勢。雙方都不清楚彼此的政治實力，為了達到各自的目標及利益，尋求對自己最為有利或最為合理的方案，雙方不斷協商讓步、保障雙方不至於全盤皆輸並漸少競爭風險。另一個衝突因素來自波共黨內強硬派職官，為了確保政治控制及自身利益，不斷杯葛、反對改革，使得協議過程衝突不斷升溫，波共黨內裂痕加劇。有鑑於此，衝突移轉至馬格達倫卡會議，使得波共改革派及團結工聯能攜手對抗波共強硬派職官，消弭內部不同意見。

圓桌會議談判過程中最有爭議的問題分別如下：¹⁰⁵

(一) 多元化選舉：

在多元化選舉方面，波共無法拉攏團結工聯，只能設法定義其地位，問題在於反對勢力應分配多少眾議院(Sejm)席次。圓桌會議召開之前，波共表示願意

¹⁰⁴ 同前註，頁 55。

¹⁰⁵ Raymond Taras, *Consolidating Democracy in Poland*(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5), pp.135-137. Jon Elster,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 op. cit., pp. 45-47.

給予團結工聯 30%至 40%之眾議院席次，前提是該席次是由波共分配，波共與團結工聯並無直接競爭關係。此外，波共及團結工聯必須支持雙方溝通之共同平台。對團結工聯而言，此舉無異乎使其成為類似統一農民黨及民主黨之波共衛星黨，如同憲法外協議而非正式法律條文。因此，團結工聯立刻拒絕此提議，主張開放 30%之席次自由選舉，並期望未來能全面自由選舉。波共得知波蘭民眾壓倒性偏好自由選舉後，遂決定放棄分配席次之提案。

隨後，波共進而提出非對抗性選舉之構想，雙方藉由單一選區提出候選人的全國名單(national list)。其實全國名單之提議係為共黨改革者之構想，其認為能有效穩定機制，波共能持續保有權力。然而，此舉將模糊波共及反對勢力之政治區別，因此，團結工聯再次拒絕提議。取而代之，團結工聯提議全國名單之候選人全由共黨提名，確保波共多數之合法性。團結工聯之策略是接受波共統治的現實，一面鎖定全國名單，一面揭露波共統治之弊端。團結工聯清楚知曉全面民主轉型遙不可期，但相信可利用選舉使其重新獲得合法地位，並參與政治運動。1989年 6 月出乎意料之選舉結果證明，此舉恐怕是波共欲維持其權力計畫之敗筆。

除了嘗試透過眾議院選舉將團結工聯併入由黨主導之聯合政府外，波共政權同時提議恢復總統制度，認為總統可在轉型期間穩定社會。波共屬意由雅魯澤爾斯基出任總統，多數團結工聯成員也認同雅魯澤爾斯基是主持曠日持久過渡時期之適合人選。儘管團結工聯在 1989 年 6 月選舉擊敗波共，米赫尼克仍舊不改其支持態度。因此，針對總統制度之恢復，雙方順利達成共識。然而，波共政權提議總統通過眾議院選舉產生，任期七年，此部份團結工聯並不贊同。

(二) 總統職權範圍之限制：

相較於總統人選，總統職權範圍限制引起較多爭議。執政聯盟提議總統擁有廣泛之權力，一方面保障政治系統及既得利益，一方面促進總統制發展。其認為總統制將為波蘭帶來多黨化，利用眾議院部份自由選舉，補償共產主義過去造成之損失。反對勢力同意由共黨領導擔任未來總統，即使雅魯澤爾斯基曾經決定實施戒嚴，仍相信其能在轉型期間穩定社會，對內防禦安全、對外折衝樽俎。但反對勢力無法接受超級總統、非自由選舉之眾議院及候選人全國名單。總統職權主要相關討論議題如下：第一，總統發出法定命令之權力；第二，總統否定議會之權力；第三，總統解散國會之權力；第四，限制總統在國家安全及國際關係方面之能力；第五，總統與總理之關係；第六，總統選舉之方式。為了打破政治改革

之僵局，基斯查克提議恢復兩院制，重新建立 1948 年經由公投廢止之參議院 (Senate)，此提議隨即引發參議院和眾議院之能力限制爭議。

(三) 參議院及眾議院之能力限制：

波共政權提議給予參議院微不足道的諮詢能力，另一方面，針對參議院之否決權，團結工聯則建議給予眾議院推翻參議院否決之權力，波共同意參議院或總統行使之否決權可透過眾議院三分之二多數表決退回否決。基斯查克期望議員經由總統諮詢眾議院各黨後指派，使參議院成為庇護政治領袖之機構。此提議對團結工聯而言並無實質誘因故持反對立場。因此，克瓦希涅夫斯基建議讓參議院成為完全自由選舉之機構，適度對團結工聯讓步。對波共政權而言，參議院較無實權，且由每省選出 2 席次之選舉方式，對於在波蘭農村擁有較強影響力的波共政權而言是一項保障，因此風險似乎是值得的。對團結工聯而言，儘管參議院較無實權，但能完全自由選舉即象徵在波共政權下巨大的突破。當團結工聯獲得波共政權承諾下次選舉將完全民主，由選民憑自由意志決定時，圓桌會議之基礎協議已得到保障。

(四) 其他：

其餘政治問題爭議包含法律改革、大眾傳播媒體、青年組織地位等。此外，團結工聯要求波共政權重述工會及組織補償，恢復所有因罷工或抗議被解雇者之職位，補償相關損失及徒刑，並恢復戒嚴時期其他解散之工會及組織，如波蘭記者協會 (Association of Polish Journalists)、波蘭演員協會 (Association of Polish Actors) 及其他過去積極協助團結工聯之職業協會。儘管波共政權同意恢復被迫解散組織之合法性，但不同意補償，因為此舉相當於承認戒嚴是一場錯誤。

除了以上爭議之外，會議參與者皆保有會議將會順利成功之自信。一開始，談判充滿不確定性及敵意之氛圍，隨著協商進行，雙方開始視彼此為合作夥伴而非敵人，皆渴望尋求解決方式。達成協議的過程雖然困難，但不牽涉任何威脅及情緒化爭執，而是透過休息或延遲辯論有效解決爭議，如此「有管理的討論」，是雙方達成妥協的重要因素。¹⁰⁶

¹⁰⁶ Jon Elster,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 op. cit., p.52.

二、會議結果

經歷八週談判，雙方都作出了妥協及讓步，並達成協議。在政治自由方面，政府同意團結工聯合法化並承諾不打壓反共團體；在政治體制方面，涉及憲法之修改，實行三權(立法、行政、司法)分立的原則，實行總統制和兩院制。會議達成之重要政經改革協議內容如下：

(一)國會改革：

國會原先採用一院制，今改為參眾兩院制，即分為參議院及眾議院兩院。參議院負責掌控國家經濟及社會行動，審議眾議院通過之所有法案(預算除外)，再向眾議院提出修正或撤銷建議。眾議院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半數議員出席，其中三分之二多數票可拒絕參議院之建議。參議院共 100 個席位(波蘭 49 個省，每省選出 2 席，華沙省和卡托維茲省各 3 席)，通過自由選舉產生，而不替共黨或任何其他政黨指定基本席次。眾議院共 460 個席位，傳統上由共黨及其他忠於共黨之其他小黨所組成，該時間點各黨派之比例分配為：統一工人黨 38%、統一農民黨及民主黨 22%、親波共之天主教會 5%，另外 35% 由反對派自由提名競選。換言之，波共及其附庸政黨控制議會 65% 席次(其中 35 個席次由全國候選人名單之無爭議選票決定)，團結工聯則擁有其他 35% 席次。

(二)實行總統制：

過去國家元首為「國務委員會」主席，國務委員會為議會常設機構類似蘇聯之「最高蘇維埃」，由於波共控制議會絕大多數議席，因此國家元首毫無疑慮均由波共領袖擔任。體制改革後，取消國務委員會，改設總統，第一任總統由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又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任期六年，得連任一次。總統代表國家，監督憲法之實施，維護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有權提名總理、解散國會、頒布法令、決定公民投票、指揮軍隊及宣佈戒嚴。

(三)工會多元化：

根據 1982 年工會法之規定，職業工會每一企業只能設立一個，且由波共控制。體制改革後，允許成立各式工會，新修定之工會法規定 1982 年被取締解散之團結工聯、農民工會農業團結工聯及獨立學生會等組織可重新登記，取得其合法地位。4 月 17 日，團結工聯重新合法化。

(四)社會及經濟方案：

通過農業、教育、環境、保健及住宅相關政策，停止審查制度，擴大新聞自由，恢復《團結周刊》(Tygodnik Solidarność)，並發行新的《選舉日報》(Gazeta Wyborcza)。

然而，相較於政治改革，經濟及社會政策的成果乏善可陳，主因是改革將影響國家、政黨及既得利益者，政府無法接受妥協。此外，會議過程無法達到法律改革，無法廢除保健及礦業的壟斷及中介結構，無法打破共黨壟斷波蘭報紙雜誌之出版，波共仍舊控制電視及廣播，青年議題毫無建樹。會後，部份圓桌會議參與者及其他相關組織代表組成「協議委員會」(Commission on Agreement)，負責評估協議實行狀況及調節未來衝突。

綜上所述，對波共而言，團結工聯進入體制相當於為波共推動之經濟政策背書；對團結工聯而言，不但重回政治舞台、掌握政治發言權，並得到波共持續改革之保證。結果顯示，不論是波共政權亦或是反對團體都高估政府的實力。若是波共政權事先明瞭其勢力如此薄弱，圓桌會議不會召開，和平改變也不會發生。¹⁰⁷同理亦然，團結工聯不會遊走於改變現有體制及真正改革的邊線，而是更理直氣壯的談判。不過，協商的結果已遠超出團結工聯的預期，除了工聯合法化，收穫比預期得更多，包含自由選舉參議院及出版獨立日報等邁向民主轉型之權力分享。雖然共黨依舊保有對政權掌握的優勢，共黨對於波蘭社會的控制已削弱，從此，波蘭開始走向政治民主化的道路。¹⁰⁸

三、約定轉型

民主轉型的過程中，從威權體制轉變到民主體制的轉型方式，依據帶領者的不同可分為變革(transformation)、置換(replacement)和移轉(transplacement)，所謂變革即由執政精英帶頭實現的民主；置換為由反對團體帶頭實現民主，且威權政體垮台或被推翻；移轉則是由政府和反對派團體聯合行動而實現民主化。¹⁰⁹ 1989至1990年間中東歐國家開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移轉民主轉型相當普遍，波蘭是代表國家之一，既有政權與反對勢力共同協商解決，達成約定轉型。

¹⁰⁷ Jon Elster,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 op. cit., p.59.

¹⁰⁸ 洪茂雄，*波蘭史—譜寫悲壯樂章的民族*(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0)，頁122-123。

¹⁰⁹ Samuel Huntington，劉軍寧譯，*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台北：五南，1994年)，頁128。

1989 年是關鍵的年代，圓桌會議和平地在東歐和其他地區終結共產主義，使得意識型態經由協商而非對抗達成轉型。波蘭首先進行圓桌談判，隨後是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東德及保加利亞，甚至是蒙古，圓桌會議成為和平擺脫共產主義統治的主要方式。此外，不同於其他圓桌會議，波蘭之反對勢力動員波蘭公民社會。波蘭圓桌會議之成功不僅改變共黨統治是強硬及不可改變的想法，甚至轉化反對共產主義的鬥爭模式。

波蘭的圓桌會議至關重要，不僅因為其首開先例，更因其體現從反對政府改變為基於妥協及對話價值的政治文化轉型，和平的轉型方式提供其他國家遵行的模型。¹¹⁰轉型的過程中，民主化是因政府和反對派團體聯合行動產生，波共內部由雅魯澤爾斯基領導的改革派雖不願主動改變政權，卻不斷被捲入團結工聯的反對浪潮中；團結工聯內部，華勒沙為首的溫和派勢力勝過主張革命的激進派，但未強大到足以推翻政府。轉型過程中，常常伴隨罷工、抗議、示威與鎮壓、監禁、警察暴力與戒嚴法兩方之間的拉鋸戰，終於導致政府與反對派之間改變策略。波共政府與團結工聯都承認，無法片面決定社會未來政治體制的性質，也不知道周圍社會主義政府會如何看待此變化，雙方互相試探，進行政治對話。

轉型的過程，通常遵循一定的軌跡。首先，波共政府致力於自由化的措施，開始喪失權力和威權。其次，反對派利用政權搖擺之時，擴大支持力量並加強活動，集結成團結工聯，希望能快速擊垮政府。接著，政府實施戒嚴，遏制與鎮壓回應團結工聯之政治動員。最後，波共政權與團結工聯領袖意識到雙方皆無法取勝，願意承擔談判的風險，開始尋求談判實現轉型之可能性。談判的前提是雙方都承認對方有某種合法性：團結工聯必須承認，波共政府在改革中是可敬的夥伴，公開抑或非公開地默認其現有統治權。反之，波共政府必須接受團結工聯作為社會中重大利益的合法代表。

此外，波共政府常常針對政權基本條件之改變與反對派進行談判，團結工聯領袖諸如華勒沙曾淪為階下囚，波共政府透過此種方式，避免其直接與政府作對；體驗過政府實在權力後，被釋放的領袖態度趨緩，對改革產生興趣，較願意與波共政府協商，監禁同時也提高被囚禁者之道德權威，助於集結反對團體，說服其餘成員與政府展開協商。雙方進行協商談判前，曾在馬格達倫卡別墅舉行先期會

¹¹⁰ Michael D. Kennedy, *Negotiating Revolution in Poland: Conversion and Opportunity in 1989*, op.cit., p.1

談，討論會議議程及參與成員。談判過程中，雙方都有機會分享權力，也有權力競逐的機會，互相降低風險，使得波共改革派及團結工聯溫和派人士相互合作建立民主機制。波共政權與團結工聯於 1989 年 2 月 6 日至 4 月 5 日間進行協商，最後簽訂協議，團結工聯重新獲得合法地位，並得到參與政治的權利。

雖然圓桌會議的結果，受到部分政府中或反對派人士攻擊，認為團結工聯談判者並非透過民主方式推選且過分讓步，以及馬格達倫卡別墅會談涉及私下利益交換。然而，過去在獄中受害最深之工聯領袖以名聲擔保，以及天主教會三位代表及教宗間接為圓桌會議背書，批評間歇。¹¹¹扣除以上疑慮，圓桌會議開啟 1989 年一連串民主轉型事件，睽違四十年後東歐國家迎來第一個完全自由的參議院選舉，進一步推動波蘭的民主轉型。

圓桌會議給予波蘭政府的不僅僅是政黨席次等關於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圓桌會議本身的產生就足以解釋波共當局與民主派人士的認知與學習過程，而該認知與學習過程有助於民主的轉型。¹¹²波蘭民主就在談判、妥協和協議過程中逐漸和平產生。

¹¹¹ Michael D. Kennedy, "Contingencies and the Alternatives of 1989: toward a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egotiating Revolutio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Vol.13, No.2, p.297.

¹¹² 楊三億，「波蘭後冷戰時期的認同轉變與安全政策」，前引文，頁54。

第四節 小結

一般社會運動，可利用以何為本、以何為敵、以何為目標來定義分析，團結工聯則是以工人階級為基礎，對抗民主道路上之障礙及波共政權之獨裁權力，以求適合波蘭人民之生活方式。1980年9月至1981年3月，團結工聯以極快的速度及能量成長，逐漸制度化，並克服波共政權各方面之阻力，1981年3月達到組織力量及動員之巔峰。從比得哥什危機至1981年7月，團結工聯試圖超越工會侷限，內部重新思索並界定其目標及策略。

從波共黨代表大會至團結工聯全國代表大會之間，雙方發生劇烈轉變：雅魯澤爾斯基及其政治聯盟開始尋求以軍事手段取代政治手段，以準備對抗取代緩和；團結工聯則發表革命性的政治綱領，要求波共分享管理社會及經濟之權力，與波共之對抗一觸即發。1981年10月至12月，雖然波共政權失去人民的支持，雅魯澤爾斯基卻近乎秘密下成功發動戒嚴：團結工聯雖得到人民支持，技術上與心理上卻政變失敗。波共在失敗裡成功；團結工聯則在成功裡失敗。因此，波共實施戒嚴後，團結工聯遭受鎮壓轉變為地下化發展。

1980年9月至1981年12月，於此16個月之期間，團結工聯成為民族獨立之運動，其人數近乎千萬，橫跨所有政治及社會領域，團結工聯允許波蘭人民在國家控制之外的渠道參與政治，為波蘭公民社會奠定基礎。縱使波共實施戒嚴，團結工聯失去合法地位被迫解散，轉為地下化發展，仍舊透過出色的獨立教育系統、出版分配網絡以及西方精神與物質援助下，作為社會之理想及集體抵抗政權之模式存活下來。

隨著戈巴契夫上台，以及波共態度軟化，波共政權與團結工聯之關係進入新的扉頁。1988年春季及夏季再度爆發大罷工，團結工聯重新合法化是罷工的主要訴求，為停滯系統注入新動力並激起政治改變之希望。歷經電視公開辯論及波共領導階層人事改組，所有條件已然成熟，團結工聯終於迫使波共領導人讓步，與工聯妥協，走上談判桌。

波共政權希望以政治讓步求取團結工聯對波共經濟改革政策的背書；團結工聯則希望工會重新合法化進而獲得參與政治之機會。1989年2月6日至4月5日，以華勒沙為首的反對團體代表團與以內務部長基斯查克為首的政府代表團在

華沙進行圓桌會議，會議參與成員主要主要可分為黨政代表、反對團體代表及天主教會代表，朝野兩種勢力開始尋求和討論解決波蘭問題的方案和途徑。主要圓桌會議分為經濟社會政策、政黨多元化和政治改革三項議題，談判過程相當公開，雙方之差異與矛盾則透過馬格達倫卡別墅會談消弭。

談判爭議根源來自於雙方利益的衝突，政治精英與反對領袖從談判過程中得知對方之談判底線，同時也消除雙方敵意，經歷八週談判，雙方都作出了妥協及讓步，並達成協議。在政治自由方面，政府同意團結工聯合法化並承諾不打壓反共團體；在政治體制方面，涉及憲法之修改，實行三權(立法、行政、司法)分立、總統制及兩院制。參議院完全開放自由選舉；眾議院方面，波共聯合政府保有 65% 席次，團結工聯則獲得 35% 席次。

波蘭民主轉型過程中，常常伴隨罷工、抗議、示威與鎮壓、監禁、警察暴力與戒嚴法兩方之間的拉鋸戰，終於導致政府與反對派之間改變策略，透過圓桌會議，波共政權與團結工聯聯合行動，共同協商解決。談判過程中，雙方都有機會分享權力，也有權力競逐的機會，互相降低風險，使得波共改革派及團結工聯溫和派人士相互合作建立民主機制，達成約定轉型。圓桌會議不但首開先例，並帶起中東歐國家透過協商而非對抗達成民主轉型之風潮，圓桌會議之成功不僅改變共黨統治是強硬及不可改變的想法，甚至轉化反對共產主義的鬥爭模式，波蘭民主就在談判、妥協和協議過程中逐漸產生。

雖然波蘭開始邁向民主，削弱共黨對波蘭社會的控制，但雙方仍認為波共政權保有掌握政權的優勢。然而，無人預料到 1989 年 6 月的選舉，團結工聯將會大敗波共政權。

第四章 民主奠基選舉期(1989-1990)

「我們的民主就像是蘆葦，隨風搖擺，也會受強陣風傷害。我們現在之所以缺乏如何使用它的經驗，是因為過去幾乎未曾使用過它。」

—Dariusz Fikus, “Demokracja jak trzcina,” Rzeczpospolita, 1995 年 5 月 22 日¹¹³

1989 年在波蘭共產黨專政之下，波蘭實行有限的改革措施，團結工聯是重要推手。圓桌會議之成功改變了波共統治是強硬及不可改變之想法，並且轉化團結工聯反對共產主義的對抗模式，開啟經由協商而非對抗達成民主轉型的道路。波共政權及團結工聯皆認為雙方短期內將會保持執政政權及反對勢力之形式，雖然可能發生有限之權力分享及協商，但不至於發展至權力轉移。不論是圓桌會議進行期間抑或是大選前後，團結工聯皆無法排除波共政權突然推翻前議，取消政治改革，重新實行一黨專政及軍事統治之可能性。

然而，波蘭之政治改革持續進行，波共政權並未如從前一般採取軍事鎮壓，戈巴契夫之民主化政策降低蘇聯干預之威脅，鄰近東歐國家也陸續展開政府及反對力量之圓桌會議，縱觀國內外局勢均朝向有利於團結工聯之局面發展。團結工聯領袖意會到如此天時地利人和的機會，認為不必再拘泥於舊有之框架，應該因應情勢，提出嶄新之要求，一連串民主選舉接踵而至。1989 年後之發展演變得出乎預期，民主選舉提供波蘭過渡但穩定的政府，開啟政治快速轉變的過程。

本章主要以圓桌會議協議之民主自由選舉為切入點，首先探討 1989 年 6 月國會選舉與一個月後之總統選舉，以及團結工聯如何建立東歐第一個非共政府。接著解釋波共政權與團結工聯內部為何分裂，1990 年之總統選舉，華勒沙如何脫穎而出當選總統，開啟團結工聯執政時期。另外，也試圖分析約定轉型過程中資源之分配與改變、波蘭公民社會之發展，以及轉型所造成之遺緒。

¹¹³ 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in East-Central Europ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77.

第一節 國會選舉與非共政府

一、1989 年國會選舉

為實現圓桌會議所達成之協議，國會遂於 4 月 7 日召開會議，修定憲法並通過「眾議院選舉法」、「參議院選舉法」、「結社法」、「工會法修正案」及「個體農民農會法」。上述立法突破過去體制改革之限制，揭開波蘭民主化之契機。¹¹⁴其中，選舉法極為特殊，選舉法設立之目的主要是允許實際競爭，同時確保波共及其聯盟獲得眾議院國會多數，透過下列條例達成上述目標：¹¹⁵

(一)眾議院共有 460 席次，選舉將全國分為 108 選區，根據選區人口多寡，每選區分配 2 至 5 席次，共計 425 席次由地區選區選出。

(二)其餘 35 席盡數由全國名單候選人填滿，全國名單由波共及其傀儡政黨構成，團結工聯一度受邀，但拒絕被納入名單。全國名單候選人之當選標準為獲得 50% 以上之全國選票。

(三)各地區選區的席位數量選舉前事先分配決定，參與眾議院選舉之各選區選民可投選 3 至 6 名候選人(全國名單 1 名；地區選區 2 至 5 名)，並針對政黨指派該選區所屬之候選人而非政黨投票，呈現選區劃分競爭(**compartmentalized competition**) 之選舉方式。此種選舉法之候選人須獲得過半選票以脫穎而出，若第一輪選舉未能達到當選標準，則在兩週後由票數最高之兩位候選人進行第二輪選舉。包含全國名單，波共及其傀儡政黨至少可分配到 299 席次(65%)；其餘 161 席次(35%)則完全自由競爭分配。

(四)重新建立之參議院完全透過自由選舉方式產生，政黨不限。不同於眾議院，參議院根據波蘭地理省分，每省選出 2 至 3 席次，共計 100 席次。

(五)由國民議會(即參、眾議院)聯合選舉波蘭總統，且須取得多數選票。

透過上述條例，波共無論如何至少都可以掌握眾議院 65% 的席次，甚至期望能贏得 30% 之參議院席次，並在眾議院自由選舉部份獲得相同數量之席次。

根據圓桌會議的協議，1989 年 6 月 4 日及 18 日分兩階段舉行戰後睽違四十

¹¹⁴ 戴育毅，「波蘭政經體制改革之研究：團結工聯與波共政權互動之背景與演變」，前引文，頁 233。

¹¹⁵ Krzysztof Jasiewicz, "Dead Ends and New Beginnings: The Quest for a Procedural Republic in Poland",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3, No. 1 (2000), pp. 104-105.

多年來首次之國會半自由選舉。對於波共政權及團結工聯而言，準備全面競選活動的時間皆極為緊迫，波共政權從未參與競爭選舉；團結工聯才剛合法化甚至不算是政黨，雙方皆戒慎恐懼看待選舉。波共選舉法規定團結工聯可自由提名 35% 議席的眾議院候選人競選，但並未限制參議院參選人之數量，宣傳活動得以在投票日前合法進行。團結工聯恢復合法地位後，積極投入選舉，5 月 8 日團結工聯機關報《選舉日報》開始發行，華勒沙及其他候選人之宣傳海報遍佈全國。《選舉日報》在大選宣傳重扮演重要角色，不僅大力宣傳團結工聯之競選綱領，大肆攻擊政府各項政治經濟改革，並將自身塑造為「主張改革」的化身。

1989 年之前，波蘭從未進行過選前民意調查，因此，波蘭官方民意研究中心(The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enter)及波蘭電台民意研究中心(Center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at the Polish Radio)嘗試研究波蘭民眾面對第一次半自由選舉之心情，但最後的民意調查是在選舉三週前進行。¹¹⁶儘管如此，以上民意調查依舊提供研究區域差異、選民利益及候選人個人部份之細節。此外，由表 4-1 所示，雖然當時此份研究並未公開，無法進一步影響民意，但調查結果至少顯示出團結工聯之支持率幾乎是波共政權之兩倍，民意取向不難辨別，波共政權之失敗已可預期。

表 4-1 1989 年 4 月至 5 月之選民投票意向(百分比%)

研究單位/時間	波共及其聯盟	團結工聯	尚未決定
民意研究中心			
4 月 10 日	15	38	47 ^a
5 月 17 日	14	34	52 ^b
波蘭電台民意研究中心			
5 月 2 日	25	45	30
5 月 16 日	23	57	20
5 月 23 日	24	55	21

^a 尚未決定之政治態度包含：8% 支持波共政權、27% 支持團結工聯、12% 兩者都不支持。

^b 尚未決定之政治態度包含：11% 支持波共政權、28% 支持團結工聯、13% 兩者都不支持。

資料來源：Piotr Kwiatkowski, "Opinion Research and the Fall of Communism: Poland 1981–199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Vol. 4, No. 4 (1992), p. 370.

¹¹⁶ Piotr Kwiatkowski, "Opinion Research and the Fall of Communism: Poland 1981–199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Vol. 4, No. 4 (1992), p. 369.

國會參眾兩院共計 560 個席次，1682 名候選人角逐眾議院 460 個席次，550 名候選人角逐參議院 100 個席次。¹¹⁷ 6 月 4 日第一輪選舉僅 257 個席次符合 50% 當選標準，其餘 303 個席次於 6 月 18 日第二輪選舉中決定。2700 萬名符合資格選民中，第一輪選舉之投票率為 62.1%，第二輪選舉之投票率為 25.1%，第二輪投票率較第一輪為低。其中，僅有攸關團結工聯候選人勝負之選區投票率較高。¹¹⁸ 如表 4-2 所示，選舉結果顯示團結工聯大獲全勝，取得眾議院 161 個議席，其中 160 席於第一輪當選；取得參議院 99 個議席，其中 92 席於第一輪當選。波共政權與其聯盟分配到眾議院 299 個議席，其中僅有 5 名於第一輪達到 50% 當選標準，其餘 294 名均須參加第二輪選舉；參議院議席更是僅獲 1 席。更尤甚者，完全由波共控制的全國名單中 35 名候選人有 33 名並未當選，其中包含現任總理、內務部長、國防部長等政府高級官員，此一結果一度引發憲政危機。¹¹⁹

表 4-2 1989 年 6 月 4 日及 18 日波蘭國會選舉結果

政黨/組織	參議院(Senate)		眾議院(Sejm)	
	第一輪	第二輪	第一輪	第二輪
波蘭統一工人黨	-	1	2	171
統一農民黨	-	-	3	73
民主黨	-	-	-	27
PAX	-	-	-	10
基督社會聯盟 (Christian Social Union)	-	-	-	8
波蘭天主社會聯盟 (Polish Catholic Social Alliance)	-	-	-	5
團結工聯	92	7	160	1
總席次	100		460	

註：PAX 創建於 1947 年，為親共產主義的天主教組織。

資料來源：Krzysztof Jasiewicz, "Dead Ends and New Beginnings: the Quest for a Procedural Republic in Poland," op. cit., p.107.

¹¹⁷ 戴育毅，「波蘭政經體制改革之研究：團結工聯與波共政權互動之背景與演變」，前引文，頁 234。

¹¹⁸ Krzysztof Jasiewicz, "Dead Ends and New Beginnings: The Quest for a Procedural Republic in Poland", op. cit., p. 107.

¹¹⁹ Timothy Garton Ash, *The magic lantern: the revolution of '89 witnessed in Warsaw, Budapest, Berlin, and Prague*(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0), p.30.

面對近乎全勝的局面，團結工聯深恐波共政權否認選舉結果及先前之圓桌會議協定，重新實施專政。此外，眾議院中波共傀儡政黨如統一農民黨及民主黨已不願聽從波共指令。再者，波共全國名單候選人中只有 2 位議員當選，其餘 33 名政府官員於第一輪同額競選中無法上榜，可能導致眾議院席次明顯缺額，波共 65% 的多數優勢便產生動搖，恐怕將影響國會議事運作。團結工聯只能向波共政權保證必定遵守圓桌會議協定，讓波共在眾議院如願控制多數，其後波共與團結工聯達成協議，適度修改選舉法，讓波共政府聯盟補足 33 名全國不分區之議員，始解決危機。

承上所述，選舉結果團結工聯在眾議院共獲 161 席、參議院共獲 99 席；波共政權在眾議院共獲 173 席、參議院僅獲 1 席。選舉結果顯示波蘭統一工人黨在議會中和團結工聯實力相當，然而上議院中僅一席位，形成團結工聯近乎獨佔的局面。這場選舉團結工聯以壓倒性勝利徹底擊敗了波共和其傀儡政黨，重要的是波共政權竟能接受選舉結果，公開承認失敗。以上現象在共黨國家前所未聞，震驚全球。

首次半自由選舉投票率卻不如預期，可歸因於數量龐大的未投票者。未參與投票原因之一是認為若選舉是民主的，過去不參與投票的因素，如抵制、對選舉儀式感到無感、感到投票無效及缺乏政治利益等必須消失；另一可能原因是此次選舉是波共政權與團結工聯的舞台，缺乏真偽，不管如何波共仍將掌握國會多數，民眾懷疑選舉是否有其意義。¹²⁰

團結工聯之勝利不在組織本身，團結工聯不算是完善之政黨，為了投入選戰而成立「公民委員會」(Citizens' Committee)，團結工聯之候選人正是由公民委員會而非政黨正式所提名。即使是選舉之後，團結工聯之議會代表組織「團結工聯議會團」(Solidarity's Parliamentary Club)而非正式政黨組織。

故選舉結果取決於心理影響而非政治影響，團結工聯國會選舉之所以致勝，原因主要是：第一，選民求變心切，對其寄予厚望；第二，合法媒體協助宣揚其政綱；第三，天主教會在基層給予大力協助，神父利用宗教活動鼓舞民眾支持及保護文宣不被移除；第四，強調民主化以獲得西方國家援助，表現務實穩健作風，動員選監小組，預防選舉舞弊等競選策略成功。反觀波共，國會選舉之所以失敗，主因如下：第一，無力挽救日益惡化之經濟危機；第二，長期統治，乏善可陳，

¹²⁰ Raymond Taras, *Consolidating Democracy in Poland*, op. cit., p.140.

民心盡失；第三，輕敵大意，黨內失和，黨員無向心力。¹²¹團結工聯之勝利，具有廣大民意基礎，其候選人平均得票率高達 70%，有助於民主化進程。此外，團結工聯控制參議院，參議院可否決眾議院之立法，可牽制握有立法權之眾議院，避免波共政權獨斷專行。

二、1989 年總統選舉

根據修改後的波蘭憲法，應在參眾議院產生後一個月內聯合選舉波蘭總統，以波蘭統一工人黨為首的執政聯盟認為，雅魯澤爾斯基是總統的最佳人選，且圓桌會議期間也為反對派所接受。然而大選後，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團結工聯開始對圓桌會議之協議產生異議，華勒沙反對雅魯澤爾斯基當選總統。此時波共與其傀儡政黨雖在兩院中控制 54% 的多數席次(統一工人黨 174 席占 31%，其餘傀儡政黨 126 席占 23%，合計 300 席次)，但團結工聯亦擁有 46% 的席次(即 260 席次)。雅魯澤爾斯基擔心無法獲得議會支持，曾一度聲明退選並推薦時任內務部長之基斯查克為總統候選人。但團結工聯不接受該提議，華勒沙也表態目前並無興趣競選總統，加上雅魯澤爾斯基之改革開放政策深獲國內外好評，波共政權最終仍舊決定推派雅魯澤爾斯基競選總統。

7 月 18 日雅魯澤爾斯基宣布參選，7 月 19 日延遲 1 個月的總統選舉得以舉行，雅魯澤爾斯基是唯一的候選人。國會選舉總統之過程中，波共傀儡政黨倒戈，如表 4-3 所示，選舉結果顯示：270 票贊成、233 票反對、34 票棄權、7 張廢票、另有 16 人缺席。選舉採有效票計算，雅魯澤爾斯基僅以較當選標準 269 票多出一票，當選波蘭總統。原先認為可以鞏固政權之波共，因為兩次大選的結果，聲勢已一蹶不振。雅魯澤爾斯基之同額總統競選顯示，在此階段團結工聯尚未有執政之意圖，然而隨後的情勢發展卻迫使其提早走上執政之路。

¹²¹ 洪茂雄，**東歐變貌**，前引書，頁 73-74。

表 4-3 1989 年 7 月 19 日波蘭總統選舉結果

政黨黨派	贊成	反對	棄權	廢票	缺席
團結工聯	1	222	18	7	12
波共及其聯盟總計	269	11	16	-	4
波共聯盟各黨派投票分計					
統一工人黨	172	1	-	-	1
統一農民黨	54	6	13	-	3
民主黨	20	4	3	-	-
PAX	10	-	-	-	-
基督社會聯盟	8	-	-	-	-
波蘭天主社會聯盟	5	-	-	-	-

資料來源：Hoover Institution,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0), p.370.

三、非共政府之建立

1989 年 7 月 3 日華勒沙主要顧問米赫尼克在總統選舉前夕撰寫題為「你們的總統，我們的總理」(Your President, Our Prime Minister)¹²²的著名文章並刊登於《選舉日報》，文章針對當時波蘭的政治局勢進行分析，並呼籲政府實現選民意志。米赫尼克認為波蘭需要一個所有主要政治勢力認可、可持續運作、強大又可靠的政治系統，而該系統是由團結工聯與波共政權共同組閣，其主張唯有透過民主反對陣營與執政改革派結合之聯盟，才能在沒有革命和暴力之情況下以民主方式取代波共政權。然而，當時許多工聯成員皆強烈反對進入政府體系之中，甚至是華勒沙與後來之總理馬佐維茨基都表達反對態度。

雅魯澤爾斯基當選總統後，波蘭面臨由誰組成政府的問題。雅魯澤爾斯基以黨政分離之原則辭去波共中央第一書記，中央第一書記由拉科夫斯基接任，8 月 2 日正式提名內務部長基斯查克出任總理，眾議院通過此項任命案，新總理必須於兩週內提出內閣名單，然而，基斯查克組閣時卻發生困難。一方面，由於基斯查克過去曾有鎮壓團結工聯的記錄，團結工聯拒絕參與新政府，反對基斯查克出任總理；另一方面，統一農民黨與民主黨兩傀儡政黨有了新的政治考量。過去一

¹²² 全文請見 <http://wyborcza.pl/duzyformat/1,127291,3645049.html>(查閱時間:2014 年 11 月 17 日)。

黨專政時期兩黨一向配合波共政權，今波共已失去強制領導地位，為了未來政治生命發展，此時與波共靠攏恐失去民意支持，兩黨內部立場產生動搖。基斯查克無法在憲法規定的兩週內向眾議院提出內閣名單，因而宣佈放棄組閣權。之後雅魯澤爾斯基曾試圖提名統一農民黨之黨魁馬林諾夫斯基(Roman Malinowski)出面組閣，但團結工聯依舊反對。

此時，隨著情勢變遷，面對波共喪失專政地位，傀儡政黨背離，團結工聯遂興起組閣意願。米赫尼克之主張逐漸成為團結工聯之發展主軸，工聯欲以總理一職作為進入政府行政部門之首要選擇，此一發展策略並普遍為工聯成員所接受。團結工聯顧問卡辛斯基(Jaroslaw Kaszynski)暗中與統一農民黨及民主黨領袖接觸，討論合作之可能，兩黨也有意脫離波共傀儡政黨之角色，欣然接受合作提議。華勒沙得知此消息，與工聯精英仔細研商後，積極與統一農民黨及民主黨洽談合作事項。卡辛斯基一方面向蘇聯駐華沙大使簡報工聯組閣計劃，蘇聯表示不會干預；一方面向西方國家發佈工聯未來組閣腹案之消息，由波共繼續掌控國防及內務部長，並致電雅魯澤爾斯基要求會面協商，推薦馬佐維茨基、庫隆及蓋萊梅克等三位總理候選人。¹²³

雅魯澤爾斯基未有選擇餘地，若是拒絕提議，則必須重新選舉。鑒於避免波共再次重挫，只得接受提議，並要求部份職位留予波共。在各方努力下，最後終達成聯合組閣協議，雅魯澤爾斯基提名團結工聯顧問馬佐維茨基出任總理，8月24日提請眾議院行使同意權，結果馬佐維茨基以壓倒性多數當選，以團結工聯為首的聯合政府形成，東歐第一個非共政府正式誕生。新內閣成員經歷兩週協商斡旋終成定案，9月12日正式獲得眾議院同意，馬佐維茨基政府由24人組成，部分內閣羅列於表4-4。波共繼續掌握國防及內務部長，但團結工聯內閣人數多於波共內閣人數，取得聯合內閣之人數優勢，居主導地位。波蘭成為蘇聯集團中第一個擁有非共黨之總理，且擁有共黨居少數之聯合內閣的社會主義國家。¹²⁴

¹²³ 洪茂雄，**東歐變貌**，前引書，頁77。

¹²⁴ 洪茂雄，**波蘭史—譜寫悲壯樂章的民族**，前引書，頁124。

表 4-4 1989 年 9 月波蘭非共政府內閣名單

職稱	人名	黨派
總理	馬佐維茨基(Tadeusz Mazowiecki)	團結工聯
副總理兼財政部長	巴爾策羅維茨(Leszek Balcerowicz)	團結工聯
副總理兼內務部長	基斯查克(Czeslaw Kiszczak)	統一工人黨
副總理兼農業部長	亞尼茨基(Czeslaw Janicki)	統一農民黨
副總理兼科技發展部長	亞諾斯斯基(Jan Janowski)	民主黨
外交部長	斯庫比謝夫斯基(Krzysztof Skubiszewski)	無黨籍
國防部長	西維茨基(Florian Siwicki)	統一工人黨
司法部長	班科夫斯基(Aleksander Bentkowski)	統一農民黨
對外經濟合作部長	施維奇茨基(Marcin Swiecicki)	統一工人黨
工業部長	瑟里契克(Tadeusz Syryjczyk)	團結工聯
勞工及社會政策部長	庫隆(Jacek Kuron)	團結工聯
文化部長	齊溫斯卡(Izabella Cywinska)	團結工聯
教育部長	杉梭諾維茨(Henryk Samsonowicz)	團結工聯
社會問題部長	巴拉施(Artur Balazs)	團結工聯

資料來源：洪茂雄，「論波蘭民主化的發展」，問題與研究，第 29 卷第 3 期(1989)，頁 12；
<http://mamprawowiedziec.pl/strona/rzad-mazowieckiego>(查閱時間：2014 年 11 月 17 日)。

雅魯澤爾斯基面對新國會與政府時，礙於歷史包袱以及波共傀儡政黨之分裂，缺乏國會上的支持，無法運用總統權力，只能支持馬佐維茨基之各項政策，成為象徵性之國家元首。馬佐維茨基新政府上台不久便向議會提交 30 多項法令草案及措施，同時推動一系列改革，終結社會主義經濟，完成政治民主化。

經濟方面，新政府著手準備全東歐第一個「震盪療法」形式之經濟改革，該改革計劃由國際貨幣基金會提供貸款支持，並由財政部長巴爾策羅維茨一手策畫。「震盪療法」遍及稅制、銀行、外匯、投資、信貸及工資管制等，是極其完備之改革計劃，於 1990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巴爾策羅維茨反對無效率之統制經濟，主張全速向自由放任之資本主義轉型，引進市場經濟推動改革。計劃分成四個重點項目：第一用強力緊縮性的財政及貨幣政策穩定經濟，第二物價改革及市場化，第三對外貿易自由化，第四推動私有化，逐步將國營企業轉為股份有限公司，擴大私營經濟比重。主張配套改革，同時進行市場化、自由化及私有化。¹²⁵

¹²⁵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前引書，頁 165-166。

政治方面，馬佐維茨基政府讓波共政權時代一向聽令於中央政府之地方機關享有較大之自主權，地方政府可在中央撥付款項之外開徵地方稅。由於波共長期執政，不論是政府、國會及工廠，抑或是軍隊、警察及情治單位仍由共黨控制，非共政府若不能獲得波共基層黨員之合作，勢必受到消極抗拒或積極反對，因而希望除去行政高層中之共黨分子，使雅魯澤爾斯基無法順利領導國家。



第二節 波共式微與工聯分裂

相較於 1980 年秋天，1989 年秋天時的團結工聯已不可同日而語，雖然再次合法化，但團結工聯人數僅剩 200 萬人，相對弱化。許多過去工會領袖如今位居高位，如馬佐維茨基擔任總裡、庫隆擔任勞工部長、蓋萊梅克擔任公民委員會之主席及團結工聯議會團主席、米赫尼克擔任團結工聯機關報《選舉日報》主編。廣義而言，團結工聯之行動由各地公民委員會繼承，並以一系列記憶、象徵、價值、精神及傳統傳承下來，只是有了新的詮釋。¹²⁶波蘭政治舞台也從過去波共政權、團結工聯與天主教會三強鼎立，改變成政府、議會、雅魯澤爾斯基總統與華勒沙四位主要參與者。

一、波共權力式微

兩次選舉失敗及政權旁落，表示波共政權已失民心，黨內矛盾及分歧加深，面臨改組。中央委員會及新崛起的國會系統議會黨團(Parliamentary Caucus)，在六個月內引發傳統黨內權力基礎的機構對抗，雅魯澤爾斯基立場偏向議會黨團，成為中央委員會及波共瓦解之重要因素。總統選舉後，原先波共欲控制副總裡、電視委員會、六部部長(財政、通訊、交通、外交、國防、內務)等職位，但雅魯澤爾斯基接受組成非共政府之提議，並接受總統職務，辭去共黨領導人職務，更加遠離波共旨意。

波共黨內改革的阻力來自黨內機關，尤其是中央委員會；反之，黨團議會代表則傾向獨立於波共，雅魯澤爾斯基因而向議會黨團靠攏。1989 年 6 月 30，中央委員會與議會黨團首次召開聯合全會，針對總統候選人進行討論，儘管波共在國會選舉挫敗，雅魯澤爾斯基仍舊堅持波共在波蘭社會主義的框架下進行政治變革，並在會中提名基斯查克為總統候選人；議會黨團則指控中央委員會阻撓雅魯澤爾斯基成為候選人。雖是首次聯合全會，然而實際上雙方立場卻逐漸分道揚鑣，權力從共黨機構轉移至國會，更進一步淡化中央委員會權威。¹²⁷

議會黨團主要指 173 位波共國會議員，議會黨團的出現暗示波共思潮的沒落。議會黨團鮮少受到波共黨內的支援，並被描述為反對派。儘管議會黨團極力擺脫

¹²⁶ Timothy Garton Ash, *The Polish Revolution: Solidarity*, 3rd Edition(United Stat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372.

¹²⁷ Raymond Taras, *Consolidating Democracy in Poland*, op. cit., p.147.

波共黨紀，在國會中仍然需要黨內提供專業知識及訊息，同時也是波共僅存影響國家政策的最佳途徑。

波共黨內統一問題一直懸而未解，直至 1989 年 10 月，中央委員會與議會黨團之關係終於明朗。波共政治局決議波共可透過眾議院議員代表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追求國家政策，議會黨團取得參與黨代表大會及全國會議之資格，保證其接觸黨內領導之途徑，意謂加強議會代表在波共黨內整體權力結構，然而修定後的共黨原則仍舊顯示黨內高層並未完全放棄民主集中制。

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之前，議會黨團為了確保自主地位及波蘭社會主義新道路，要求波共解散，以創立代表波蘭民族之全新、多元左派政黨。¹²⁸意料之外的波共黨內對抗決定了波共繼任黨魁，拉科夫斯基積極遊說支持選舉，並利用全會及共黨媒體強化其立場。但議會黨團主席奧雪霍夫斯基(Marian Orzechowski)質疑拉科夫斯基領導新政黨之能力，並認為其領導只會帶來象徵性的改變。

1990 年 1 月 27 日，波共在華沙召開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黨中央第一書記拉科夫斯基主張終止統一工人黨，重建新黨。改革派主張建立波蘭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cy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繼承波共地產及金融資產，接受自由民主的規範和價值觀，揚棄史達林主義的思想與理論，以實現民主社會主義為主要目標，但為了公平與效率，國家仍須保有某程度之干預，由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śniewski)擔任主席，米勒(Leszek Miller)擔任總書記；另一方面，89 名激進派改革人士代表，包含 25 位眾議院議員決定另組政黨，由波共議會黨團副主席費許巴赫(Tadeusz Fiszbach)領導，主張與過去切割，支持右派政府政策，組成波蘭社會民主聯盟(Polish Social Democratic Union)。

雖然兩黨都承諾將為自由、平等、社會正義、國會民主及波蘭國家利益努力，但波蘭社會民主黨對社會政策承諾較為務實，波蘭社會民主聯盟則較為理想。1990 年 3 月，另一個左派政黨成立，自稱為波蘭無產階級共產主義聯盟(Union of Communists of Polish Republic Proletariat)，波蘭共產主義似乎又回到過去邊緣化和分裂的思潮。¹²⁹

¹²⁸ Ibid., p.150.

¹²⁹ Ibid., p.145.

二、非共化修憲

雅魯澤爾斯基雖在應對反對勢力及波蘭民主突破扮演關鍵角色，但卻遠離波共黨內政治。1989年其目標是成為取代波共領導地位之總統，同時擺脫黨派色彩，但其必須面對一系列政治挑戰。1989年4月5日，為了實現圓桌會議之協議，修定憲法並通過「眾議院選舉法」、「參議院選舉法」、「結社法」、「工會法修正案」及「個體農民農會法」，成為波蘭憲政歷史第一個轉捩點。1989年11月23日，雅魯澤爾斯基為了新憲法草案會見新政府聯盟，12月29日進行大幅度修憲，認為共黨在國家中之政治領導地位已不合時宜，決定告別史達林模式色彩濃厚的憲法。

重要部份包含取消憲法中共黨在國家中之政治領導地位；刪除「社會主義國家」及「勞動人民」等字眼；將1952年使用至此之國家名稱「波蘭人民共和國」(Polish People's Republic)，改回二戰之前之國名「波蘭共和國」(Republic of Poland)，將國徽恢復為1944年以前使用的「雙皇冠白鷹」；稱波蘭是「實踐社會主義正義之民主法治國家」；賦予波蘭政治體制自由化，所有政黨在法律之下享有平等權利，可自由成立政黨。

1990年3月8日及9月27日又陸續進行修憲，此兩次修憲則著眼於地方政府之改革與總統直接民選。前者依照西歐「歐洲地方政府憲章」之模式，提升省縣自治地位；後者將總統任期改為五年，滿足華勒沙訴求，有意迫使實施戒嚴與鎮壓團結工聯之雅魯澤爾斯基提前下台，為華勒沙競選總統鋪路。¹³⁰

波蘭非共化之修憲相較於1952年制定之史達林模式憲法，有顯著差異。以憲法功能而言，由波共「黨權」掌控，更改為行政、立法及司法三權分立；以憲法性質而言，由形式上之憲法轉變為實質上之憲法，政府各部權責分明，人民權利義務有法可循；以憲法意識型態而言，由社會主義色彩鮮明之憲法轉變為尊重人民信仰自由之民主憲法；以政治制度而言，由黨政平行相互交流體制轉變為黨政分離各自獨立運作，國會由參眾議院取代共黨中央委員會，總統一職取代國務委員會主席；以黨政體系而言，由一黨專政轉變為多黨民主。波蘭修改後之憲法融合西方民主憲政模式，告別共黨意識型態及路線，為新建立的民主體制及後續政治經濟改革奠定基礎。

¹³⁰ 洪茂雄，「後共產主義波蘭的政治發展：變革與穩定」，前引文，頁55。

三、轉型過程與危機處理

所有的轉型過程大致可分為三階段，即危機之開端、處理與解決，第一階段代表並非僅是狹義的危機開端，更包含自由化之主要轉捩點。以波蘭為例，危機開端始於 1988 年夏季的罷工，並可追溯至 1980 年之一系列罷工行動，1989 年嘗試透過圓桌會議之召開處理危機，並透過 1989 年之民主選舉，建立非共政府解決危機，不僅減少波共之影響力，同時更分享權力，進而取代波共政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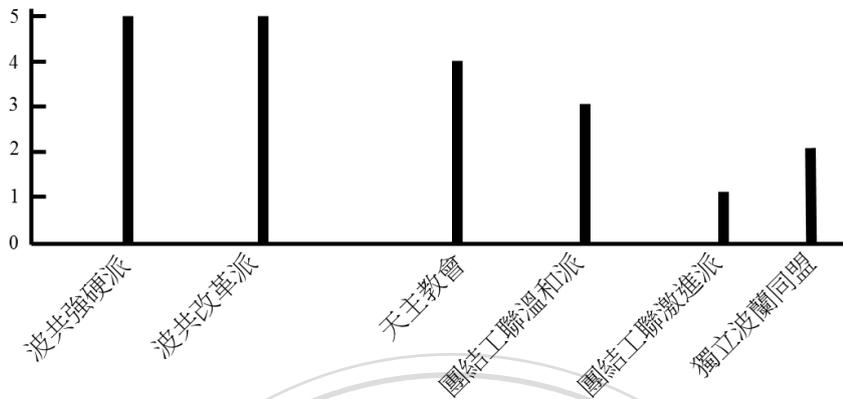
圖 4-1 展現波蘭民主轉型三階段中主要競爭團體之議題距離及資源分配，顯示競爭團體政策偏好光譜及資源如何分配，橫軸是各競爭團體跨議題間之異議程度，縱軸以一至五分評斷資源多寡，總結競爭團體可獲得之不同類型資源，圖例展現競爭團體在理性決策行為下，於危機開端、處理及解決階段之各種可能性，並說明應對情況之策略邏輯。

競爭團體是指不論現任或非現任，競爭直接參與政治及控制決策結構之團體，波蘭競爭權力之團體包含雅魯澤爾斯基領導之波共政權，長期執政下面臨如何擴展規模及從危機中解脫；團結工聯是最具規模之反對勢力，挑戰政權並參與協商。次要的競爭團體則期望參與聯合政府，包含強烈民族主義之反共異議團體獨立波蘭同盟(Confederation for an Independent Poland)；由米歐多維茲領導之波蘭全國工會聯盟，與波共劃清界限，但集結波共保守勢力，對抗團結工聯；最後是居中調節波共政權及團結工聯之天主教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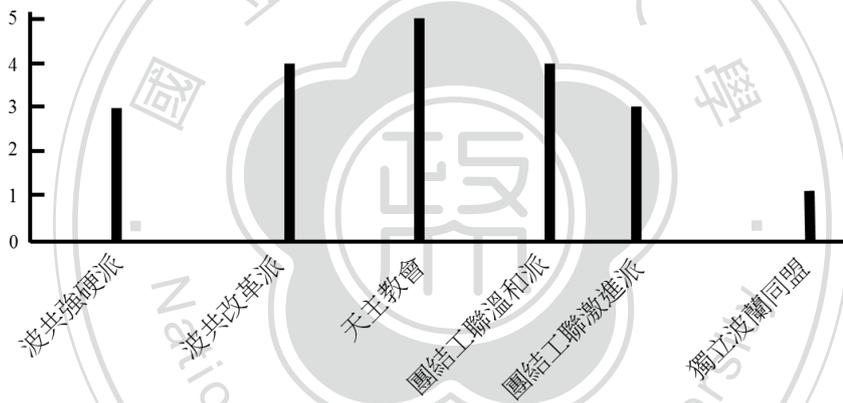
競爭團體針對政策之立場光譜從左至右，由保守經由改革分佈至革命，波蘭轉型中參與競爭之團體類型不論是波共政權或是團結工聯皆可分為改革派及強硬派，因此典型的四個競爭團體分別是波共改革派、波共強硬派、團結工聯溫和派及團結工聯激進派。此外，天主教會被波共政權及團結工聯視為雙方之協調者，時而中立時而傾向某方。競爭團體在各階段之相對距離不盡相同，各相鄰競爭團體之間的距離由所涉及之多重性議題之異議程度決定，相鄰之競爭團體距離越遠，表示彼此之異議程度越高。若是資源集中於光譜中央，則位於極端之競爭團體差異不大；若資源由位於極端之競爭團體壟斷，則不公現象恐導致推翻或取代。

圖 4-1 1988-1989 年波蘭危機之議題距離及資源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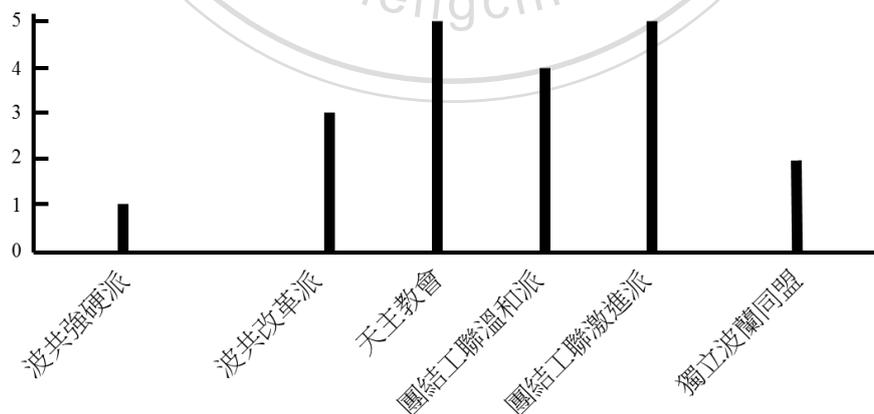
階段一：危機開端(1988年罷工)



階段二：危機處理(1989年2月圓桌會議)



階段三：危機解決(1989年9月聯合政府)



說明：橫軸代表各競爭團體跨議題間之異議程度，縱軸代表各競爭團體所分配之資源，三個階段之可用資源數量是固定的，僅分佈格局改變。

資料來源：Raymond Taras, *Consolidating Democracy in Poland*, op. cit., pp. 115-123.

資源分配一直被視為影響政策結果及權力平衡的重要因素，政治競爭團體握有之資源主要可分為三類：

(一)現任資源(*incumbency resources*):控制政治途徑及制定對其有利之公共政策，即使體制改變，也較能破壞轉變或在新體制中成為重要政治角色。

(二)非現任資源(*nonincumbency resources*):如控制官僚機關、財富、媒體及社會輿論。團結工聯財務資源雖少，但其可觀之成員數、廣闊之工業網絡、結合知識份子及勞工階層領袖卻不容小覷。自從圓桌會議召開後，波共無法再壟斷媒體，團結工聯之政策宣傳遍佈全國。社會輿論也明顯偏向團結工聯而非波共政權，團結工聯可藉此強調其正當性。

(三)強制性資源(*coercive resources*):如波共控制之安全軍警情治單位與團結工聯之群眾動員。

1988年團結工聯因受戒嚴影響轉為地下發展，資源有限；波共政權則坐擁大量資源，波共改革派與波共強硬派可謂勢均力敵，由於資源仍舊分配不均，罷工運動再起，成為危機的開端。隨著經濟危機的深化，波共改革派認為必須建立更大的聯盟，以分散國家政策改革責任。1987年經改方案公投之舉行開啟新的政治空間，1998年雅魯澤爾斯基一系列人事改組壓制波共強硬派勢力，戈巴契夫更默許波蘭採行自己的政治路線，波共政權決定在1980年代末期開始協商改革。鑒於1987年公投遭否決、1988年華勒沙與米歐多維茨辯論使政府蒙羞及罷工運動再次興起，所有的競爭團體都意識到轉變的氛圍。儘管波共強硬派不願接受政治多元化及團結工聯合法化，以雅魯澤爾斯基為首之波共改革派認為其有能力繼續領導國家走向民主，排除眾議，決議讓步走向談判桌。

一旦政治條件改變，部份資源之分配將隨之消長變動。團結工聯在圓桌會議召開時強調其處理危機效用之策略，短期內避免利用組織動員脅迫，因為雙方皆畏懼經濟危機將使波蘭倒退回社會無政府狀態。團結工聯依據波共資源決定讓步程度，儘管客觀來說波共仍舊維持優勢，但團結工聯也不願示弱。此時，波共改革派在競爭條件下可望獲得部分支持，並使政治影響力獨立於波共強硬派，因此偏好選擇約定之民主。換言之，波共改革派與團結工聯溫和派意識到對抗無益，並視彼此為改革的主力，以雅魯澤爾斯基為首之波共改革派與以華勒沙為首之團結工聯溫和派達成建立民主體制之協議，波共改革派嘗試拉攏及說服強硬派，團結工聯溫和派則控制激進派，藉此處理危機。

此時，1981年11月雅魯澤爾斯基及華勒沙曾商討國家和解之形式再次浮出檯面，方案之一是簽定波共政權、團結工聯與天主教會之三方協議；方案之二是在眾議院組成包含波共政權及其傀儡政黨、團結工聯、天主教會及親共黨之天主教組織之聯盟。當時波共政權反對方案一，團結工聯則反對方案二，隨後戒嚴實施，1989年波共政權漸漸接受方案一，決意由三方代表參與圓桌會議，有趣的是，最後方案二才是真正終結波蘭共黨統治之方式。圓桌會議時期，波共政權、團結工聯與天主教會三方共同協商，所有競爭團體開始往中央移動，異議程度降低，改革派願意放低身段與團結工聯尋求協商，團結工聯也走向民主制度，較少與波共對抗，資源因而集中於光譜中央。

1989年國會選舉後，波共中央委員會強硬派與新興議會黨團改革派立場愈漸疏離，議會黨團欲擺脫共黨控制，強硬派受到削弱，影響力下降。8月，統一農民黨與民主黨立場產生動搖，背離波共轉而加入團結工聯聯盟，促成第一個非共政府誕生。於危機解決階段，隨著國會選舉與非共政府建立，波共政權快速喪失多數既有資源的掌控權，雖然軍隊、警察及情治單位仍由共黨控制，但團結工聯掌握多數政府職位，波共僅握有總統與國防部長職位，對官僚機構掌控程度降低，無法撼動團結工聯在非共政府之領導地位。另一方面，天主教會雖握有資源，但政治影響力也逐漸下降。

四、團結工聯之分裂

1989年的半自由國會大選後，統一農民黨於11月26日召開特別代表大會，宣布停止活動，並改名為「波蘭農民黨」(Polish Peasant Party)，由奧列席亞克(Kazimierz Olesiak)擔任主席。¹³¹雅魯澤爾斯基深感總統權力被架空，雖按憲法規定其任期持續至1995年屆滿，但其執意引退，1990年中允諾將在1991年春天提前舉行總統大選，並推薦馬佐維茨基為總統候選人。與此同時，團結工聯內部以華勒沙為首和以馬佐維茨基為首的內部派系權力鬥爭越演越烈。如果1989年半自由之選舉引起波蘭民主轉型，團結工聯之分裂則創造了自由民主制度中重要的政治多元性。¹³²

¹³¹ Krzysztof Malinowski, "The Party System in Poland in 1989-1991," *Polish Western Affairs*, Vol.33, No.1 (1992), p.46.

¹³² Raymond Taras, *Consolidating Democracy in Poland*, op. cit., p.186.

華勒沙與知識份子領導階層之間之齟齬其來有自，非共政府成立後，許多過去工聯戰友皆位居高位，華勒沙卻受到邊緣化，因而頗有微詞，其雖未在政府行政與立法部門擔任任何正式職位，但長期擔任工聯領袖，一貫之強人作風，使其掌握工聯多數資源；另一方面，選舉過後工聯國會議員與政府部會首長，逐漸形成一股足以抗衡之勢力。首先是地區公民委員會之存廢問題，1989年國會選舉期間，波共政權大敗，團結工聯面臨組織整合之問題。

圓桌會議後團結工聯為了投入選戰，成立之公民委員會，其特色為由各地區地方精英所控制之機構，以工人及中產階級為主，組織雖較鬆散，仍是工聯重要之外圍組織。另一方面，團結工聯選上之參議院議員主要以知識份子與文化界人士為主，並組織團結工聯議會團，知識份子希望建立由中央控制之組織鞏固各式委員會，使其扮演準政黨之角色，最終成為強大之政黨組織。公民委員會成為兩股勢力的首要爭取目標，由於公民委員會之主席蓋萊梅克同時兼任國會中團結工聯議會團的主席，兩者關係較為密切，若是建立准政黨組織，地方公民委員會將由知識份子控制，地方公民委員會及部份知識份子懼怕權力過份集中，因此，華勒沙與其他工人、農民領袖決定解散公民委員會，僅保留全國性之公民委員會，成為日後雙方爭議之開端。

隔年4月，兩股勢力競逐再次浮出檯面。馬佐維茨基總理原為華勒沙之戰友，經由華勒沙之推薦而擔任非共政權之總理，馬佐維茨基溫和穩健之改革步調卻引發波蘭人之不耐，華勒沙提出強烈抨擊，並再度領導工人抗議活動，華勒沙於工人聚會時表示其欲逼迫雅魯澤爾斯基總統下台，並批評馬佐維茨基改革過慢。隨後，華勒沙在團結工聯第二次全國代表代會以77.5%得票率再次當選工聯主席，領導近200萬黨員，在黨內持續保有優厚地位。¹³³

5月，華勒沙與馬佐維茨基及工會徹底決裂，宣稱其必須成為波蘭總統，並認為工聯分裂將有助於波蘭民主及政黨多元化。因此，擁護華勒沙的派系以卡欽斯基(Jaroslav Kaczynski)為首成立「中央聯盟」(Center Alliance)，抨擊馬佐維茨基的溫和改革，呼籲加速經濟改革、私有化並採取親西方政策。另一方面，6月，63位知識份子同時也屬於國會議員之工聯成員宣佈退出公民委員會，離開華勒沙主導之組織。雖然華勒沙與馬佐維茨基曾於7月進行密談，但支持馬佐維茨基的派系仍決定成立「民主聯盟」(Democratic Union)，支持其參選總統。中央聯盟

¹³³ Timothy Garton Ash, *The Polish Revolution: Solidarity*, 3rd Edition, op. cit., p.373.

多屬工人階級；民主聯盟則以知識份子為主，工人階級勢力龐大，派系鬥爭中具備優勢。

綜上所述，表 4-5 針對兩股勢力之代表人物、成員來源、宗旨、對團結工聯之制度主張及主要資源等面向進行比較，呈現兩者之主要差異。過去，雅魯澤爾斯基未能分裂或摧毀團結工聯；如今，華勒沙卻致使團結工聯分裂。華勒沙曾經使團結工聯團結一致，現在卻處心積慮使團結工聯公開分裂。至此，團結工聯已正式分裂，兩股勢力開始競爭進行總統選舉活動。

表 4-5 團結工聯內部政治勢力比較

	中央聯盟	民主聯盟
代表人物	華勒沙、卡辛斯基 (Jaroslaw Kaszynski)、卡辛斯基 (Lech Kaszynski)、里斯(Bogdan Lis)	馬佐維茨基、庫隆、米赫尼克、蓋萊梅克、布雅克
成員來源	原公民委員會成員、團結工聯成員 (主要是工人階級)	過去議會 Znak 成員、團結工聯議會團成員、與教會關係良好之知識份子(Clubs of the Catholic Intelligensia)(主要是知識份子)
宗旨	1.反對政府經濟改革步調，採取親西方政策 2.主張提前舉行總統選舉 3.支持華勒沙競選總統	1.支持政府經濟改革步調 2.過去代表反共勢力，現在代表工聯道德力量 3.實現真正道德政治、市民社會、人文傳統 4.削弱華勒沙影響力 5.支持馬佐維茨基競選總統
對工聯之制度主張	與政府保持距離，仍以工會自居，避免議會團把持公民委員會	以團結工聯議會團為中心，各地公民委員會為地方單位，支持政府政策，希望建立准政黨組織
主要資源	政黨支持	議會與行政部門

資料來源：Paul G. Lewis, "Political Institutionalisation and Party Development in Post-Communist Poland," *Europe-Asia Studies*, Vol.46, No.5 (1994), p.791. 周慧君，「民主化過程中反對黨分裂或團結之比較分析：以波蘭團結工會與台灣民進黨為例。」，前引文，頁 63。

第三節 總統選舉與轉型遺緒

一、1990 總統選舉

9月，波蘭通過憲法修正案，總統改為全國直選。10月3日，團結工聯公民委員會決定支持並推派華勒沙競選總統，馬佐維茨基亦決定參選。此外，組織擴及整個波蘭、擁有約6萬成員之波蘭社會民主黨提名奇摩薛維茲(Włodzimierz Cimoszewicz)參選；擁有約4萬成員之最大黨波蘭農民黨，努力擺脫過去共產衛星政黨地位，提名巴托施切(Roman Bartoszcze)參選；獨立波蘭同盟(Confederation for an Independent Poland)領袖摩楚爾斯基(Leszek Moczulski)也宣佈參選；堤明斯基(Stannislaw Tyminski)認為波蘭正值放棄共產主義，改行資本主義之關鍵時期，需要具備實務經驗之經理人才領導，因而以獨立候選人之姿參選，共計13位候選人表示參選意願，最終共有六位候選人角逐總統之位。¹³⁴

重要的是，參選候選人足以代表波蘭政治之主要選擇，馬佐維茨基之支持者主要是傾向自由民主、受過教育的城市人口；巴托施切之支持者是農業民粹主義者；奇摩薛維茲之支持者是社會平均主義者；堤明斯基及摩楚爾斯基之支持者分別是政治民粹主義者及反制抗議者，政治多元化之種子已開始萌芽。¹³⁵競選民調顯示，波蘭民眾對華勒沙相較於馬佐維茨基有信心，認為其較有能力改善生活水準、降低失業率、凍結外債及確保波蘭西邊與德國之邊界。¹³⁶

1990年11月25日舉行第一輪總統選舉，投票率約為60%，選舉結果顯示，第一輪選舉未有任何候選人獲得過半選票，名列第一者為華勒沙，獲得40.0%選票；巨富商人堤明斯基以黑馬姿之名列第二，獲得23.1%選票。堤明斯基之選票主要來自於前共黨的成員、近期失業者、教育程度較低者及地區弱勢之教士。馬佐維茨基名列第三，獲得18.1%選票，無望參加第二輪選舉；奇摩薛維茲、巴托施切、摩楚爾斯基分別獲得9.2%、7.2%、2.5%之選票，皆喪失第二輪之參選資格，得票數最高的兩位進入12月9日之第二輪選舉。此次之總統選舉，女性選

¹³⁴ 其餘候選人包含 Jerzy Bratoszewski(律師)、Edward Mizikowski(鎖匠)、W. Trajdos(宣稱是實際上不存在之報紙編輯)、Boleslaw Tejkowski(反猶份子)、Janusz Korwin-Mikke(真實政治聯盟)、Wladyslaw Sila-Nowicki(工人黨)、Kornel Morawiecki(自由黨)，多數候選人無法達到十萬連署門檻(0.4%之選民)，未能正式參選。

¹³⁵ Ray Taras, *Postcommunist President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34.

¹³⁶ Raymond Taras, *Consolidating Democracy in Poland*, op. cit., p.190.

民之投票行為與男性無顯著差異，儘管波蘭社會民主黨之奇摩薛維茲多少受益於宣稱不更動墮胎法之立場。¹³⁷

第二輪選舉之前，馬佐維茨基擔心團結工聯失去政權，決定停止攻擊，號召擁護者支持華勒沙。第二輪選舉之投票率約為 53%，儘管天主教會呼籲民眾參與投票，投票率仍較第一輪選舉下降 7%。最後，華勒沙以 74.3% 得票率打敗堤明斯基 25.8% 得票率，當選波蘭共和國總統，民主選舉之政府誕生，開啟了團結工聯的執政時代。

表 4-6 1990 年 11 月 25 日及 12 月 9 日波蘭總統選舉結果

候選人	政黨	票數	得票率(%)
第一輪：11 月 25 日			
華勒沙	團結工聯	6569889	40.0
堤明斯基	獨立候選人	3397605	23.1
馬佐維茨基	獨立候選人	2973264	18.1
奇摩薛維茲	波蘭社會民主黨	1514025	9.2
巴托施切	波蘭農民黨	1176175	7.2
摩楚爾斯基	獨立波蘭同盟	411516	2.5
第二輪：12 月 9 日			
華勒沙	團結工聯	10622696	74.3
堤明斯基	獨立候選人	3683098	25.8

資料來源：Krzysztof Jasiewicz “Dead Ends and New Beginnings: the Quest for a Procedural Republic in Poland,” *op. cit.*, p.108 and Raymond Taras, *Consolidating Democracy in Poland*, *op. cit.*, p.190

1990 年之選舉為波蘭政壇及政黨制度開啟鞏固的過程，雖然第二輪選舉分化成支持華勒沙及團結工聯與反對團結工聯及支持堤明斯基兩大陣營，1991 年至 1995 年後續選舉呈現政黨分裂之現象，但 1990 年選舉第一輪的參選者仍然為波蘭建立相對穩定且完善的政治定位基礎。¹³⁸

華勒沙在競選期間曾經承諾將帶領波蘭人快速度過經濟難關，解決外債問題、提高國民生活水準、增進人民購買力、提高工業生產率及改善失業率，然而上述

¹³⁷ Ibid.

¹³⁸ Ray Taras, *Postcommunist Presidents*, *op. cit.*, p.135.

諾言短期內恐無法實現。其次，團結工聯昔日戰友紛紛離去，另組政黨，馬佐維茨基所領導之民主聯盟則堅持扮演反對黨角色，如何整合國會成為華勒沙執政時期之一大考驗。

二、選舉投票行為

綜觀 1989 年半自由國會選舉與 1990 總統民主選舉，投票率普遍不高，雖然未參與投票者中不乏教育程度較低或是社會階層較低之民眾，但仍無法充分解釋低迷之投票率。最有可能之原因是波蘭民主轉型過程中無法消除普遍之政治無效感，後共政黨缺乏明確及一貫之政治方向及承諾，政黨多元卻無有意義之選擇，社會長期經濟慘淡，對政策表達抗議，上述原因使選民心生矛盾。

波蘭投票率之差異可透過地域、世代及心理層面分析，其中以政治地理差異最為特殊，投票率最高的區域位於加利西亞(Galicia)及波美拉尼亞(Pomerania)工業地區，前者靠近克拉克夫曾屬奧地利地區，後者包含波茲南附近曾屬普魯土地區；投票率最低的區域位於俄屬波蘭(Russian-administered Congress Poland)，即華沙東部地區；次低區域位於西利西亞(Silesia)地區，曾為德屬地區，擁有許多戰後移民及社會問題。¹³⁹

波蘭選民之投票依據與西方民主選民無異，不外乎利益及效用導向，選民評估政黨是否有能權力及能力推動政策，選擇支持擴大其利益之政黨。此外，對個人及團體之期望有利於特定之政黨，例如知識份子視馬佐維茨基為個人利益之最佳擔保人；工人及農民則視團結工聯、統一農民黨及波蘭農民黨為各自階級利益最佳保護者。再者，根據候選人之個人特質，不論其政黨，選民也可能選擇支持或反對個別人物，例如華勒沙憑藉個人魅力及團結工聯加持贏得總統選舉。

值得一提的是工人投票傾向之改變，1989 年 6 月國會選舉工人極力支持團結工聯，然而隨後之選舉，工人支持團結工聯程度開始減弱。1990 年 5 月地方議會選舉，雖然工人持續支持團結工聯公民委員會，但票數急遽下降，顯示政府震盪療法經濟政策對工人生活產生不利影響，加上團結工聯內部分裂，直接衝擊工人支持程度。1990 年總統選舉，大約三分之一之工人，尤其是年輕族群更是選而支持堤明斯基而非華勒沙。

¹³⁹ Raymond Taras, *Consolidating Democracy in Poland*, op. cit., p.186.

三、約定轉型下之公民社會

學者 Michael Bernhard，針對民主轉型的過程，從自由化開始，隨著時間推移，從協商至奠基選舉，將民主轉型過程與公民社會發展相結合，構思出約定轉型下公民社會之發展邏輯。¹⁴⁰轉型的過程通常遵循一定的軌跡，首先，波共政權致力於自由化的措施，開始喪失權力和威權，團結工聯利用波共政權搖擺之時，擴大支持力量並加強動員，希望能快速擊垮政府。接著，雅魯澤爾斯基政權以戒嚴及各種軍事方式遏制與鎮壓政治動員。最後，波共政權與團結工聯意識到雙方皆無法取勝，願意承擔談判風險，開始尋求協商實現轉型之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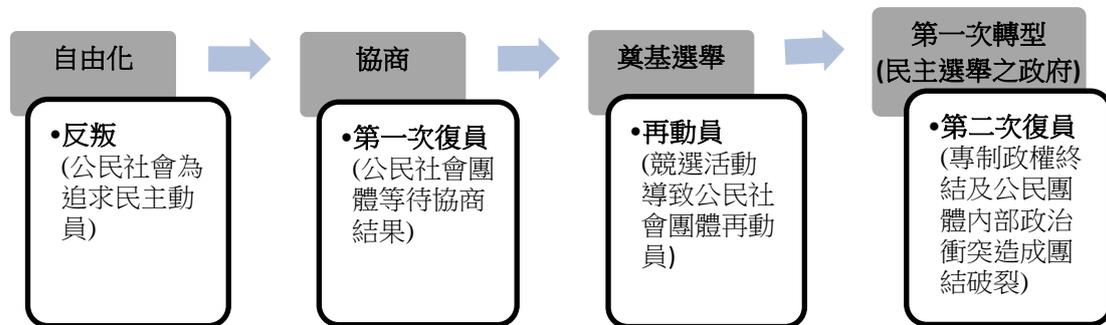
協商開始後使公民社會創造了新的形勢，雖然基本的「政權與反對勢力」及「政治社會與公民社會」分裂保持不變，但協商開始之後雙方的衝突會產生些微變化，雙方濃烈的敵意開始減少。此外，協商開啟使得衝突凍結，直到協商結果出爐，公民社會經歷一段期待更多自由的復員時期。當協商成功達成進行民主選舉的協議，波共政權與團結工聯及政治社會與公民社會之間的衝突導向白熱化的競選活動，使公民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

自由化時期反叛之團結工聯將自身投入競選活動的紀律鬥爭，背後代表的已是政治社會，並帶領支持者拉下舊有政權。選舉導致團結工聯取代舊有政權，公民社會過去積極參與政治及團結對抗的目標消失，形塑社會政治鬥爭的主要矛頭產生巨變。新政權下民主的政治權力鬥爭開始影響政治社會與公民社會之間及過去聯盟的關係，團結工聯組織內競爭激化，波蘭頂部政治權力的對抗，破壞曾經是團結組織的團結工聯。

圖 4-2 總結民主化過程導致公民社會弱化之現象，自由化促進公民社會動員，追求民主改變，成功的動員過程無可避免地開啟了民主化。協商開始後往往導致第一次復員，公民社會靜待公民團體領袖與政府協商終止威權政權之流程。協商若成功，公民社會為了競選活動，再次動員參與政治社會，直到民主政府成功取代威權政權。雖然波蘭政治力量已經歷第一次轉型，從威權體制轉變成民主選舉之政府，但未經歷第二次轉型，因此波蘭民主尚未鞏固，仍停留於轉型民主階段。

¹⁴⁰ Michael Bernhard, "Civil Society after the First Transition: Dilemmas of Post-Communist Democratization in Poland and Beyond,"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29, No.3(1996), pp.311-313.

圖 4-2 約定轉型下公民社會之發展



資料來源：Michael Bernhard, “Civil Society after the First Transition: Dilemmas of Post-Communist Democratization in Poland and Beyond,”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29, No.3(1996), pp.312。作者自繪。

學界一致認同公民社會是 1989 年推翻共產政權之重要角色，然而，後共國家卻出現公民社會弱化的普遍現象，這是民主轉型過程中無法避免的狀況。波蘭圓桌會議透過和平協商達成約定轉型，波蘭公民社會是波共政權妥協之重要推手，也是所有蘇聯衛星國中公民社會發展最完整、力量最強勁的地區。然而，波蘭經歷約定轉型後公民社會卻衰弱，原因是反叛公民社會復員、公民社會群龍無首及東歐共黨威權主義，各詳述如下：

(一)反叛公民社會復員

協商為公民社會開啟新的情況，雖然根本的「政權與反對勢力」及「政治社會與公民社會」分裂仍舊存在，但協商後雙方衝突的形式開始轉變，雙方強烈的對抗也開始減少。此外，等待協商結果過程會凍結衝突，造成公民社會期待更多的自由而暫時復員，此時政治社會開始獲得控制公眾的力量，侵蝕公民社會。

當協商促成奠基選舉之協議，政權與反對勢力之衝突導向選舉狂熱，此轉變為公民社會發展另闢新的舞台。原先為自由反叛的公民社會，投身政治社會的選舉鬥爭，動員支持者拉下舊有政權。若是選舉使反對勢力成功取代舊有政權，過去公民社會對抗的主要敵人消失，公民社會參與政治的強烈動機亦消失。新的政治權力鬥爭展開，不只影響政治社會與公民社會的關係，更影響之前的盟友關係，破壞團結工聯原有的團結。

(二)群龍無首

協商開始後，政治社會在民主化過程扮演主要角色，公民社會則退居後台。公民社會之領導必須與政權針對未來改革協商，許多過去公民社會之領導脫離原有組織轉而從政，被迫遏制自身在公民社會的行動，以展現身為協商夥伴的權威及信用，致力於為衝突尋求和平協商。此外，由於協商相當敏感且參與者有限，使得公民社會領導必須有一段時間自立於其代表的公民社會之外。

當協商促成競爭選舉，且權力由威權政權轉移至民主政府，更強化群龍無首之情況。權力移轉造成公民社會的關鍵人物加入國家政府及政治社會(如國會、政黨、政治媒體、利益團體等)，諷刺的是反對勢力越成功接近最終民主目標，越遠離公民社會領導地位。

共黨國家之特殊條件使群龍無首情況更加盛行，為了讓國家正常化，雅魯澤爾斯基政權比其他東歐國家更早選擇自由化，使得政治社會的反對勢力更早出現，在圓桌會議前即成立團結工聯公民委員會。開始自由化後奠基選舉接踵而至，即使波蘭擁有較為健全之公民社會，也無法逃過民主化過程中政治社會的無力現象。

(三)共黨威權主義

共黨威權主義具備某些特徵突顯其與現代威權主義及極權國家之差別：第一，史達林採取的政治路線是破壞所有威脅其獨裁政權之政治社會組織，以傳輸帶組織替代，監督社會並暗中控制。因此，不論是傳統或是現代組織皆無法融入新制度。第二，儘管東歐共產政權較蘇聯政權開放，與其他現代威權主義相較之下，社會多元化仍有限，社會組織只有在共黨政權脆弱時才出現，往往被視為敵對團體，受到嚴格審查，自主社會行動空間有限。第三，共黨獨裁相當持久，經歷至少 40 年的共黨統治，成為東歐國家民主化的負擔。

衰弱的公民社會可否恢復實力，取決點在於這些因素造成的是短暫抑或是長期的後果。前兩項因素是民主化過程的產物，因此影響可隨時間復原；第三項因素涉及到由來已久的體制，牽涉層面廣大，因此需要政府花費更多的心力克服。

公民社會是否在共黨垮台前開始重新組織與波共傳輸帶社會組織如何因應政權垮台相當重要，若是自主公民組織在政權垮台前力量薄弱，且傳輸帶社會組織能在新政府找到新的依靠，自主公民社會之建立將會減慢；反之，自主公民社會將會再次復興。雖然華勒沙贏得總統選舉，從馬佐維茨基總理與追隨其進入政

府及國會的知識份子手中搶回公民委員會的控制權，使得第一次轉型後波蘭公民社會即刻遭遇群龍無首的情況，但公民社會新領袖的出現並非難事，除非遭遇國家干預或資源缺乏等破壞領袖填補的過程。

以波蘭的情況而言：第一，1970年以來，在國家控制之侷限外，波蘭具備相對高度自主之組織；第二，部份波共傳輸帶社會組織開始適應融入新多元環境且喪失舊政權下的壟斷地位，許多專業組織朝向自主及內部多元發展。例如波共政權下台後，波蘭農民黨獲得更多農民支持，轉變成具競爭力之政黨；波共政權扶持之波蘭全國工會聯盟保有勢力，並持續與團結工聯競爭勞工代表權。上述兩項發展顯示，共黨威權主義將不再是弱化公民社會的主要因素，波蘭公民社會日漸復甦。

四、民主選舉與轉型遺緒

選舉是民主體制的運作方式，也是削弱及終結威權政權的一種途徑。¹⁴¹選舉是民主化之目標，不論是威權政權或是反對團體都期盼藉由選舉確保自身影響力，選舉也給予欲獲取權力之反對派與欲保持權力之執政黨向中間路線移動之誘因。¹⁴²隨著波共政權合法性逐漸喪失，尋求透過選舉恢復其合法性之動機增強，波共政權相信，選舉有助其苟延殘喘，或維持自己抑或是盟友統治，然而選舉結果往往令政府領導階層與反對派領袖感到意外。1989年6月波蘭之國會選舉與1990年11月之總統選舉，團結工聯皆贏得漂亮勝利。

波共政權落敗之因，主要是掌權時間過久，失去當初得到之支持與合法性，民眾傾向尋找適合之替代人物或政黨。為了恢復日益衰弱之合法性與獲得國際尊重，舉行民主選舉乃是波共政權風險最小的選擇。朝野雙方通常認為，選舉越早進行對政府越有利，因為政府可以動員組織；選舉越晚進行對反對派較為有利，因為反對派有較充裕之時間組織與動員。團結工聯在圓桌會議時，同意政府提早選舉之主張，被視為重大讓步，因此，波共政權合理推定能擊敗團結工聯。

然而，團結工聯在提前大選獲得空前勝利，證實波共政權並未因提前選舉而占盡便宜，團結工聯也未全盤皆輸。國會選舉為波蘭帶來協議議會(contract parliament)，開啟真正的政治競爭，議會不但作為立法機構運作，也成為形塑政

¹⁴¹ Samuel Huntington，劉軍寧譯，**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前引書，頁193。

¹⁴² 同前註，頁209。

黨的領頭車，提供測試政策及未來領袖的場域。

波蘭雖是中東歐第一個進行約定轉型之國家，代價卻是延遲自身全面轉型，更重要的是，轉型的方式使波蘭在創造民主鞏固必須之政治制度時產生負面遺緒。根據轉型理論之觀點，圓桌會議所達成之協議為波蘭留下兩大複雜的遺緒：第一，眾議院 65% 之席次是經由非競爭選舉之方式產生，非民主選舉之代表卻被賦予制定民主之憲法之責任。¹⁴³第二，總統擁有巨大權力，負責維護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掌控內部安全、國防、外交關係及宣佈戒嚴之緊急權力，以上權力被納入憲法，受到憲法保障。

波蘭擁有健全之公民社會，具備濃厚反抗外在勢力的文化根源，使其率先於其他東歐國家，走向民主轉型的道路。團結工聯之運動使波蘭社會提早開始民主轉型之過程並成為波蘭今日中間偏右的政黨，但也為波蘭留下複雜的遺緒：第一，鑒於過去波共干涉鎮壓之陰影，非共政府去共產主義受限，只能先專注於經濟改革。第二，民主政治並非「反對政治」，團結工聯不應再平行於國家權力，而是領導國家權力，否則過去作為反對團體的特質及運作方式，將成為政治社會民主鞏固過程中的障礙。¹⁴⁴第三，團結工聯精英分裂，1990 年總統選舉迫使工聯分裂成支持華勒沙之工人階級及支持馬佐維茨基之知識份子集團，雙方拒絕定義自身為政黨，也未提供明確黨綱，而是繼續以團結工聯之共識規範與集體立場示眾。¹⁴⁵此外，華勒沙之勝利也代表國家權力由國會轉移至總統。¹⁴⁶第四，1990 年提前舉行總統選舉，國會選舉亦可同時舉行，然而團結工聯議會團及政府決定延後國會選舉，錯誤的政治決策，間接造成之後團結工聯政治社會領袖與公民社會領袖的對決。上述遺緒也為未來波蘭政黨政治碎裂化埋下伏筆。

¹⁴³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68.

¹⁴⁴ Ibid., p.272.

¹⁴⁵ Jack Bielasiak, “ The dilemma of political interests in the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 In *Escape from Socialism: The Polish Route*, Walter Connor and Piotr Ploszajski ed (Warsaw: IFIS, 1992), p.209.

¹⁴⁶ 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in East-Central Europe*, op. cit., p. 77.

第四節 小結

1989年6月4日波蘭舉行戰後首次國會半自由民主選舉，團結工聯再次動員，積極投入選舉，以壓倒性勝利徹底擊敗了波共和其傀儡政黨。此時，團結工聯尚未有執政之意圖，因此，雅魯澤爾斯基在一個月後之總統選舉中保住總統職位。隨著總理人選懸而未決，團結工聯遂興起組閣意願，迫使雅魯澤爾斯基提名團結工聯顧問馬佐維茨基出任總理，以團結工聯為首的聯合政府形成，並取得聯合內閣之人數優勢，居主導地位，東歐第一個非共政府正式誕生，雅魯澤爾斯基則成為象徵性之國家元首。

兩次差強人意之選舉結果，爆發波共黨內權力基礎之機構對抗，波共中央委員會與波共議會黨團立場逐漸分道揚鑣，終分裂成實現民主社會主義之波蘭社會民主黨，與切割過去、由議會黨團領導之波蘭社會民主聯盟。與此同時，團結工聯內部面對組織整合以及政府經濟改革效率之問題，以華勒沙為首和以馬佐維茨基為首之內部派系權力鬥爭也越演越烈，終分裂成工人階級為主之中央聯盟與知識份子為主之民主聯盟，兩股勢力雙雙投入1990年之總統選舉競爭。經歷兩輪選舉，華勒沙先後擊敗馬佐維茨基與堤明斯基，當選波蘭共和國總統，民主選舉政府誕生，開啟了團結工聯執政時代，波蘭在波共政權與團結工聯之聯合行動順利、和平地完成約定轉型。

波蘭民主化過程中政治條件之改變，牽動著資源分配之消長變動，從危機開端至解決，各相鄰競爭團體間之異議程度逐漸降低，資源差異也逐漸縮小。此外，民主化過程也因為反叛公民社會復員、群龍無首現象及東歐共黨威權主義等因素，導致波蘭公民社會弱化。但波蘭具備相對高度自主之組織，且新興社會組織朝向自主及內部多元發展，公民社會之復興指日可待。

波蘭雖是中東歐第一個進行約定轉型之國家，卻延遲自身全面轉型，產生非民主選舉代表制定民主之憲法及總統擁有巨大權力負面遺緒。此外，團結工聯精英分裂、非政治化錯誤政策與過去身為反對團體之特質及運作方式也成為政治社會民主鞏固過程中的障礙，為未來波蘭政黨政治碎裂化埋下伏筆。

第五章 結論

波蘭反對運動之所以興起，主要是受到波蘭歷史、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之影響，反對力量不斷從錯誤中學習，進而化整為零形成團結工聯。團結工聯成立後受到戒嚴之影響，試圖透過結構重建，對抗波共之壓迫。圓桌會議是波蘭民主化的轉捩點，波共政權與團結工聯雙方開始合作，共同尋求和平之解決方案。透過圓桌會議協議之一系列民主選舉，團結工聯順利執政，迫使非民主政權垮台，促成波蘭之約定轉型。以民主轉型動態模型為基礎，將團結工聯自崛起至執政之間的歷史脈絡，對應波蘭民主化各階段之發展，團結工聯在波蘭民主化過程中之地位可見一斑。

在波蘭統一工人黨的統治之下，波蘭經歷政黨制度之腐敗、經濟政策之失敗，對於波共政權產生極大不滿，社會結構改變使得波蘭各城市出現不同類型、不同訴求的獨立反對團體，反對運動層出不窮。波共政權自由化之措施，逐漸喪失威權，帶來一段長期之政治鬥爭，包含 1956 年波茲南工人暴動、1968 年華沙大學學生示威、1970 年及 1976 年工人抗暴運動。1980 年代波蘭反對勢力進入新的高峰，爆發空前的罷工潮，在天主教會精神與物質支持下，波蘭民族主義、為勞工爭取權利之工會團體及知識份子三股反對勢力前所未有的匯合，波共被迫簽定格但斯克協議，該協議被視為打破東歐共黨國家一黨專政的開端。

團結工聯隨後誕生，波蘭終於成立第一個獨立工會，會員數量龐大，並推選華勒沙擔任主席，成為波蘭主要的變革力量。團結工聯成為合法工人組織後，由單純的工會轉變為一個社會運動，無數勞工、知識份子和學生紛紛加入團結工聯或其附屬團體。透過嚴密之地方與中央組織結構、有效之抗議罷工談判策略、明確之組織目標及多元包容之團結等特性，團結工聯成為波蘭社會一股撼動波共政權的強勁力量。

面對如此強勁又有組織的反對勢力，波共政權決定進行全面武裝鎮壓，實施戒嚴與軍事統治，團結工聯失去合法地位被迫解散，轉為地下化發展。工聯精英成立團結工聯臨時協調委員會，作為工聯暫時領導組織，分散及短暫活動，並透過出色的獨立教育系統、秘密電台、出版分配網絡以及西方精神與物質援助下，作為波蘭社會之希望，以集體抵抗政權之模式存活下來。

隨著戈巴契夫上台，以及波共態度軟化，波共政權與團結工聯之關係進入新的扉頁。1988年春季及夏季再度爆發大罷工，團結工聯重新合法化是罷工的主要訴求，為停滯系統注入新動力並激起政治改變之希望。歷經電視公開辯論及波共領導階層人事改組，所有條件已然成熟，波共政權希望以政治讓步求取團結工聯對波共經濟改革政策的背書；團結工聯則希望工會重新合法化進而獲得參與政治之機會，雙方決定走上談判桌。

1989年2月6日至4月5日，以華勒沙為首的反對團體代表團與以內務部長基斯查克為首的政府代表團在華沙進行圓桌會議，主要圓桌會議分為經濟社會政策、政黨多元化和政治改革三項議題，朝野兩種勢力開始尋求和討論解決波蘭問題的方案和途徑。談判過程相當公開，雙方之差異與矛盾則透過馬格達倫卡別墅會談消弭，波共領導與反對領袖從談判過程中分享權力，同時也消除雙方敵意，經歷八週談判，波蘭民主就在談判、妥協和協議過程中逐漸和平產生，雙方達成民主選舉之協議。

透過圓桌會議，波共政權與團結工聯聯合行動，共同協商解決。談判過程中，雙方都有機會分享權力，也有權力競逐的機會，圓桌會議可視為波共政權與團結工聯反對勢力認知與學習的過程，使得波共改革派及團結工聯溫和派人士相互合作建立民主機制，達成約定轉型。波蘭民主轉型漫長的準備階段總算告一段落，非民主政權幾近瓦解。圓桌會議重要性不僅在於首開先例，帶起中東歐國家透過協商而非對抗達成民主轉型之風潮，更扭轉共黨統治是強硬及不可改變的想法，轉化反對共產主義的鬥爭模式。

選舉是民主化之目標，是民主轉型決定階段的重要事件，不論是威權政權或是反對團體都期盼藉由選舉確保自身影響力，給予欲獲取權力之團結工聯與欲保持權力之波共政權向中間路線移動之誘因。根據圓桌會議之協議，1989年6月4日波蘭舉行戰後首次國會民主選舉，眾議院方面，波共聯合政府保有65%席次，團結工聯有望獲得35%席次；參議院則完全開放自由選舉。儘管是半自由選舉，團結工聯再次動員積極投入，波共則相信能繼續保有政權。然而選舉結果卻是團結工聯意外大勝波共和其傀儡政黨，在共黨國家可謂前所未聞。

雅魯澤爾斯基雖在一個月後之總統選舉中保住總統職位，然而隨著總理人選懸而未決，團結工聯遂興起組閣意願，迫使雅魯澤爾斯基提名團結工聯顧問馬佐維茨基出任總理，以團結工聯為首的聯合政府形成，並取得聯合內閣之人數優勢，

居主導地位，波蘭成為蘇聯集團中第一個擁有非共黨之總理，且擁有共黨居少數之聯合內閣的社會主義國家，雅魯澤爾斯基則成為象徵性之國家元首。

然而，團結工聯內部面對組織整合以及政府經濟改革效率之問題，內部工人階級與知識份子之派系權力鬥爭也越演越烈，終分裂成以華勒沙為首之中央聯盟和以馬佐維茨基為首之民主聯盟，兩股勢力雙雙投入 1990 年之總統選舉競爭。第一輪選舉未有候選人獲得過半選票，馬佐維茨基為了大局放下成見，最終由華勒沙當選波蘭共和國總統，民主選舉政府誕生，開啟了團結工聯執政時代，波蘭在波共政權與團結工聯之聯合行動順利、和平地完成約定轉型。

波蘭雖是中東歐第一個進行約定轉型之國家，卻延遲自身全面轉型，原因在於未有過去經驗可供參考，嘗試與摸索的過程不免導致公民社會弱化、產生非民主選舉代表制定民主之憲法及總統擁有巨大權力負面遺緒。此外，團結工聯精英分裂、非政治化錯誤政策與過去身為反對團體之特質及運作方式成為其民主鞏固過程中的障礙，為未來波蘭政黨政治碎裂化埋下種子。華勒沙與馬佐維茨基形成之雙頭馬車，造成後續路徑依賴效果，也成為波蘭雙首長制的先鋒。

礙於篇幅，本文僅討論至 1990 年團結工聯執政為止，工聯隨後之發展也是值得深入剖析的主題。團結工聯執政之後，組織發展有戲劇性的轉變。華勒沙當選總統之後，辭去團結工聯主席職位，1991 年 2 月，克薩克雷夫斯基(Marian Krzaklewski)成為團結工聯新領導人，許多過去團結工聯領袖也組成或加入各式政黨，繼續在波蘭政壇發光發熱。儘管華勒沙擔任波蘭總統，其政見和團結工聯新領導階層卻產生分歧。團結工聯不再支持華勒沙，甚至愈趨批評政府表現，並決定成立一個新的政黨參與選舉。1991 年及 1993 年之波蘭國會選舉，團結工聯支持度跌落谷底，1995 年華勒沙競選總統連任失利，共產政權跨台六年後，共產繼承政黨民主左派聯盟囊括總理及總統職位，重新控制政壇。此後，團結工聯加入之前的敵人波蘭全國工會聯盟，華勒沙更於 2006 年退出團結工聯，團結工聯之發展變化也相當值得重新檢視。

1989 年起，波蘭政黨林立，崢嶸並茂，成為後共產主義時期波蘭政治發展特色之一，從 1989 年至 1993 年短短四年，卻實行三次國會大選，內閣政府更改組六次之多，問題在於未有政黨能獲得足以穩定的多數，必須由數個政黨聯合組成內閣，政黨碎裂化及政局不穩，顯示當時波蘭民主化尚未鞏固，憲政改革過程引發之左右交替共治情形，也值得另闢章節繼續探討。

適逢後共 25 週年，波蘭民主化經驗值得與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新一波民主化進行比較研究。再者，波蘭之轉型路徑、模型及民主化意涵亦可與其他威權政體相互比較及參照。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專書

Huntington, Samuel, 劉軍寧譯, **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台北：五南，1994)。

Potter, David, David Goldbalt, Margaret Kiloh, Paul Lewis 等，王謙等譯，**民主化的歷程**(台北：韋伯文化，2003)。

王逸舟、孫紹智，**波蘭危機**(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台北：正中書局，1996）。

林佳龍、邱澤奇主編，**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台北：月旦，1999)。

洪茂雄，**東歐變貌**(台北：時報出版社，1991)。

——，**波蘭史—譜寫悲壯樂章的民族**(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0)。

張紹勳，**研究方法**(台中：滄海書局，2000)。

蘇永欽主編，**政黨重組：臺灣民主政治的再出發？**(台北：新臺灣人文教基金會，2001)。

期刊

王菁、李想，「民主化、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概念的澄清與辨析」，**青島大學師範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3 期 (2011)，頁 107-113。

吳玉山，「半總統制：全球發展與研究議程」，**政治科學論叢**，第 47 期 (2011)，頁 1-32。

——，「半總統制下的內閣組成與政治穩定比較俄羅斯、波蘭與中華民國」，**俄羅斯學報**，第 2 期 (2002)，頁 229-265。

——，「制度、結構與政治穩定」，**政治學報**，第 32 期 (2001)，頁 1-30。

——，「政權合法性與憲改模式：比較臺灣與歐洲後共新興民主國家」，**問題與**

研究，第 45 卷第 1 期 (2006)，頁 1-28。

洪茂雄，「中東歐國家和平演變十二年來總評估(1989-2001)」，**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2001)。

——，「後共產主義波蘭的政治發展：變革與穩定」，**問題與研究**，第 35 卷第 6 期 (1996)，頁 53-66。

陳元、畢英賢等，「波蘭問題學術座談會紀要」，**問題與研究**，第 21 卷第 4 期 (1982)，頁 1-22。

陳學燕，「波蘭團結工會的興衰」，**瞭望**，第 2 卷 (1983)，頁 30-31。

楊三億，「波蘭後冷戰時期的認同轉變與安全政策」，**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3 期 (2004)，頁 49-75。

劉邦義，「波蘭政局的劇變與團結工會」，**世界歷史**，第 5 卷(1995)，頁 67-74。

鄭得興，「中東歐的市民社會與民主發展之比較研究」，**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4 卷第 1 期 (2008)，頁 67-98。

學位論文

王維芳，「半總統制新興民主國家的制度設計與政治穩定：蒙古及波蘭的比較分析」，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周慧君，「民主化過程中反對黨分裂或團結之比較分析：以波蘭團結工會與台灣民進黨為例」，台北：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張孝評，「轉型、鞏固與深化：台灣民主化的分析」，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張秀珍，「波蘭獨立團結工會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

戴育毅，「波蘭政經體制改革之研究：團結工聯與波共政權互動之背景與演變」，台北：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

——，「波蘭團結工會自由化運動之研究(1980-1983)」，台北：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

蘇宏達，「一九八九年波蘭民主運動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二、西文文獻

專書

Ash, Timothy Garton, *The Magic Lantern: The Revolution of '89 Witnessed in Warsaw, Budapest, Berlin, and Prague*(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0).

———, *The Polish Revolution: Solidarity*(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5).

———, *The Polish Revolution: Solidarity 3rd Edition*(United Stat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Calhoun, Craig, *The Question of Class Struggle: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pular Radicalism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2).

Connor, Walter, and Piotr Ploszajski, *In Escape from Socialism: The Polish Route*(Warsaw: IFIS, 1992).

Dawisha, Karen, and Bruce Parrott,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in East-Central Europ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Doorenspleet, Renske, *Democratic Transitions: Exploring the Structural Sources of the Fourth Wave*(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5).

Dziewanowski, M. K., *The Communist Party of Poland*(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Ekiert, Grzegorz, *The State against Society : Political Crises and Their Aftermath in East Central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Ekiert, Grzegorz, and Stephen E. Hanson,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 Assessing the Legacy of Communist Rul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Ekiert, Grzegorz, and Jan Kubik, *Rebellious Civil Society : Popular Protest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Poland 1989-1993*(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Elster, Jon,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Hirschman, Albert, *Exit, Voice and Loyalt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Kaminski, Bartlomiej, *The Collapse of State Socialis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Keane, John,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New European Perspectives*(London: Verso,

- 1988).
- Kolankiewicz, George, and Paul G. Lewis, *Poland: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London: Pinter, 1988).
- Lewis, Paul G.,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Party Secretaries in Poland, 1975-1986*(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 1988).
- Linz, Juan, *Crisis, Breakdown and Reequilibration*(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 Linz, Juan J.,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Lipski, Jan J., *Kor: A History of the Workers' Defense Committee in Poland*(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Traugott, Mark (EDT), Charles Tilly, Marc W. Steinberg, Charles D. Brockett, James W. White and Craig Calhoun, *Repertoires and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Mason, David,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Polan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O'Donnell, Guillermo,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Baltimore: 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 Preibisz, Joanna M. edited, *Polish Dissident Publication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2).
- Roberts, Adam, and Timothy Garton Ash, *Civil Resistance and Power Politics: The Experience of Non-Violent Action from Gandhi to the Pres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Rupnik, Jacques, *Dissent in Poland 1968-1978: The End of Revisionism and the Rebirth of the Civil Society*(London: Macmillan, 1979).
- Simon, Maurice D., and Roger E. Kanet, *Background to Crisis: Policy and Politics in Gierek's Poland*(Boulder: Westview Press Inc., 1981).
- Sorensen, Georg,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 World*(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8).
- Staniszki, Jadwiga, *Poland's Self-Limiting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 Taras, Ray, *Postcommunist President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Taras, Raymond, *Consolidating Democracy in Poland*(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5).

Tarrow, Sidney,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Tilly, Charles,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Touraine, Alain, Francois Dubet, Michel Wieviorka, and Jan Strzelecki, *Solidarity: The Analysis of a Social Movement: Poland, 1980-198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Weydenthal, J.B. de, *The Polish Drama: 1980-1982*(Mass: Lexington Books, 1983).

Zielonka, Jan, *Political Ideas in Contemporary Poland*(London: Aldershot, 1989).

期刊論文

Bernhard, Michael, “Civil Society after the First Transition: Dilemmas of Post-Communist Democratization in Poland and Beyond”,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29, No. 3 (1996), pp. 309-330.

———,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8, No. 2 (1993), pp. 307-326.

Bielasiak, Jack, “The Paradox of Solidarity's Legacy: Contested Values in Poland's Transitional Politics”,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38, No. 1 (2010), pp. 41-58.

Ekiert, Grzegorz, “Rebellious Poles: Political Crises and Popular Protest under State Socialism, 1945-89”, *East European Politics & Societies*, Vol. 11, No. 2 (1997), pp. 299-338.

Inglot, Tomasz, “Between High Politics and Civil Society: Polish Trade Unions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after 1989”,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Science*, Vol. 27, No. 3 (1998), pp. 148-154.

Jasiewicz, Krzysztof, “Dead Ends and New Beginnings: The Quest for a Procedural Republic in Poland”,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3, No. 1 (2000), pp. 101-122.

Johnston, Hank, “Toward an Explanation of Church Opposition to Authoritarian Regimes: Religio-Oppositional Subcultures in Poland and Catalonia”,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Vol. 28, No. 4 (1989), pp. 493-508.

Karpinski, Jakub, “Polish Intellectuals in Opposition”,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 36, No. 4 (1987), pp. 44-57.
- Kennedy, Michael D., "Contingencies and the Alternatives of 1989: Toward a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egotiating Revolutio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 Societies*, Vol. 13, No. 2 (1999), pp. 293-302.
- Kitschelt, Herbert,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Political Protest: Antinuclear Movement in Four Democ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6, (1986), pp. 57-85.
- Kwiatkowski, Piotr, "Opinion Research and the Fall of Communism: Poland 1981–199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Vol. 4, No. 4 (1992), pp. 358-374.
- Lewis, Paul G., "Political Institutionalisation and Party Development in Post-Communist Poland",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6, No. 5 (1994), pp. 779-799.
- Malinowski, Krzysztof, "The Party System in Poland in 1989-1991", *Polish Western Affairs*, Vol. 33, No. 1 (1992), pp.45-60.
- Meardi, Guglielmo, "The Legacy of 'Solidarity': Class, Democracy, Culture and Subjectivity in the Polish Social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Vol. 4, No. 3 (2005), pp. 261-280.
- Morawska, Ewa, "Civil Religion Versus State Power in Poland", *Society*, Vol. 21, No. 4 (1984), pp. 29-34.
- Pastusiak, Longin, "Poland and the West in the New Era", *Korea and World Affairs*, Vol. 14, No. 3 (1990), pp. 476-500.
- Paul, David W., and Maurice D. Simon, "Poland Today and Czechoslovakia 1968",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30, No. 5 (1981), pp. 25-39.
- Rustow, Dankwart A.,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 No. 3 (1970), pp. 337-363.
- Tarrow, Sidney, "National Politics and Collective Action: Recent Theory and Research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4 (1988), pp.421-440.
- Weigel, George, "Catholicism and Democracy: The Other Twentieth-Century Revolu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12, No. 4 (1989), pp. 5-25.
- Weydenthal, J.B. de, "Workers and Party in Poland",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29, No. 6 (1980), pp. 1-22.

三、網路資料

圓桌會議—開始自由之路

<http://okragly-stol.pl/>

波蘭民意調查中心 Centrum Badania Opinii Społecznej

http://www.cbos.pl/EN/home_en/cbos_en.php

波蘭電台：圓桌會議 Polskie Radio – Okrągły Stół

<http://www.polskieradio.pl/68/788/Tag/1256>

「我有知情權波蘭網站」 Mam Prawo Wiedziec

<http://mamprawowiedziec.pl/>



附錄一

圓桌會議與會代表名單(按姓氏字母順序)

黨政代表	
姓名	職稱
Tomasz Adamczuk	統一農民黨黨員
Norbert Aleksiewicz	農民和農業組織全國聯盟主席
Stanisław Ciosek	波共政治局委員
Aleksander Gieysztor	歷史學教授
Wiesław Gwiżdż	波蘭天主教社會聯盟主席
Marek Hołdakowski	波共政治局候補委員
Jan Janowski	民主黨黨員、冶金學教授
Janusz Jarliński	波蘭全國工會聯盟成員
Czesław Kiszczak	圓桌會議主席、圓桌會議提出者、波共政治局委員
Zenon Komender	工程師、經濟學家、天主教協會 PAX 成員
Jan Karol Kostrzewski	醫生、流行病學家
Mikołaj Kozakiewicz	統一農民黨黨員、社會學家
Bogdan Królewski	統一農民黨黨員
Aleksander Kwaśniewski	政黨多元化會議聯合主席、波蘭統一工人黨黨員
Maciej Manicki	波蘭全國工會聯盟成員
Harald Matuszewski	波蘭全國工會聯盟成員
Leszek Miller	波共書記處書記
Alfred Miodowicz	波共政治局委員、波蘭全國工會聯盟領袖
Kazimierz Morawski	社會基督教協會會長
Jerzy Ozdowski	眾議院副議長、民族復興愛國運動組織成員
Anna Przeclawska	科學家、教授
Tadeusz Rączkiewicz	波蘭全國工會聯盟成員
Jan Rychlewski	科學家、教授
Władysław Siła-Nowicki	律師
Zbigniew Sobotka	波共政治局候補委員
Romuald Sosnowski	波蘭全國工會聯盟成員
Stanisław Wiśniewski	波蘭全國工會聯盟成員
Jan Zaciura	波蘭全國工會聯盟成員
Edward Zglobicki	民主黨黨員

反對團體代表	
姓名	職稱
Stefan Bratkowski	作家、記者、公民委員會成員
Zbigniew Bujak	參與政治改革及經濟社會政策會議、政治家、地下工聯領導者
Władysław Findeisen	教授
Władysław Frasyniuk	團結工聯成員
Bronisław Geremek	政治改革會議聯合主席、歷史學家、教授
Mieczysław Gil	團結工聯成員
Aleksander Hall	歷史學家、記者
Jacek Kuroń	參與政治改革會議、參與教育家、史學家、社會活動家、記者
Władysław Liwak	團結工聯成員、律師
Tadeusz Mazowiecki	政黨多元化會議聯合主席、「團結週刊」主編
Jacek Merkel	團結工聯成員
Adam Michnik	參與政治改革會議、歷史學家、作家、公民委員會成員
Alojzy Pietrzyk	團結工聯成員
Edward Radzewicz	團結工聯成員
Henryk Samsonowicz	歷史學家、教授
Grażyna Staniszevska	團結工聯成員
Andrzej Stelmachowski	法學教授
Stanisław Stomma	退休教授、記者
Klemens Szaniawski	教授
Jan Józef Szczepański	作家
Edward Sz wajkiewicz	團結工聯成員
Józef Ślisz	曾為農民工會農業團結工聯成員、團結工聯成員
Witold Trzeciakowski	經濟社會政策會議聯合主席、經濟學家
Jerzy Turowicz	記者、專欄作家
Lech Wałęsa	圓桌會議聯合主席、團結工聯主席
Andrzej Wielowieyski	公民委員會成員

天主教會代表	
姓名	職稱
Bronisław Dembowski	神父
Janusz Narzyński	主教
Alojzy Orszulik	神父

資料來源：

Wojciech Adamecki, Marianna Domanska, Maria Mogielnicka, and Ludwika Wujec, eds., Okragly stol: Kto jst kim: Solidarnosc, opozycja: Biogramy wypowiedzi(Warsaw: Wydawnictwo Mysl, 1989), pp.305-024. <http://okragly-stol.pl/ludzie/>



附錄二

波蘭民主大事記

年代	月份日期	事件
1948年		波蘭統一工人黨成立
1956年	6月	波茲南工人罷工
	10月	戈慕卡成為波共新領導人
1968年	3月	華沙大學學生示威遊行
1970年	12月	格但斯克工人罷工，吉瑞克成為波共新領導人
1976年	6月	拉多姆、烏蘇斯工人罷工
	9月	「勞工保護委員會」成立
1978年	10月	主教弗耶提瓦當選天主教教宗，成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1979年	6月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訪問波蘭
1980年	7月	華沙及其他城市工廠工人罷工
	8月14日	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開始罷工
	8月16日	共計二十一個工廠成立「罷工委員會」
	8月31日	簽署「格但斯克協議」，波蘭團結工聯於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成立
	9月6日	卡尼亞成為波共新領導人
	9月17日	全國共計35個獨立工會代表齊聚格但斯克，討論建立全國性自治工會組織，統一組織章程並選舉領導機構
	11月10日	最高法院批准團結工聯註冊登記，成為合法工人組織
1981年	3月19日	比得哥什危機
	3月27日	規模最大、組織最完善之4小時全國警告性罷工
	3月31日	達成華沙協議，取消預備全國性罷工
	9月5日 -9月10日	團結工聯全國代表大會第一階段
	9月26日 -10月7日	團結工聯全國代表大會第二階段
	10月18日	雅魯澤爾斯基成為波共新領導人
	11月4日	格蘭普主教、華勒沙及雅魯澤爾斯基三人舉行首次會談
	12月11日	團結工聯激進派要求舉行全民投票決定波共去留，主張成立非共之臨時政府，企圖奪取全國政權
	12月13日	波共實施戒嚴與軍事統治

1982年	7月	設立「團結工聯臨時協調委員會」
	10月	實施新工會法，解散所有工會組織，團結工聯非法化
	12月	戒嚴有條件暫停
1983年	1月	「波蘭全國工會聯盟」成立
	7月22日	戒嚴正式解除
	10月5日	華勒沙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1986年	9月30日	建立「團結工聯臨時會議」
1987年	11月25日	團結工聯解散臨時協調委員會及團結工聯臨時會議，共同組成正式工會組織－「團結工聯全國執行委員會」
	11月30日	政府經改方案公投遭受否決
1988年	4月-5月	斯塔洛瓦沃拉及其他城市開啟一系列新罷工
	8月	第二波罷工
	9月16日	基斯查克等共黨官員、華勒沙及其顧問共同商討圓桌會議之可行性及波共與反對勢力之妥協範圍
	11月30日	華勒沙與米歐多維茲展開電視公開辯論
	12月18日	建立「公民委員會」
1989年	1月	波共第十次黨代表大會
	2月6日 -4月5日	圓桌會議
	4月17日	團結工聯重新合法化
	4月	通過修憲案
	6月4日	舉行第一次半自由國會選舉，團結工聯大獲全勝
	7月19日	雅魯澤爾斯基辭去共黨第一書記，就任波蘭總統
	8月24日	波共放棄組閣，團結工聯馬佐維茨基成為總理
	9月12日	形成以工聯為首之聯合政府，東歐第一個非共政府誕生
1990年	1月1日	實施巴爾策羅維茨之經濟改革－「震盪療法」
	4月19日 -4月25日	第二次團結工聯全國代表代會
	5月	團結工聯分裂，卡欽斯基成立「中央聯盟」
	6月	成立「民主聯盟」
	9月	通過修憲案
	12月9日	華勒沙當選波蘭共和國總統